

書叢治政代現

治政聯蘇現

董軍工司

五雲
印局

97

行謨館書印務商

章王林
雲孟工
慤五編著
主編

現代政
治叢書
現 代 蘇 聯 政 治

商務印書館發行

3519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初版

(31241.3)

現代政
治叢書 現代蘇聯政治
每冊實價國幣別角

每冊實價國幣捌角

外埠配力通費圖說

上海西愛威斯路

編著者

林和平對孟六虎

主編者

卷五

—

發行人

王上海雲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務印書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沈鴻俊)

編者序言

蘇聯在今日已算一個大體具備有社會主義形態的國家。但牠顯然還不會完全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換言之，就是牠還在向着社會主義理想推移轉化的過程中。我們要解述這種國家的政治動態，如用一句話概括，只說是牠在『向着社會主義之道邁進』也行；至多，列舉幾個屬於社會主義的理想政治概念（如自由平等之類），說是牠在努力實現那幾個概念，亦就够了。

不過，問題不能這樣簡單的解決。我們甚且還可指出一些關於蘇聯政治動態，須得從長討論的理由；第一，社會主義的理想，是由世界革命而實現世界大同的場面。蘇聯還只是世界的一部分，由資本主義勢力支配的其餘大部分的世界，對於蘇聯是採取對立的包圍的態。在此種局面下，蘇聯就不但不能順利的照着理想的計劃做去，甚且還要在所謂『一國社會主義』建設程序上，一方面與勢不兩立的資本主義國家圖謀妥協，實現和平外交；另一方面，更還要用全力去從事真

正社會主義社會所不需要的軍事國防的工作。單就這種事實而論，蘇聯的政治動態，已因其頗大的伸縮彈性，而饒有研究的餘地了。況且第二，蘇聯從上述這方面說，儘管在採行『一國社會主義』的非常政策，但在其一國境界以內，其所有的舉措，究還能依照社會主義的程序做去。我們知道，社會主義的活動，是中央集權的，是計劃的，是統合的；社會各方面的設施與活動，誠然都在儘可能的保持分工原則，但這每一個方面，每一個部門，與其他一切方面一切部門通是在一個中心計劃之下行動。而政治活動又是那種中心計劃的發動體。因此，我們談蘇聯政治，不能把牠與一般帶有工具性質與裝潢性質的資本主義政治混為一談。牠的每種政治步驟，都會在其國內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等方面發生決定的影響。第三，蘇聯的孤立繁榮，誠然能對資本主義世界發生威脅的作用，但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政治危機愈益加深擴大，同時也會正比例的增大其對於蘇聯施行『懲治』與『征服』的要求；這要求反過來反映到蘇聯的內政外交上，難免不引起一些政治的黨爭的波瀾，而使其全般政治動態，發生某種限度的改變。

總之，蘇聯是一個特殊的國度；對於牠的政治動向的把握，非從其中央集權的強力政治統制

下的一切方面的實際活動情況，不能得到具體的說明。本書所以就國家機構，就計劃經濟，就民族問題，民生問題，就軍事國防，就外交政策，就黨爭，就新憲法各方面來分別解述，乃是希望由此予讀者以更確切更顯明的認識。至若書中有脫漏乖誤的地方，則甚願不吝指教。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一節 革命前的俄國政治	一
第二節 革命後的一般政治情勢	一一二
第三節 蘇聯政治的一般動態及其看法	一〇
第二章 從國家機構所見的政治動態	一五五
第一節 俄羅斯、蘇俄、蘇聯	一一五
第二節 蘇聯政治體制及其特質	一一八

第三章 從計劃經濟所見的政治動態	四六
第一節 蘇聯經濟的三度轉換	四六
第二節 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	五三
第三節 新舊五年計劃的任務與成果	六二
第四節 隨計劃經濟演進而展開的政治動態	七五
第四章 從民族民生問題所見的政治動態	七九
第一節 蘇聯民族民生問題的特質	七九
第二節 解決民族問題的途徑	八四
第三節 解決民生問題的途徑	九一

第四節 由平等的結合到平等的享受 九七

第五章 從外交政策所見的政治動態 一〇五

第一節 被封鎖中的奮鬥 一〇五

第二節 對歐洲的外交政策 一一〇

第三節 對東方的外交政策 一二〇

第四節 對美國的外交政策 一二四

第五節 在對外政策上反映出的政治動態 一二九

第六章 從軍事與國防所見的政治動態 一三五

第一節 赤軍的組織 一三五

第二節 軍事教育的普遍 一四一

第三節 海陸空軍的實力	一四五
第四節 東西境的國防	一五〇
第五節 政治上的國防總動員	一五七
第七章 從黨爭上所見的政治動向	一六二
第一節 蘇聯黨爭概述	一六二
第二節 正統派與反對派所爭論的主要問題	一七〇
第三節 正統派勝利以後的政治設施	一七九
第八章 從憲法改革所見的政治動態	一八四
第一節 蘇聯憲法的特徵	一八四
第二節 新舊憲法的比較	一九四

第三節 新憲法與民主主義 ······

一九八

第九章 結論——蘇聯的將來 ······ 一〇五

第一節 從國內情況看到的將來 ······ 一〇五

第二節 從國際關係上看到的將來 ······ 一一一

參考書 ······ 一二九

現代蘇聯政治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革命前的俄國政治

蘇聯是俄國在革命後的新名稱。在政治上，蘇聯對於俄國，乃是表示一個轉新的轉變與新的標幟。但俄國的歷史，卻並不因此就從中切斷。我們論述現階段的蘇聯政治動態，誠可不問及牠的過去；但如把革命前的俄國政治作一概括的回顧，那於我們在後面解述蘇聯政治動態時，有不少的方便。

由十九世紀初期到二十世紀初期的將近一百年中，俄國的一般經濟狀態一直都是比較落

後的。在那種落後經濟狀態下所表現的專恣而腐敗的政治，恰好是育成一九一七年大革命的溫牀。不過一九一七年大革命雖是對於過去俄國黑暗腐敗政治的總決算，但在這次總決算以前，俄國人民並非完全俯首貼耳的順受橫暴封建勢力的統治，他們在不斷的反抗，不斷的爲此後大革命撒播革命的種子，增積革命的戰鬪的經驗。爲了敘述上的便利，我們甚且可以把他們反抗專制封建勢力的幾個轉化階段，作爲理解革命前俄國政治的路標。那路標大體可區劃爲以次三個時代：

(一)十二月黨時代。

(二)人民黨時代。

(三)社會民主黨時代。

上面第一個時代即十二月黨時代所代表的，是十九世紀初期的俄國政治。人民黨時代所代表的是十九世紀中葉前後的俄國政治，而社會民主黨時代所代表的，則是十九世紀末乃至二十世紀最初的俄國政治。現在且分別述其梗概。

所謂十二月黨(Dekalristi)是指着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對專制政治發動革命叛亂的一羣黨人，因為暴動發生於十二月，故有十二月黨之稱。十二月黨叛亂所由發生的俄國政治經濟背景，大體是下面這樣：在十八世紀末乃至十九世紀初年俄國尚是一純粹東方的專制國家；無上專制的俄皇乃至他的貴族階層，完全是依着最殘酷的封建剝削，而度其奢華腐敗生活；在他們壓制下的廣大農民階層，連同他們苦苦耕作的土地，都是貴族地主們的私有物；貴族地主得任意把他們連同土地處理。他們因不堪壓迫，在十八世紀下半期雖發生過若干次暴動，但當時因為統治階層採行愚民政策，竭力禁止當時流行西歐的民主思想輸入，以致這些農奴暴動，都以缺少覺醒的知識份子的鼓吹與領導，而沒有演出何等有聲有色的成績。自一八一二年西歐的民主思想與立憲政制，隨拿破崙(Napoleon)的大軍衝入莫斯科以後，俄國一部分軍人以及一般有覺悟的知識份子，乃在拿破崙敗退後不久，醞釀着改革政制，改革農民經濟生活的革新運動。這個運動的中心表現，就是此後一八二五年十二月的十二月黨的叛亂。十二月黨發難係在彼得格勒，但其「最顯明的政綱和最堅決的運動，不在彼得格勒，而在離彼得格勒甚遠，即今之奇也夫斯基省、窩林斯基省、波

多爾斯基省的領土內，那是當時俄國軍隊主要力量集中之地，是極左的十二月黨組織的所在地。與十二月黨相關聯的所謂「斯拉夫大統一社」是由窮苦人們和下級軍官（特別是砲兵軍官中的知識份子）組織而成的……他們是合法的大斯拉夫主義的先覺者……以統一所有斯拉夫種族為一個聯邦共和國而建設偉大的自由的斯拉夫國家為職志……他們說他們是德謨克拉西主義者。」十二月黨與其派生的許多組織，雖然沒形成何等具體的黨綱，並且其參加人物中，還包含有若干開明的地主，以致今日尙論十二月黨的歷史意義的人，還說他們是純為擁護地主利益欺瞞士兵。其實十二月黨中的特出人物比斯特爾（Bistel）已主張在革命當中或革命之後，把所有國家的土地合併為一個公共的基金，嗣後將這基金，等分為二，一半分配居民，但不能作為私產，只可使用。另外一半歸國家處理，國家可將這土地大批出租，甚至可以出賣於私人。這主張在今日看來雖有許多漏洞，但在全俄國農民分領土地不及三分之一的當時，卻已經是非常有利於農民的激烈步驟了。不過，這個黨實際進行了的工作，只是運動彼得格勒等地的軍隊叛變，至若他們的主張和其斷片的綱領，在叛變很快的被鎮壓下去了的當中，自然沒有見諸實行的機會，但雖

然如此，他們實現立憲政制與取消農奴制的企圖，卻是灼然可見的。本來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叛變以前，還有許多祕密社團組織：一八一四年有『俄國騎士團』，一八一七年有『救亡同盟會』，一八一八年有『幸福同盟會』。所有這些組織，都是由於一八一二年拿破崙的轟擊莫斯科的大敗，驚醒了禁錮已久的俄國人的政治意識。

十二月黨失敗以後，俄國又進入一個新的反動時期。尼古拉斯第一 (Nicholas I) 鑑於十二月黨的叛亂，乃絕對排斥歐洲新思想的流入，禁止人民游歷外國，限制莫斯科大學的學生為三百人；密張文網，亂捕主張自由思想的知識份子。終尼古拉斯第一之世（一八二五年—一八五五年），俄國的政治反動，實較前一時代尤甚。亞歷山大第二 (Alexander II) 在一八五四—五年的克里米亞戰爭挫敗之餘，繼承皇位，為安定人心，雖不能不採行新政，於一八六一年下詔解放農奴，但放奴以後，農民疾苦，並未見減少。因為當時解放的土地，只以一半分給農民，此外則仍為教會皇室和私人地主所有。由是農民所分得的土地，極其有限，耕地既小，又無改良土地的資本，同時並還要負擔政府為分年償還地主代價而課加於他們的租金。結局農民的困苦狀況，反變本加厲。至亞歷山

大推行的其他許多新政，如設立地方自治，施行司法獨立等等，不但都是敷衍了事，且還是交給一般貴族官僚們去包辦。所以在一八六六年，就有加拉古作夫（Karakozov）謀刺亞歷山大的事件發生。當加拉古作夫被捕至俄皇之前，俄皇問他：『你為什麼要刺我？』加拉古作夫的回答是『因為你允許了農民的土地與自由而又欺騙他。』——這是一針見血的明確定案，但亞歷山大經過這次虛驚後，更採行極端的反動政策，由是反抗高壓的革命黨人都提出『到民間去』（Vnarod）的口號，而所謂人民黨（Narodniki），就是主張實行這個口號的革命團體。在一八七四年頃，由國外留學回來的學生，以及國內的大學生中學生，都分別到農村去作宣傳運動。有名的女革命家庇洛夫斯喀雅（Perovskaya）及無政府黨領袖克魯泡特金（Kropotkin）都曾為此種運動的參加者。事實上，巴枯甯（Bukmin）在一八六九年的革命策劃，已經主張首都及省城的宣傳員，轉到民間去，開始在貧窮的民衆中宣傳。這個『到民間去』的革命運動，雖然在不久的期間，即慘遭敗北，但『人民黨』的黨人，後來又組織名為『土地與自由』（Zemyla i Velya）的祕密團體，更由此團體產生一名為『人民的自由』（Varodnaya Velya）的恐怖組織，專以刺殺俄皇為事。然而

這種支離的活動，在保守的分散的農民羣衆間，不但不易激起革命的怒潮，且反而招來了更兇猛的高壓政策。到十九世紀最後一二十年間，俄國的專制政治還不會表現何等嚴重的動搖徵象。

人民黨革命運動的失敗，雖明顯指示俄國的專制統治，不是由少數知識份子鼓吹農民所能傾覆，但這個時代以後的革命視線其所以轉到都市的無產勞動大眾方面，那與其說是由於人民黨失敗的教訓，倒毋寧說是由於當時的經濟狀況，已許可或者已要求革命運動改變其途徑。原來在十九世紀最後三數十年中，俄國的政治，雖還是繼續着專恣的腐敗的黑暗的場面，但其經濟卻開始迅速發展起來。紡織工業、五金業、交通工業都有可觀的發展。由是，俄國工業生產價值，在一八五四年，所值爲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至一八九三年，值一、七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一八九六年竟值二、七五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工廠數目在一八五四年爲九、九四四，包含工人四六〇、〇〇〇人，至一八九三年工廠增至三二、四八三座，工人增至一、四〇〇、〇〇〇人。但到僅隔三年後的一八九六年，前者增到三八、四〇一座，後者則增一、七四〇、〇〇〇人。工廠工人隨工廠增加而增加，同時鐵道之加速延長（如在一八六〇年，俄國鐵道長度爲一、四

八八俄里，一八七〇年增長至一〇、二〇二俄里，到一八九〇年則已達到二七、二二九俄里，一九〇〇年且為四一、七一四俄里。）鐵道工人數當成正比增加。不僅此也，在工人數目迅速增加當中，其勢力又因工廠向大工廠集中之傾向而益增進；在一八九〇年度，俄國僱用工人千人以上的大工廠，已擁有全國工廠工人的百分之四十六。工人之增加與集中在勞資鬭爭上，乃能加強顯示其力量與階級意識。他們的集會結社雖被禁止，他們的罷工運動雖嘗為警察及哥薩克軍隊所鎮壓，但這種政治的高壓，適足以增強其潛行反抗運動。俄國有名的社會民主黨，就是在這種情勢下出現的。「勞動解放社」是最初的社會民主黨組織，在牠一八八八年所公佈的一八八七年綱領中有這樣的規定：「在現在這種社會和政治的鬭爭情形之下，知識份子的工作，首先便應注意於人民中更進步的份子，即產業工人。得到這部份人民的援助後，一有宣傳和鼓動的自由，則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便能擴大其影響於農民之中，而有更大的成功希望。」這個綱領所說明的，是把革命主體由農民方面移到工人方面。但因政府的高壓，俄國社會民主黨會經過許久的祕密工作，至一八九七年始在明斯克（Minsk）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此後又於一九〇三年在倫敦開第

二次代表大會。在後面這次代表大會中，社會民主黨中的份子，因為對於組織問題對於中等階級的態度，以及對於奪取政權的方法步驟，表示不同的意見，遂分裂而為布爾希維克（Bolshevik）與孟希維克（Menshevik）兩派。同時，與這兩派即與社會民主黨採取完全相異革命策略，即視個人恐怖主義為革命鬪爭唯一武器的，還有「社會革命黨」存在；他們繼承前一時代人民黨的革命精神，仍主張以農民為革命基礎羣衆。此後三月革命中的克倫斯基（Kerensky），就是該黨的領導人物之一。然則當時這些革命黨派活動的政治對象究是怎樣呢？

在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七年之間，俄國是由尼古拉斯第二（Nicholas II）秉政。他不顧人民的反對，依舊繼承前皇亞歷山大第三（Alexander III）的反動政策，不肯採行立憲政制。但經過一九〇四—五年的對日戰爭慘敗後，全國漸漸瀰漫了不安不穩空氣。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三日，皇叔佛拉提米爾公爵（Duke Vladimir）令軍隊向京城請願改善困苦生活的勞工大眾開槍，當場死傷千五百人，這次慘酷事變，激動了全國的悲憤，海軍叛亂，農村到處暴動，都市工人罷工。社會民主黨領導的工人羣衆，開始在聖彼得堡（即彼得格勒）組織蘇維埃（Soviet）掌握全國

工人運動的領導權，計劃全國總罷工到了同年秋天，總罷工運動開始，各地交通、運輸、生產機關完全停滯。在此嚴重局勢下，俄皇始於十月三十日下諭設立民選國會（Duma）。當時革命政黨內部缺欠統一，總罷工運動竟因此種緩和革命氣氛的敷衍策略，宣告停止。至十二月，聖彼得堡蘇維埃雖計劃進行第二次全國總罷工，但為政府的武力破壞解散，蘇維埃代表多被捕入獄。政府更乘此轉好局面，分遣軍隊剿平全國各地的暴動叛變。至一九〇六年以後，由比較普及方法選出的第一屆、第二屆國會都被反動的宰相司托里賓（Stolypin）所解散，因為這兩屆國會中的議員，有許多自由主義的革命份子；而此後依照新選舉法（工人農人選舉權蒙受嚴格限制的選舉法）選出的第三屆、第四屆國會，則差不多全是地主貴族及城市資產階級充當議員。這最後第四次國會，是到一九一七年革命時方始解散的。在第一次國會開幕的一九〇六年，俄政府還頒佈過一種剷除舊來農村公社（Mir）的土地法，這種土地法公佈的結果，貧農原來由公社分用的一點土地，雖有了私有權，但卻因此促起富農大地主的兼併，促起農村的階級分化。俄國是在這種政治的社會，經濟的場面下去參加世界大戰的。大戰爆發以後，俄國高級將領腐敗與作戰技術幼稚的軍隊，頗

非德國精銳軍隊的敵手。一次兩次慘敗下來，糧糈的不斷徵發與壯丁的不斷補充，使農村生產減少，耕地荒廢，致都市中的糧食分配，不能不採用麵包券制，許多市民，尤其是勞工大眾，往往鎮日不得一飽。而戰爭前方的敗耗警報，又繼續不斷傳來。在此內患外憂夾攻情勢下，羅曼諾夫 (Romanov) 王朝的統治，已經有朝不保夕之概，所以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舊曆二月）聖彼得堡城中因缺乏麵包及工廠細故引起的少數羣衆在街上的游行，遂招來了軍隊相繼叛變與不服從命令的嚴重事態。結局羅曼諾夫王朝因無法維持統治，乃迫而退位，由臨時政府收拾大局。臨時政府係由兩種政治勢力組成，其一為國會選出的委員會代表保守分子及自由主義者，其一為彼得格勒工人兵士及各革命政治力量合組而成的彼得格勒蘇維埃。後來極端保守派的份子，雖由革命羣衆的要脅，逐漸退出了政治舞臺，由「社會革命黨」首要人物克倫斯基組織幾次短命內閣，但克倫斯基政府對內對外的種種措施，都不能滿足氣勢洶湧的革命大眾的要求，甚且用軍隊鎮壓工人的暴動。由是在列寧 (Lenin) 領導下布爾希維克黨的中央委員會，乃於十月二十三日通過武裝暴動的決議案，至次月（即俄國舊曆十月）初六七日，布爾希維克黨得武裝工人海員及軍隊

中同情份子的擁護，起而佔領彼得格勒。各地紛起響應，不久便都在經過不大嚴重的抵抗之後，落到革命軍手中。布爾希維克黨在彼得格勒第二次蘇維埃大會中，由其佔代表中的最大多數，而把握了革命政權。

俄國政治歷史從此揭開了一個新的篇章，因政治上改頭換面，我們不再稱牠為俄國，而稱為蘇俄，更進而稱為蘇聯了。

第二節 革命後的一般政治情勢

關於蘇俄乃至蘇聯的概念，我將在次章詳加說明。

我在前節概述俄國在革命前政治狀況，及在那種政治狀況下的革命政治活動，主要是為了便於理解並說明其革命後的一般政治動態。特所謂政治動態云云，係就其一般的實際政治情勢，而指出其大體傾向，所以先把革命後的實際政治狀況，作一綜合的歷史的敍述，然後再一般的指明其動態，那是較為便當的。

在今日敘述俄國革命後的國勢或其政治狀況，大抵可分作以次三個時期，即（一）戰時共產主義時代，由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二）新經濟政策時代，由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七年；（三）第一、二次五年計劃時代，由一九二八年到今日。自然，第一、二次五年計劃，還是包含在新經濟政策範圍內，甚且蘇聯政治指導人物還聲稱第二次五年計劃的完成期（一九三七年）即新經濟政策的終結期。但事實上，新經濟政策推行到實施五年計劃，一般都承認其踏上了一個更新的階段，所以我們不妨依這種區劃時期的方法，來敘述其政治實況。

戰時共產主義時代是蘇俄政治上遭遇極大危機的時候。布爾希維克黨在十月革命後把握了革命政權，雖然立即以『人民委員會議』（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的名義，發佈三道命令：第一，提議和各交戰國議和；第二，宣佈將全國地主土地永遠收歸國有，由農民使用；第三，宣佈一切工廠收歸工人委員會管理，但極大的困難，即隨此種命令的宣佈，而連續發生。

土地工廠等等的所有者貴族地主資產階級，馬上匯合全國反布爾希維克黨的勢力，形成一個聯合陣線的『白黨』在全國各地發動叛亂。到了一九一八年夏間，『白黨』乘協約國在國境

東西地域的侵入和他們直接間接取得協約國的支援，幾乎把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其他附近若干充滿飢餓恐怖空氣的城市以外的廣大地域，概行佔領。蘇維埃政權在此種危急存亡之秋，雖然盡力擴大紅軍的組織，決死抵抗，把形勢稍微緩和過來，但至次年秋間，有名的但尼金（Denikin）將軍的白軍，已逼近離莫斯科兩百英哩的地方；同時另一白黨領袖宇登尼奇（Yudenitch）的軍隊，則已搏近彼得格勒。當時這些白軍的奧援，主要是佔駐烏克蘭的波蘭軍隊，自托洛斯基（Trot-sky）率領的紅軍，擊敗波蘭軍，且進而侵入波京華沙後，全般局勢又改變過來。這是一九二〇年夏天的事。

在此內亂過程中，帝國主義多方面的武裝干涉，演了莫大的破壞作用。布爾希維克革命的世界性質，當然要引起帝國主義國家的嫉憤；革命政權之取消外債，沒收外資在國內所建設的工業，更不免招來正面衝突。至其達爾、齊諾維耶夫、列寧等與烏拉爾、頓河、高加索、西伯利亞、遠東各區的農民，提議和交戰國媾和，那尤為協約諸國所難堪。不過，在大戰未終止前，協約國因有德、奧的牽制，尚未立刻採行武力干涉步驟；這時對革命政權的外來威脅，卻仍是德國。德國曾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強迫蘇維埃政府簽訂屈辱的布勒斯特·里多維斯

克條約 (Brest-Litovsk Treaty) 蘇維埃政府代表在簽字時曾發這樣的宣言：『我們絕不隱諱的昭告於德、俄兩國的工農兵和全世界被壓迫的勞動羣衆，我們迫不得已，不能不接受那擁有雄厚勢力的敵方所提出的最後通牒。』協約國與聯盟國停戰後，蘇俄雖在同年十一月宣佈這條約廢除，但當德奧於夏間敗北之始，協約國的軍隊就在俄國海口亞爾千奇爾 (Archangel) 海參崴 (Vladivostok) 等地登陸。英、法、日、美諸國一面對俄國施行經濟封鎖，同時卻以軍需品供給俄國境內的白俄，使俄國的內戰範圍擴大。但是到一九二〇年頃，紅軍的奮鬥，既逐漸把國內的亂黨肅清，各帝國主義國家的軍隊，也因紅軍與俄國廣大工農羣衆的反擊，和他們內部的衝突及國內人民的反對而相續撤去。

蘇俄在此抵禦外寇，掃蕩白黨的苦闘當中，除了一切舊來的社會經濟組織遭受破壞外，建設全談不到。工業生產總額減到了戰前百分之二十乃至百分之十五的限度。因都市缺乏糧食，大部分人都逃往農村；為避免都市飢餓起見，政府不得不向農民強迫徵發糧食，由是引起農民的騷動。在內亂外寇終結的一九二〇年，蘇俄本來可得一恢復疲困的機會，但到一九二一年秋，復又遭

逢一次稀有的大旱災，使俄國、烏克蘭南部以及克里米亞（Crimea）等豐腴之區，都變爲荒蕪的曠野，致全國餓死的人數，達到一二百萬，不過在此大旱災發生以前，蘇俄已採行了促成「剝極復來」局面的新經濟政策。事實上，新經濟政策可以說是戰時共產主義時代的走向建設之路的橋梁。

特我們得在此指明一點，這所謂新經濟政策，其概念其內容並不僅限於經濟方面，那是蘇俄整個國策或其全般內政所由轉動的中軸。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簡稱爲 Nep）係在一九二一年三月，經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而同大會通過此政策所發之宣言，曾揭其要旨說：『現在最切要的辦法，在乎擴張生產，而在實際上全國民衆的怠惰貧困，工作缺乏，困難達於極點。使我們不得不求生產的增進，俾足以分配於民間。』不過要使這種擴張生產的步驟見諸實行，同時還得解決一些牽涉到內政的前提條件，即須對資產者讓步，恢復小工業，使小農生產品得自由交換，從而恢復小商業。所以讓資本家經營蘇維埃政府所不能經營的礦業，（免許制度），以國有工業的經營工廠、森林、土地等得租給私人經營（貨貸制度），以國有生產物，招商人承賣，

以便小生產者的購買（推銷國貨制度）以及集合資本之團體，共同經營，使適合於經濟目的（協作制度）等等方策的施行，處處皆在表示蘇維埃政權在對資產階級讓步。不過大規模的工業，仍歸國家經營。土地等等，並非物歸舊主，不過對分得土地的農民收穫，以比較輕減的單一現物稅，代替全部剩餘徵收，至若在商業方面，對外貿易依舊由國家經營，所讓步的，僅是國內市場的小商務允許個人私營而已。在此政策實施之始，蘇俄政府要人亦曾表示：「現行經濟政策的結果，或者成爲問題，但對於牠的原則和主義，應無疑義。」但這種政策的結果，在幾年之內，即證示其非始料所及。由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蘇俄的工業生產額迅速不絕增加，農業產品亦隨耕地社會化範圍加大，與耕地面積增廣而日益加多。但在蘇俄開始新經濟政策步驟時，已經用武力干涉失敗的資本主義國家，卻認定蘇俄這種政策的推行，是表示與資本主義妥協，於是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召開基諾亞會議（The Genoa Conference），誘勸蘇俄放棄外債的取消與財產的沒收，但仍歸失敗。此後隨着蘇俄國內經濟狀況安定，列強間卒由對蘇俄經濟利害關係的不一致，而亂其一致，對俄的步驟。一九二四年二月，英國勞動黨內閣首先承認蘇俄，是爲列國與蘇俄恢復正常外交關

係之始。事實上，列強對蘇俄改變態度，與蘇俄國內隨經濟狀況好轉而導來的政治穩定情勢，亦有莫大關係。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四日，蘇俄已正式通過一種憲法，由這憲法，把內政上關於黨與政府，政府與人民以及各民族間的權利義務，都明確規定，而為蘇聯新國家新秩序立下堅固基礎。

但蘇聯今日之強盛與繁榮，卻主要是因牠在一九二八年開始推行五年計劃，所以第一二次五年計劃雖都應包括在新經濟政策範圍中，但新經濟政策到了實施五年計劃，已算踏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如其說新經濟政策開始的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為一般生產恢復到戰前水準的恢復期，那一九二八年開始五年計劃以後的時期，纔是建設期。關於第一二次五年計劃的全貌及其一般成果，我們以後還有機會詳細論到，這裏所要指明的，只是牠們所及於蘇聯內政外交上的影響。第一次五年計劃開始的一九二八年，正是資本主義世界恐慌的野火開始燎原的時候，此後蘇聯經濟日趨於繁榮，而世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憎惡與疑懼，甚至把牠們的恐慌，歸因於蘇俄的存在和搗鬼，由是導來征俄十字軍的企圖。但在另一方面，牠們內部對立的尖銳化，牠們與蘇聯利害關

係的差參，牠們各別國內勞動大衆與其殖民地人民的不同情緒，卻又在在阻制其對俄發動新的武裝干涉與包圍，使蘇聯爲增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爲成就建設計劃，且爲挽救世界勞動大衆遭受戰爭犧牲所採行之和平政策，得順利的收到實效，然而蘇聯由第一二次五年計劃所增強的國力，特別是由第二次五年計劃所增大的國防實力，同時卻又不斷地給予其和平政策以保障。

可以和平外交政策所支持的建設計劃，如僅止於增大國力，增大對外防衛的國防實力，那將與資本主義擴張生產擴張軍備的要求，沒有了不起的差別。所以兩次五年計劃的真正效果，與其說在工業農業生產數字的如何增加，紅軍坦克車、飛機、大礮數字的如何擴展，無寧應注意其各種產業中的社會主義化成分的如何增進，一般勞動大衆生活水準的如何向上。即在蘇聯經濟建設迅速向前突進的當中，其社會政治的基礎亦發生重大的變化。結局，在一九二三年通過，一九二四年公佈的憲法，已不能適應新時的客觀環境及其要求。所以在一九三五年第十七屆蘇聯全國代表大會上，就提出了修正蘇聯憲法的提案。這提案經大會通過後，即推舉斯大林 (Stalin) 等三十人成立憲法修正委員會，從事修正憲法的工作。經過一年餘的擬案研討，至去年十一月始於蘇

聯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中修正通過新憲法，並且此新憲法自即日起發生效力。關於新憲法的全般政治意義，將待後面專章討論，這裏所要指明的，就是自經此次新憲法公布，蘇聯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乃正式實現。

要之，革命後的蘇聯曾由其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未上正軌的混亂政治局面，經過新經濟政策前期的不徹底的半民主政治，而達到現階段的完全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第三節 蘇聯政治的一般動態及其看法

在蘇聯政治的實際演變中，我們大體上還可把握住牠的幾種顯著趨勢或動態，那動態可就以次四個方面來講：

第一，由世界革命到一國社會主義建設 誰都知道，共產主義是國際的是世界的。以共產主義為其理想目標的蘇聯，當然要求世界各國都走上共產革命之路。並且，在過去，牠還認定一國孤立的建設社會主義，在事實上很少可能。所以蘇俄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對於喚起世界被壓迫民

族，喚起各資本主義國家之被壓迫無產勞動大眾的活動，非常積極；即在新經濟政策的成果，尙未能明確斷定的新經濟政策時代的初期，牠對於鼓動世界各國革命怒潮的努力，亦還不會表示怎樣懈怠；不過，一進到這個階段，牠的那種努力，已不是先前那樣露骨，那樣積極了。在第一次五年計劃開始之頃，牠已有了一國能建設社會主義的確信，牠這時漸漸認定防衛社會主義祖國，奠定社會主義基礎的工作，較之加速促使各國走向社會革命的活動，尤為重要。在這種前提認識下，最近幾年的蘇聯內政外交，都在針對着一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而邁進，對內清除世界革命路線的反對派，對外採取和平政策，都不外此種政治動態的反映。不過，蘇聯政治的傾向『一國社會主義』路線，那並不能證明牠已放棄世界革命企圖，只不過對於那種企圖的實現，採取了迂迴而穩當的途徑罷了。

第二，由階級國家到國民國家 在一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蘇聯這個國家本身在不絕變化其性質。蘇聯革命的理想，原在消滅階級，從而消滅由階級關係導來的國家，以期達成完全計劃經濟的社會。但這種大理想，只能實現於世界革命大告成功的瞬間，蘇聯既暫時放棄世界革命

路線，當然只好求牠一國之中的階級對立關係的剷除；然而剷除階級對立關係的政治活動，實際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必然成果。所以斯大林在去年（一九三六年）第十八屆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中說：『……與蘇聯經濟之此種變動相應，我們社會之階級結構亦已改變。我們知道：前此內戰勝利的結果，地主階級早經消滅；其他剝削階級的命運，亦與地主同。工業中的資產階級是不存在了，農業中的富農階級也不存在了；貿易上的大商人及投機者亦已絕跡。一切剝削階級全都肅清，剩下的只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智力勞動者。』由是在第二次五年計劃將要完成的今日的蘇聯國家，與新經濟政策乃至第一次五年計劃剛剛開始時的蘇聯國家，已經是面目全非了；如在對稱上，以前者為階級國家，則後者便算無階級的全國民的國家，由於國家性質的這樣潛移默化，在政治組織上亦相應改變舊觀。

第三，由一階級專政到徹底的民主組織 蘇聯在開始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在經濟上，雖對資產者承認了許多妥協的步驟，但那些妥協步驟的採行，是為了要穩定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所以在政治權力上，牠始終保持着一階級專政的場面，多方阻制資本家，富農，投機商人們的活動，剝削

他們的政治的社會的權力，使其在經濟上的地位，由降落以至消失。此等剝削階級的失其存在，在於是蘇聯舊來（一九二四年公佈的）憲法所規定的許多有關階級的差別待遇，乃失其時效，而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新憲法的頒布。新憲法根本在保障並增進工農階級利益。從表面看，這雖仍舊保持着一階級專政的外觀，但因蘇聯只有工農階級存在，故由新憲法規定的選舉權及政治組織等等，乃為徹底民主的。

第四，由綜合的統制到高度的有機統一 現階段的蘇聯，雖然在實現一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途中，暫時中止或弛緩其世界革命的步驟，但在其國內政治組織上，卻顯然是徹底國際的。牠是一個包含百餘種民族的國家。在革命後的相當期間，蘇俄雖然綜合了這許多民族，而呈現一種『民族博物館』的外觀，但在各民族間，各民族對於俄人，乃至俄人對於其他各民族，並未能完全消泯相互異視與疑忌的心理，所以斯塔林在前述第八屆蘇維埃代表大會中，曾說：『目前奉行之憲法，乃一九二四年所公佈；當時各民族間關係尚未照應有的方式奠定，當時對於俄人之猜疑，尙未完全消除；離心力之作用，依然存在。在此種條件下，乃必須在經濟的政治的及軍事的互助基礎之上，

建立各民族的友誼的合作。」特當時的所謂互助基礎之上的友誼合作云云，尚是一種期望，期望由此等方面的綜合統制活動，以克服其不自然心理，然後再在無種族畛域的一切人民之間，完成更高度的有機統一。過去十餘年努力之結果，已把各民族相互猜疑之情緒消滅，由是蘇聯的政治組織，乃更能發揮其有機統一機能。事實上，蘇聯政治機構之能逐漸向着有機的統一發展，還有其他更基本的促成因素，在（我們將在次章說明，）各民族間之消除畛域，不過其一例證而已。

以上諸端，要皆蘇聯政治的最一般的動態。當前蘇聯的政治，顯然不會完全達到理想的境地，但卻在或急或徐或直接或迂迴的向着接近理想之途邁進。我們今日來觀察蘇聯政治動態，大體可由縱橫兩個方面着眼。縱的方面，就是由牠整個政治的演變歷程，而把握其動態；橫的方面，就是由其國家機構，國民經濟計劃，民族問題，文化政策，軍備設施，外交政策，新憲法等等方面，來分別把握其政治動態。我們知道，社會主義制度，是以統合的計劃的行動為其特徵。在那制度之下的一切設施與行動，都可明顯的反映出其政治的動態，所以我在下面的敘述，特別採取這種縱的考察的方法。

第二章 從國家機構所見的政治動態

第一節 俄羅斯·蘇俄·蘇聯

記得在數年以前，中國某大學一位教授曾力言美國非帝國主義國家，他的論據是美國始終沒有皇帝。他這種曲解，在今日還被人視為笑談。事實上，今日把俄羅斯、蘇俄、蘇聯混作一談，或照舊稱蘇聯為俄羅斯的學者教授們，其不肯細心研究名辭涵義的糊塗本領，比之那位美國非帝國主義論者並沒有遜色。

俄國在革命以後，單就量上或範圍上講，俄羅斯已不能與從前同日而語。蘇俄只是構成蘇聯的一個部分。不過蘇聯的成立，不是革命甫告成功以後的事。換言之，即現在蘇聯所具的政治體制，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並還沒有形成。戰時共產主義時代的國事重心，全集注在軍事方面，當時在

實際上的至高無上的權力機關，就是革命軍事蘇維埃(Revolution-War Soviet)。

蘇維埃最初只是在俄羅斯本土贏得勝利，取得支配權，以後始漸次擴大其支配權於其他共和國。不過這所謂擴大其支權云云，並非首先在俄羅斯境內取得支配權的俄羅斯·蘇維埃（簡稱蘇俄）對於其他諸蘇維埃共和國行使隸屬的支配。俄羅斯·蘇維埃在先誠爲其他一切蘇維埃共和國的引力中心，爲內戰時代之諸蘇維埃共和國的軍事防禦的指導者。但內戰一經結束，蘇俄即已拋棄其中心指導地位，與其他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平等的聯盟關係，所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就是對於蘇俄與其他一切蘇維埃共和國的最高機關。此種統一係基於一切加盟共和國的願望，而其第一步的實現即是在一九二二年終，由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外高加索諸共和國代表，在莫斯科簽字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一九二五年初，烏仔伯克(Ushibeki)共和國與土耳其曼(Turkmen)共和國自動加入聯盟。至一九二九年烏仔伯克共和國中的大吉克(Tadzhiki)自治共和國，又由其離烏仔伯克獨立，而成爲聯盟之一構成部分。迄乎今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一共包含有十一個有平等權利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除上述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烏仔伯克、土耳其曼、大吉克外，外高加索所屬三自治共和國即喬治亞（Georgia）、亞米尼亞（Armenia）及阿才倍疆（Azehbaidjan）皆獨立加入聯盟，再加吉爾吉斯（Kirkis）與哥薩克（Gosak）兩共和國，合共十一」而這些加盟蘇維埃共和國，除亞米尼亞、白俄羅斯、土耳其曼、吉爾吉斯四共和國外，其餘分別包含有自治共和國、特區或省。俄羅斯蘇維埃所轄版圖最大，計包含有五個特區，十九省，十七自治共和國，六自治省；所以他本身又是一個聯邦，一般通稱爲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至於烏克蘭、阿才倍疆等蘇維埃社會共和國所包含的自治共和國或自治省，這裏不欲一一述及了。

總之，今日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或一般簡稱的所謂蘇俄，在範圍上，在性質上，都與過去俄羅斯或大俄帝國的意義判若霄壤，而牠對於一般簡稱爲蘇聯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則不過是其所轄的十一個平等而分別獨立的蘇維埃共和國中之一份子。此種區別，不但使我們知道蘇俄與蘇聯爲兩個不同範圍，不同性質的概念，同時且可使我們明白今日蘇聯國家的大體輪廓。

第二節 蘇聯政治體制及其特質

在解釋蘇聯政治體制或其結構以前，先得說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The Union of the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s）。這個冗長名號中的『蘇維埃』一辭的意義。蘇維埃（Cobet）原義為會議，為羣衆的鬭爭機關，如像罷工代表會議之類。這種代表會議發展而為政權，與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議制度完全異趣；由代議制度產生的議會，在選舉方式上，在職權行使上，通是照着資產階級的意思行事，並非代表全體民衆的意志；反之蘇維埃卻是由全體勞動人民直接選舉出來，代表全勞動人民的意志，而執行其要求。蘇維埃誠是一種勞動階級專政的政權形式，但牠不像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議制；第一代議制雖然顯而易見的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專政，卻被僭稱為民主的，為全民的；第二，前一種專制是社會最大多數人的，而後者則只限於少數資產者，而此少數資產者中，又由更少數的更有資產的人所把持；第三，蘇維埃專政到了一定時期，即到了社會剝奪階層完全失其存在的時期，就要變為真正全民的民主的政權，而代議制則延續愈久愈會形成寡頭。

的御用機關。

惟其蘇維埃具有這些不同於現代代議制的性質，故以此為核心而形成的蘇聯政治體制，就是下面這樣：

據一九二三年通過的蘇聯舊憲法：『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最高權力機關為蘇維埃代表大會，而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此最高權力機關即蘇維埃代表大會，可行使以次職權：（一）在外交方面，代表聯盟簽訂條約，宣戰媾和，變更國界或邦界等；（二）在財政方面，制定聯盟及各共和國的共同稅，制定聯盟歲出歲入的預算，發行聯盟及各共和國的公債，制定聯盟領域內的流通貨幣，批准各共和國的附加稅；（三）在經濟方面，制定聯盟的經濟計劃，訂立對內對外的條例，管理運輸及郵電，制定度量衡，制定勞動保護法，規定工廠的與租佃的契約；（四）在法制方面，編定民法、刑法、訴訟法事；（五）在軍事方面，編成並指導聯盟全部的軍隊；此外取締全聯盟內的反革命行動，解決聯盟和各邦間的爭議，廢除各邦和聯盟憲法抵觸的決議等等，亦屬於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的職權。此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

係由各省各市選舉出來的。照舊憲法，省蘇維埃代表大會，可以按照戶口十二萬五千名選出代表一人，市蘇維埃代表大會可按照戶口二萬五千名選出代表一人，選舉出來的代表，大約在一千五百人以上。

此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每兩年舉行一次，在閉會以後，便把職權移交於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此執行委員會，係由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選舉，為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聯盟最高政權機關。其法令在聯盟全境，有當然執行的效力。牠在代表大會閉幕期間，除了無權變更憲法（變更憲法，為代表大會權限）外，得採取任何立法的決定。

這個聯盟執行委員會，有兩個會議或兩個院為其構成部分；一為聯邦院（The All Union Council），一為民族院（The Council of Nationalities）。聯邦院係由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從加盟各共和國代表中選出，每個共和國當選代表人數，以各該共和國人口數目為比例。至民族院之組織，手續完全不同，參加民族院的代表，係由共和國自治共和國各選代表五人，自治區各選代表一人組成。此種選舉，由各該共和國及各該自治區直接辦理，蘇維埃代表大會則不過保留着確認

其結果的權利。此民族院與聯邦院都有同等的權力。中央執行委員會所討論的一切法案，如果得不到這兩院的許可，不能發生效力。兩院如關於某一問題發生爭議，可交由此兩院的聯席會議解決，如聯席會議解決不了，則提交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

由民族院與聯邦院合組的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在閉會以後，其職權由該委員會的主席團代理，即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為該委員會閉會期間的最高行政機關。不過主席團的決議案，執行委員會有予以取消的權能。主席團人數為二十七人，就中九人由聯邦院選出，九人由民族院選出，九人由兩院聯席會議選出。更在此二十七人所構成之主席團中，選出七人為主席。

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更由同委員會直接選出代表組成一個人民委員會(The People's Commission)。此人民委員會相當於各國的內閣，為一行政管理機關，但在附與權限內，對於聯盟全境有發佈命令的權力。各加盟共和國最高機關，對於聯盟人民委員會的命令，得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抗議，但不得中途停止其實行。能够取消或中止人民委員委員會的政令及命令的，只有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

人民委員會內除議長及副議長（通由中央執行委員會直接選舉）外。另設人民委員部十三，但此為一九三三年以前情形，自一九三四年起，多有增改，各人民委員部的組織，大致相同，惟其所轄機關不等。各人民委員，即為各該部部長，與各國內閣制下之各部及各部長之權力與機能關係，均無若何差別。茲把各主要人民委員部列舉於後：

(一) 外交人民委員部，下設西方政務局，東方政務局，經濟法制局，情報局，總務局，聯盟駐外使領，通歸該部管轄。

(二) 內政人民委員部，下設行政編制局，警衛局，刑務局，共產經濟局，總務局。

(三) 財政人民委員部，下設行政，預算，中央租稅，造幣財政經濟，通貨，地方財政各局。國立銀行與國營保險，也由其支配。

(四) 貿易人民委員部，下設總務，統計經濟，貿易調節，法制，財務，計算，關稅，國營對外貿易各局。此外還包括內地貿易支部十七處，駐外貿易代表機關十七處。

(五) 交通人民委員部，下設鐵道運輸，內河運輸各中央管理局與其他事務機關。

(六)教育人民委員部，下設組織行政部，專門學術部，社會教育理工教育管理局，技術專門學校與高等學校管理局，成年人學校教育及政治教育管理局，各民族教育會議，國營出版管理局，文藝出版管理局，攝影及電影管理局，學校及文化用品管理局。

(七)革命軍事委員部，蘇聯最高軍事機關，爲以陸海軍人民委員部爲中心之革命軍事委員會，其任務爲司陸海空軍之指揮，教育，經理及補充等事項，並準備戰時國防。

(八)郵電人民委員部，計轄四管理局；行政局，總務局計劃局，營業技術局。

(九)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其目的爲使勞動者及農民能直接監督國家一切機關及一切企業，使其不致浸染腐敗的官僚主義的色彩。下設總務局及中央監督局，後者掌管之職權範圍，計包括(1)食糧及農業(2)技術及工業(3)勞動、保安、衛生(4)行政(5)教化及宣傳，(6)財政，(7)外交，(8)陸海空軍，(9)交通，(10)燃料。

(十)農務人民委員部，下設中央行政管理局，中央農業管理局，中央土地整理局，移民輸送管理局，中央畜產管理局，中央獸醫局，中央水利管理局，中央森林管理局，中央農村經濟計劃管理局。

理局。

(十一)勞動人民委員部，下設總務局，勞動市場局（司勞動市場一般的調節）勞動保護局，爭議調解局，中央社會保險局，統計局，學術部等等。

此外還有民族事人民委員部，司法人民委員部，社會保護人民委員部，糧食人民委員部，重工業人民委員部，輕工業人民委員部，木材人民委員部。這些部所管的職務，大抵可就其名義而推知。重工業輕工業及木材三人民委員部，係由以前的最高國民經濟院所劃分。

除此各部外，附設於聯盟人民委員會的機關，還有（1）中央利權委員會，專爲接洽外國資本投入國內產業。凡屬不必經中央執行委員會認可之一切利權條約，均由本會締結。（2）蘇維埃統制委員會，其前身爲監視五年計劃實施之實施委員會，至一九三四年與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合併而爲此蘇維埃統制委員會。（3）最高法院，最高的審理機關。（4）勞動國防院，此在蘇聯政治組織中，佔有極重要地位。舉凡蘇聯國民經濟大綱及國防方策，均由此會決定。此會委員，形式上雖由人民委員會選任任命，爲人民委員會之一附屬機關，但實際上委員均由中央機關代表中選任掌

有蘇聯全境最高經濟國防設計之大權。

以上所舉述的各種機關，均爲屬於蘇聯中央的政治權力機構。此等機構咸在不絕增併改革過程中，不過其立法行政之大體輪廓，不外如是而已。

至於隸屬中央的各共和國、自治共和國以及省縣等地方單位，皆是各以蘇維埃代表大會爲最高機關，市與村，則以蘇維埃爲最高機關。

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其職權由其所選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行；同樣，各加盟共和國在其蘇維埃代表大會閉會期內，其職權亦是由其所選執行委員會代行。在此執行委員會以下，也設有人民委員會，各人民委員部。特在其人民委員部中，有的是聯盟人民委員部的支部，有的是直屬於各加盟共和國的如內政、司法、教育、農務、社會、保安等人員委員部皆是。

一省的最高政權機關，是省蘇維埃代表大會；該會每年召集一次。閉會後，其職權由其選舉出來的執行委員會代理執行。該委員會之委員，不得超過二十五名。其下設有行政、軍政、財政、農務、勞動、食糧、工農檢查、國民經濟、教育、社會、保安、衛生等部。

一縣的最高政權機關，爲縣蘇維埃代表大會；該大會每年召集一次，閉會期內，亦同樣由其所選出之執行委員會代行。執行委員會之下，亦設有有關一縣各方面活動的行政、財政、勞動、教育等部。

其他如一市一區的最高權力機關，亦是分別爲市蘇維埃代表大會，區蘇維埃代表大會，其閉會期內，亦是各別由其所選執行委員會代行。不過有些市不設執行委員會，直接由市蘇維埃代表大會底下，設定相當於省執行委員會下面所設的各部的組織。區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由村蘇維埃選派，每一個村蘇維埃人員十名，選派代表一人。該大會選出三人組織區執行委員會管理關於土地，文化，勞動等行政職務。有四百人以上的村落，可以組織村蘇維埃。

* * * * *

上面是蘇聯政治體制的全貌。從這體制中，我們可以看得出牠的許多特質。

第一，在保障工農無產大衆的獨裁。列寧在一九一八年起草憲法第一部分——勞動和被剝削民衆的權利宣言中曾說：『蘇維埃共和國之基本任務，即在消滅人與人之剝削，廢除社會之階

級區別，嚴厲鎮壓剝削者，以確立社會主義之社會組織。」又說：「俄羅斯今宣佈爲「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和地方之全部政權，均歸蘇維埃所有。」我們由前面所述的蘇聯整個政治體制，可以看出『中央和地方之全部政權，均歸蘇維埃所有。』由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加盟共和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省蘇維埃代表大會，縣蘇維埃代表大會，以至村蘇維埃，分別爲各該級最高政權機關；這最高政權機關，不允許參入任何剝削者，爲純粹工兵農所組織。惟其各級政權一絲不漏的把握在工農勞動大衆手中，故一切政治社會的設施，皆能向着嚴厲鎮壓剝削者和消滅人與人間之剝削的基本任務做去。因此，把蘇聯政治與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一加比較，就很容易見出其特質，即資本主義國家儘管倡言國家主權是屬於全體人民的，但其政治理制完全是照着資產者階層的意向與便利而組織；在蘇聯，卻毫不掩飾的主張國家是階級的工具，國家的權力，僅屬於工農代表者的蘇維埃。

第二，在維繫各民族間的自由與平等。蘇聯曾被人稱之爲『民族博物館。』牠境內包含有大大小小的一百幾十個民族，其中人口在百萬以上的民族有九個之多。民族問題，本來是近代資本

主義世界最感到沒有適當辦法解決的問題。但蘇聯卻把這些複雜的民族團結在一個體制裏面，這是有什麼祕訣呢？單就其政治組織方面說，那可以使我們理解此種關鍵。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領土範圍，並沒有一個確定界限，任何民族均可自由加入聯盟，而已經加入聯盟之共和國，亦均有隨時脫退聯盟的權利。這就是說各民族在聯盟中，是非常自由的。但單是政治的自由，還不夠成為牠們團結的原因，反之，甚且容易視為其分離的原因。十餘年來，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並沒有脫退的現象發生，各民族間，且不會表現何等不愉快的爭端，推厥原因，不外蘇聯各民族在政治上，從而在其他一切方面，均享有絕對的平等權利。蘇聯政治體制中之民族院的重要地位及其組成方式，即可說明此點。凡在蘇聯境內的民族，不論其經濟文化發展程度如何懸殊，均一律平等。這與凌虐弱小民族的資本主義世界，恰是一個對照。不過關於此點，我們後面還有論到的機會。

第三，在確保有機的統一機能。三權鼎立制差不多成了近代政治制度史上的金科玉律。即把立法、司法、行政分屬於三個機關，使這些機關在相當程度內得各別獨立的行使其職權的政治組織，迄今猶為世界各國所遵行。我們現在且不論這種政治制度的利弊，不過蘇聯的政治體制，已獨

倡一格了。蘇聯最高的政權機關，爲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這是前面已經講過的。這個大會的權能，對於立法、司法、行政的機能，都兼而有之。比如，該大會在閉會期間代行其職權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有公佈法律，命令及審核預算之權，這顯然是行着最高立法機關的機能，但牠同時，又是蘇聯最高行政機關，處理日常行政事務的各人民委員部，就是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中選出的人民委員充當部長。而司法最高機關的最高法院，亦是附屬在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總之，蘇聯政治體制之有機統一機能，是特別顯著的事實上，這種統一機能，並不限於政治體制本身。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切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個人經濟文化等活動，在蘇聯都須由國家設定計劃處理，所以蘇聯政治不但本身上保持統一機能，而對政治活動以外的其他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活動，即大體在資本主義國家屬於個人的活動，亦都成爲其政治機構中的重要部門。

要之，蘇聯政治是具有許多特質的。牠那每種特質，都與其社會主義組織相適應，且爲社會主義的要求。所以蘇聯國家之社會主義機能或因素增大，其政治體制亦相應而有所變革。

第三節 國家機構再組織的動向

前面已經講過，蘇聯國家在不斷迅速改造過程中，而適應國家實際情勢的國家機構本身，亦不能不繼續推移變革。加之，蘇聯的政治組織，完全是一種新的創作與嘗試，要求其在實行上完全沒有缺陷，勢所難能，照『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的說法，蘇聯國家組織之屢屢更張，卻並不是一個什麼不好的現象，反之，我們倒可由其政權機構的再建或再組織，而發現其政治的前進動向。

在一九三五年蘇聯共產黨十七次大會席上，斯大林曾有這樣的說明：『依着再建階段的要求，勞動組合產業合作社，蘇維埃，以及其他大衆組織的一切實際活動，均須再建。』而在同次黨大會席上，組織部長加干諾維奇(Caganovic)曾提出關於組織問題的報告，對於官僚主義與多數委員制之弊，曾痛加指摘。結果，大會根據加氏的報告，作成組織問題之決議。於黨的方面，廢除中央統制委員會，另設立黨統制委員會；於行政方面，廢除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而代以蘇維埃統制委

員會。此外，還有許多改廢，有的前面已經述及，有的尚未述及，概言之，約有以次諸端：（1）廢止最高國民經濟會議，創設重工業輕工業木材業之重要生產關係的三人民委員部；（2）改造農務人民委員部；分設國營農場人民委員部；（3）廢止革命軍事會議，改海陸軍人民委員部爲國防人民委員部；（4）廢止國家保安部，新設內務人民委員部；（5）把配給人民委員部，分離創立國內商業人民委員部與食料工業人民委員部；（6）新設指導監督地方工業的地方工業人民委員部；（7）在各加盟共和國內，新設公益事業人民委員部；（8）廢止勞動人民委員部，擴大聯盟勞動組合中央評議會的權能；（9）鑑於領券制廢止所引起的國內商業的重要，新設國內商業監察局；（10）郵電人民委員部改稱爲郵政人民委員部等等。

所有這些改革方案，都逐漸見諸實行，至其改革目的，一方面固在求行政效率的增進，一方面則是因應實際環境改變的要求。至一九三六年夏季，蘇聯國家機構又有許多進行再組織的項目。舉其瑩瑩大端，則爲

（一）把行政、經濟的結構，依生產和地域的區劃改組。

(二) 在剷除國家機關之官僚缺陷的鬥爭上，引進民衆，引進地方機關及生產機關的大衆。

(三) 廢止各人民委員部的參與會，任命一個或兩個人民委員代理，新設一個由四十個到七十個委員所組織的人民委員部會議（蘇維埃），這種人民委員部會議的委員，應有半數以上爲地方機關及生產團體的代表者。

(四) 廢止由下級生產單位到人民委員部的事務分割上的結構；並且爲根本剷除指導上之細分，複雜化與迴避責任的弊害，各機關採用責任一頭制。

(五) 使國家、經濟機關的最高責任者，常能檢查對於上級機關之決議及命令實行到何程度；廢止各機關從來特設的實行檢查課。

(六) 使右述責任者自行指導勤務員的選擇及配置，使技術人員大部分由事務所移到工作處。

(七) 為使右述責任者學習關於其職務的基本技術，規定其在最短期內所要學習的技術的最低標準。

(八) 組織大都市各區以下的蘇維埃及村蘇維埃代表者團體，特別使婦人多多參加此種團體。

(九) 國營企業的監督權及消費組合監督機關的指導權，移讓於勞動組合。

(十) 經濟機關方面的企業聯合廢止，托辣斯減少。

(十一) 使直屬於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黨代表，以政治局長的資格，加入人民委員部，擔當人民委員指導下之有關政治的事務。

(十二) 國家、經濟機關的人員，縮減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力求各種報告形式的簡單化，此種事體，由蘇維埃統制委員會監督施行。

所有這諸般改革，不外兩大目的；其一是把從來繁冗的機械的，公式的，多頭的命令系統，使其統一集中於人民委員（或各經濟機關的長官）的責任一頭制，而簡單化明瞭化。斯塔林曾表述此種意見說：『有誰能够確言給予了良好的政治方針，就認為滿足呢？不僅是如此，不過完成一半工作。給予了正確方針之後，還須選擇有實行指揮能力的，能當作自己的事來接受此項命令的，能

實施此項指令的人就任職位，否則政治就無意義，終歸於純粹的空擾。』事實上，列寧早經更明確的說明責任一頭制的重要。他在一九二一年提出新經濟政策實施案時曾說：『許多人以為委員制度，是勞動階級的行政及經營方法，而一頭制度，則非勞動階級的行政及經營方法。實大謬不然。多頭委員制雖為必要，但在行政效率方面，頗足障礙事務之進展，不能使事務充分迅速執行。為使工作得以進展計，必須選擇一有能力且能精巧的辦理工作的人，推為領袖，使其對事務之結束負完全責任。』由蘇聯最高指導者所提示的這些意見，我們當然明瞭蘇聯過去並非沒有注意到統一集中命令系統的責任一頭制，特在創制伊始，無法求其完善，而在推行事務進行中不斷發生的障礙，乃逐漸促進其向此方面努力。

至若上述諸般改革的另一目的，則是強固上層機關與下級機關間的密切聯絡，並極力使一般生產大眾，由地方機關或生產機關的代表者會議，即新設的人民委員會議，向上層機關表達下級生產機關大眾的意志，擴大民主主義的方法，以妨阻官僚化的弊害的發生。至若其他中央機關方面之徹底的行政整理，以及前此隸屬勞動人民委員部的企業監督權等等之移讓於勞動組合，

皆不外此種民主主義化動態的表現。

總之，蘇聯國家機構再組織的目的，不外是加強中央集權化與民主主義化的兩種趨勢。亦可說是體現民主主義的中央集權的要求。他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第十八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所宣布的新憲法，那在一方面固然是蘇聯國家機構上的一次全面的劃時期的大改革，但同時卻也不過是民主主義中央集權化傾向之更具體徹底的表現。不過，由新憲法所引起的政治機構上的大改革的實際，及其一般的動態，我將留在後面專章說明。所以這裏不欲贅述了。

第二章 從計劃經濟所見的政治動態

第一節 蘇聯經濟的三度轉換

蘇聯經濟與在今日還佔有極大勢力的資本主義經濟，是一個正相對立的對照。這對立可就生產與分配兩方面來分別解說。就生產上講在資本社會主義中，像土地、工廠、工作坊一類生產工具，都是爲不事生產，或站在生產圈外的地主資本家所有，而在蘇聯，這些工具已由他們手中奪過來，交給工農羣衆了。就因此，蘇聯發展生產，就不是依照競爭的原則，尤其不是保證資本家的利潤，保證地主的地租，而是依照有計劃的經濟組織有系統的提高工農大眾的物質生活水準與文化生活水準。就分配上講，資本主義社會的地租與利潤一類不勞而獲的經濟形態之產生，原本是由於生產工具的私有。蘇聯社會既不許生產工具爲任何人所佔有，故其國民所得的分配，就不是

資助剝削階級及其附屬的寄生者之致富，而是有系統的改善工農之物質狀況，增進城市與鄉村的計劃的生產。從這兩方面看來，蘇聯經濟的社會主義特徵，是顯而易見的。

不過這就今日的蘇聯經濟情形來說，雖不失為妥當，但對於現階段以前，卻不能一概而論，因為在革命後將近二十年間，蘇聯經濟並非成一直線前進，在其前進過程上，曾迂迴曲折的經歷三度的轉換。我們前面舉列的新經濟政策，對於戰時共產主義經濟是一個轉換；五年計劃對於新經濟政策前期經濟又是一個轉換，而第二次五年計劃將待完成的現在，則是臨着第三個轉換期中。

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原來的制度，全歸破壞，一切生產工具全屬於工農的蘇維埃政權。蘇維埃政權，努力把全經濟轉化為單一組織的一體。在此單一全體上，生產依照計劃而行，分配則由國家機關依一定規範而行；都市與鄉村的聯繫，一靠『生產品交換』的組織，都市不用備價獲有穀物，農村則不用備價由都市供給工業生產品。像這樣的組織，表面上非常類似社會主義的秩序。在某種限度內，這可算是社會主義下面組織了的經濟的原型，但不是真的社會主義，那是由貧困，破產與激烈鬭爭條件所強迫形成的戰時的消費的共產主義，是勞動者與農民之軍事同盟的經濟。

政策。經過三年戰爭（帝國主義戰爭）的俄國經濟，又益以此種軍事的共產主義經濟政策的數年活動，以致在一九二一年之初，蘇聯經濟狀況已達到了這樣悲觀的景象；全部工業生產爲戰前水準百分之十七；煤的生產於一九一三年爲二千八百九十萬噸，一九二一年減至八百五十萬噸；煤油的開採，則自九百三十萬噸降至四百萬噸；鍊鋼由四百二十噸降至十一萬六千噸；鎔鐵爐一百三十六座，僅剩下十七座。農業生產只達戰前百分之五十五；其供給市場之商品部分減少尤多；鐵道運輸在一九一三年爲一萬三千二百四十萬噸，一九二一年則爲三千九百四十萬噸。

處在這種生產極度減退的貧困狀況下，食料與燃料缺乏的普遍恐慌。由強制徵發農產物所引起的農民的怨憤與騷擾，以及落井下石的帝國主義的加緊封鎖，早使蘇聯政府當局不能不採取恢復經濟的新步驟；因爲他們知道：戰時共產主義，決無法擴張生產，從而決無法克服貧困。克服貧困既以擴張生產爲前提，在農民迴避徵發，因而引起惰風大熾的情況下，決計不能使後進的農業的俄國經濟得到昭蘇機會，由是使小農生產品得相當私有，並得自由交換的步驟，乃成爲新經濟政策的核心。小農生產品既然能部分的私有，且可用以交換，自然要連帶恢復小工業、小商業，更

進而採行我們前面已經大略說過的免許制度，貨貸制度，推銷國貨制度，及協作制度等。當時對於這種新經濟政策下的經濟，即列寧亦不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形態，不過他關於這種新政策以租稅代徵發的措施，曾連帶表述其意見：『在一定數量商品存在的場合，能够適用租稅與自由交易的制度。這種交易，對於農民是一種刺激，一種獎勵。今後並不取去農民的剩餘物，只以租稅形式取去其剩餘物的相當部分，這樣，農業不但能為其自身利益而努力，且不得不努力……我們不能不使我們的國家經濟，去適應我們在過去三年沒有改造，甚且在今後十年間還改造不了的中農經濟。』因為從政治意義上講，由普羅列塔利亞居於指導地位的革命活動，決定要取得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的協助，從而不能不顧及他們的經濟動向。所以，這種『適應』或『遷就』中農經濟的經濟政策實行之結果，在一九二三—四年度，國營工業的基本財產，雖佔本部工業財產百分之八五·四，佔全部國民經濟百分之九·八；在工業生產品方面，私人部門佔百分之二三·七；以全部國民經濟計之，國營社會主義部門約佔其半；但在農業方面，其勢力極為微末。小農經濟發展迅速，其單位計由一千五六百萬，增至二千四五百萬，富農亦相應增加，而同時國營農場，集體農

場及土地耕種合作社則為數極其有限。就生產數量上說，中農與貧農經濟，佔麵包生產總額百分之八五·三，及商品部百分之七四。富農據有麵包生產總額百分之一三，及其商品部分百分之二〇，而國營農場集體農場則僅佔生產總額百分之一·七及其商品部分百分之六。在商業方面，國家與合作社佔全部商品流通額百分之四二·三，而百分之五八·七則操縱於私人之手。——以上是新經濟政策實施近三年的國家經濟方面的配布狀況。

延至一九二六—七年度，其工業生產，已超過戰前水準，農業上的改進，由當時已擁有二萬四千五百架曳引機的事實，可以徵知。耕地的面積，在一直繼續擴增，許多原料食料品生產，都超越戰前的限度。固然國營農場集體農場在農業生產上所佔地位不大，但已略略奠下了社會主義農業的初步基礎。尤其是在工業方面，那不僅恢復原來的舊觀，且已改造其體系，鞏固其重要的連環，以保證社會主義之進一步的勝利。但通體看去，新經濟政策究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中間組織，或者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準備階段。這時期的國營企業，合作社，及私人企業，各各在以營利的目的，在事業上從事競爭；國內的商品流通和價格，多半在由需要供給關係所左右。以國家預算而論，那

雖然偏重在社會化經濟機關的保護與發展，但與其他各國的財政，並沒有顯著差別。租稅的種類與課稅的方法，與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稅制，亦極類似。租稅收入約百分之五〇為直接稅，如營業稅所得稅農業稅等，殘餘百分之五〇，則出自關稅公課金一類間接稅。這種經濟狀況，一方面雖然解除了前期經濟上的種種恐慌，恢復並奠定了社會經濟基礎；同時，土地及重要產業國有，銀行保險及外國貿易之國家獨佔，乃至其他國營及公營企業之著著發展等等，雖已像醞釀成了斷行計劃經濟的機運，但計劃經濟之必當開始推行，還有新經濟政策造成的不良結果在。設言其著者，即是與國營及公營企業相並勃興的小資本階級（在都會的商人與農村中的富農）已次第把握金權，在平時，特別在戰時，都是為布爾希維克的威脅。加之，新經濟政策同樣不能解決那些發生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困難，即不能解決勞資的矛盾和都會與農村的對立。因此，失業逐年增大，工業生產品與農產物價格間招來一種所謂鉗形恐慌。假使一直這樣下去，或者資本主義化的經濟成分與社會主義化的經濟成分平行的發展下去，蘇聯不但無由實現其社會革命的理想，甚且會不絕增大其蘇維埃政權的危機。所以蘇聯經濟發展到一九二六—七年度，無論正反方面的結果，都要

求其斷然採行一種新的步驟，或進行一種新的轉換；而在此後不久所宣佈的，爲世界資本主義各國視爲『笑柄』的五年計劃，就是對於新經濟政策，或在新經濟政策中的一種新的步驟或新的轉換。

由第一次五年計劃開始，到第二次五年計劃將待結束的現在，其間差不多要經過十年的歲月了。此十年中的蘇聯政府與人民在經濟上的努力，都是依照此新的步驟一直向前推進。今日的蘇聯與實行五年計劃前的蘇聯，在性質上，在內容上，儼然是兩個不同的國家形態了。因爲，我們知道，社會主義國家的形成，必得以計劃經濟組織爲其骨幹。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不必說，即在新經濟政策時代，其商品流通，商品價格既大體依需給關係決定，當然談不上計劃經濟；由國家控制的商工企業經營，以及國營農場集體農場等等，雖都由政府設定了按步實行的計劃，但在這些經營尚在與私人經營爭利的場合，決不能順利的實現國家意志。總之，計劃經濟是由五年計劃開始的。第一次五年計劃，第二次五年計劃儘管在廣義上，都被包括在新經濟政策階段中，但卻顯然表示是蘇聯經濟發展史上的另一個時代。

特關於這兩次五年計劃的任務及其成果，我將在後面第三節敘述，在次節中，須得把五年計劃所由推行的計劃經濟體制，或對於計劃經濟的政治組織與政治的經濟設施，描述一個梗概。

第二節 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

計劃經濟近年用得頗普遍，但對於計劃經濟的概念，卻是依照學者們的方便，任意解釋。在中國，有稱資本主義的統制經濟為計劃經濟的，有把計劃經濟與統制經濟當作一個東西的，這兩種二而一的說法，無非立意在歪曲計劃經濟的本義，從而抹煞蘇聯經濟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特殊性。我們在這裏沒有批評此種謬見的餘裕。讓一般經濟學者去曲解資本主義的統制經濟為計劃經濟，我們姑先說明蘇聯計劃經濟有怎樣的內容，然後再看推行那種計劃經濟，究竟該備有怎樣的經濟的體制。

大體上蘇聯計劃經濟不僅包括蘇聯全境內的經濟計劃，且包含全部經濟過程的改造計劃；而且，此經濟計劃除了經濟本身的建設改造外，所有國防、文化、教育以及其他一切社會事業部門，

通成爲其建設改造的對象；像這種涵蓋包容的廣大計劃，其設計，其執行，固須有嚴密而專屬的機構；以利進行；同時在推行計劃過程中，又須有許多有關經濟法制的興革，以爲全般經濟改造建設的樞紐。這就是說，關於計劃經濟勢須在中央集權的設施之下，建樹兩種體制，其一是關係計劃的編制與設定的，其一是助成計劃的推行的。在這兩者中，前者雖然要在經濟計劃開始以前就具有規模，但後者卻是要在計劃經濟推行過程中，逐漸因時制宜的創建。

現在且分別就這兩者予以闡述。

本來蘇聯在一九二一年實施新經濟政策的時候，爲了有系統的使經濟計劃化，曾於當年二月成立國家計劃委員會，制定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的經濟計劃。但那時計劃所及的範圍，至爲有限，而且照我們前面所說的，個人企業在與公家企業及合作社相競爭，在農業上，國內商業上，通是由私人的經營佔着優勢的比例。在這種情形下，當然談不到包括全國的全經濟過程的計劃經濟。總之一句話，蘇聯的本格的計劃經濟，既是以五年計劃開始，而其關係經濟計劃編制與設定的體制，亦是在這以前不久纔大規模的具體的建立的。

國家計劃委員會無疑是關係經濟計劃定立的一個重要機關，但牠所具的不過是顧問的機能。牠是由政府指命的二十二名的統管部所指導。其使用的人員，超過一千人，就中有技師、土壤學者、經濟學者、統計學者、商務及金融專家。國家計劃委員記其分別統轄其所屬的各種專門部的事業。在此專部門中有管理原料及電氣的事業部，有作成工業生產之統制統計的工業部，有規定耕作面積範圍，計劃各種收穫分配，並指導全般國有及集體農業作業的農業部，有設計新設工業及地方自治團體建築物的營造部，有管理水陸運輸及其他交通手段的運輸交通部，有計算需給的適合，把商品供給導向最必要方面的生產分配部。除此以外，還包含有以次諸部門，即（1）勞動與專門熟練工部，其所處理者，為技師及熟練工的配布問題，為工資、生產性、社會保險、勞動者保護法等勞動問題；（2）經濟統計部即組織部，計劃委員會自身的事業；（3）教育部，處理一般教育事業；（4）科學部，從事科學上的專門研究。

一切經濟計劃的編製，是先首由最高政權機關，即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實際也可說是由有最高權力的共產黨執行機關）決定經濟發展的政策和目標，此政策和目標決定後右述國家

計劃委員會即據此製定一個標準計劃，繼由下層各級計劃機關根據國家計劃委員會所定標準計劃，詳細訂定各部門各企業的計劃。然後再依順序呈交國家計劃委員會。由國家計劃委員會加以整理融化各計劃的異點，使各計劃調和貫通，匯成全國整個的經濟計劃。蘇聯最下層的計劃機關，為各工廠或各企業的計劃組，一切經濟計劃都由這個低級計劃機關開始訂定。計劃組編訂計劃時，在不違背標準計劃的政策和原則的範圍內，有按實際情形，絕對伸縮的權力。計劃組訂定計劃後，要經過全體參加生產的工人開會討論修正之後，纔能送至上級計劃機關審核。至於各個單位計劃的內容，要包括各項原料的數量，勞工質量的水準，和資本的數量，以及估計生產品的數額等等。

以上是蘇聯編定經濟計劃之體制的大體輪廓，特計劃過程雖如此精密，如此有條不紊，但要求其在實際順利而圓滑的應用，同時還得就實際的經濟法制作一些便於計劃推進的改革。也許說，那諸般改革，同時也包括在計劃經濟的範圍中；如金融改革，租稅改革，契約制度，自治會計制度等，即是如此。特因為這些方面的改革，大有助於全般經濟計劃的推進，所以我們要在這裏當作

計劃經濟的體制而提出。不過，像這些改革，是在計劃經濟實施過程中，逐漸推行的。我們要在下面分別說明的幾端，大約是成於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這幾年當中。

(一) 金融改革 在實施新經濟政策的時代，半資本主義半社會主義的信用制度，漸有頭緒，各種金融機關都相續設立起來，其中有當作中央銀行的國立銀行，有當作特種銀行的股份商業銀行。如勸業銀行、電力銀行、貿易銀行、極東銀行、中央亞細亞銀行、合作社銀行等等，都屬此種商業性質銀行。此外，還有農業銀行、公共經濟銀行、信用合作社，以及地方銀行與包含外國資本的各種銀行。此外，還有農業銀行、公共經濟銀行、信用合作社，以及地方銀行與包含外國資本的各種銀行。追進入第一次五年計劃期中的一九三〇年一月，金融制度開始改革，為適應計劃經濟，對於舊有各種金融機關，分別予以廢除，或變更其職務。概括言之，在金融改革以前，國營企業得開發期票，向各銀行折現，以取得資金。但經過改革以後，期票開發的辦法，完全停止，此等企業的金融，在基於國家計劃的相互清銷並列入一般國家預算歲出表的範圍之內，牠們是由政府每年付與原料、燃料，和為其他經費開支的最小限度的金融。前此的農業銀行與公共經濟銀行合併，當作特別金融機關的國家貯金局，照樣存留下來；其他所有的銀行，都改組為國立銀行，而外國銀行則逐漸絕

跡。至國立銀行所擔當的任務，不僅只一般中央銀行的任務，牠佔有全國金融機關的大部分，並監視各企業之計劃經濟實行。所以計劃經濟發展，國立銀行亦相應發展，而其出進的交易數字亦逐年增大。在此種意義上，國立銀行實是計劃經濟實績反映之鏡。不過，國立銀行之任務過大，而其成立之日又淺，於是爲了關於繼續基本設備建設的投資監督，爲了繼續基本建設的費用的合理化，乃應各種方面的企業的性質，設立若干長期投資銀行，如在工業及電氣事業方面的工業銀行，在農業方面的農業銀行，在合作組織方面的合作事業銀行，在公共經濟與住宅經濟方面的公共經濟銀行。此等銀行雖是在財務人民委員部管轄之下，依照基本建設各部門的年次計劃，作金融活動，並監督各企業間的決算，但因實際上的金錢出納，是在國立銀行方面進行，所以全蘇聯境內的金融機構，完全實現了單一化的理想。無論就實際上講，就理論上講，國立銀行都是唯一的金融指導機關。

(二) 稅制改革 蘇聯政府爲要籌劃社會主義建設的經費，不能不在可能範圍內，訴之於蘇維埃市民的資力。因此，牠廢止以前將近數十種的直接稅公課金，而代以單一的間接稅即交易稅。

交易稅爲國庫之唯一財源，依照所謂『物價的機械化』而自動的納歸國庫。政府把各種商品的價格，作適當的公定，將交易稅包含其中，以自由調節國家收入，而確立計劃經濟上之物價政策的基礎。此種稅制改革的結果，租稅的種目，大體有以次五端：（1）交易稅——商品開始由製造機關買賣場合所賦課的間接稅，其稅率當然對生產財輕，對消費財重。在此買賣場合的商品如爲機械類，則課其價格百分之二乃至百分之五，如爲砂糖，則課其價格百分之六。（2）國營企業收益稅——對各國營企業之利潤所課加之稅；除金融機關外，稅率約爲百分之十。（3）公營企業所得稅——對於國營以外的公共企業所得所課之稅，內分合作社所得稅，勞役稅，集體農場所得稅等。

（4）個人所得稅——對個人所得所課之稅。（5）關稅——主要爲關於國營貿易所課之稅。

（三）契約制度 各個企業實行生產計劃，即實行其管理機關，即人民委員部與國家計劃委員會之間所立案作成的計劃時，其所需的資金，是通過國立銀行，由金庫領取。由是當作計劃實施之具體表現的，就是各生產機關之間訂立有契約。契約是作爲調節契約當事者相互的經濟關係與決算，有特別的效力。假若設有訂立契約，則對於各經濟機關，就沒有付與以作爲保障計劃實現

的信用。工業方面如此，在農村方面，亦廢止從來的自由耕作制度，而代以國家購買契約制度。此種制度甚且施及於個別農民，其結果，對於全農民皆指定國家購買的收穫額不問盧布購買力如何，此一定的收穫數量，皆由國家以公定的市價屯買。蘇聯的購買委員會，就是管理此種屯買的機關。

(四)自治會計制 一定規律的計劃經濟實行的結果，各企業對於從來自作計劃，自行採用的商業會計制，當然要加以更改。牠們只能在依照國家計劃經濟所定的任務之範圍內，保持職務上與會計上的獨立，亦只在那種範圍內，負擔責任。但在國家產業計劃上，各企業得把依照計劃所生的利潤，用以從事各自的文化設施及繼續增資；並且在利潤超過計劃所定限度以上的場合，還可作為各企業改善其從業人員之生活的基金。在以前，施行商業會計的，只有國營托辣斯，但為劃一的計劃經濟正確實行起見，為了依照劃一的計劃經濟，使各業作保持緊密的聯繫起見，托辣斯內的工廠或企業機關，都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在財產上獨立。即托辣斯內的各企業單位，都個性化，獨立化，擁有資金。在銀行中，亦有其獨自的暫時決算，可以自己負責訂結交易契約。

(五)領券制度 領券制度與自由販賣制度相對稱。那是在物資缺乏，通貨機能缺欠圓滑，因

而使消費經濟感到危險的場合所採用的一種商品分配制度。蘇聯在革命後的戰時共產主義期內，曾實行領券制，使勞動者依均分主義領受物資。迨新經濟政策採行，那種領券制即因而廢止。然至社會主義建設期中，政府當局因慮及盧布大膨脹和消費財的缺乏，及其價格昂騰，以致影響農民及勞動者的最低限度的消費生活，乃再採用領券制度。領券者持購買券及盧布，向國營商店或合作商店，購得一定限制之商品。盧布在此種場合的購買力，那怕對於同一消費財，亦會因其爲憑券分配給商品或爲自由販賣商品，而生出極大的差別。此種領券制度，不是依據戰時共產主義時代的均分主義原則，而是依照階級主義，依照各人社會的地位，而定其配給商品多寡的方法。這種制度實行起來，不但阻滯商品的流通，使各個人的消費生活劃一化，同時也違反『依勞動質量而受報酬』的社會主義原則。商品一旦豐裕，盧布的購買力一趨於安定，這種制度必然是要廢止的。所以到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對於麵包及其他食料品的領券制度廢止了。至同年十月底，對於所有一切商品，皆自由賣買。

總之，金融改革，稅制改革，契約制度，自治會計制度，領券制度等等，通是計劃經濟中之建設或

革新項目，但同時又爲助成全般經濟建設之經濟的體制，如像領券制度、自治會計制度，乃至稅制、金融的改革，都無非是依照全般經濟計劃推進的各階段的要求，而定其取捨變動，有了這諸般經濟制度，然後由國家計劃委員會主持編定的經濟計劃，乃得按步就班的圓滑的進行。所以，把牠們包括在計劃經濟體制中加以解述，那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節 新舊五年計劃的任務與成果

蘇聯的第一次五年計劃與第二次五年計劃，是由上述的計劃經濟體制來推行。那種計劃經濟體制的中央集權性與全般統制性，已大可顯示出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的特徵。但我們如要由計劃經濟之實施，而觀察蘇聯政治之動態，最好先就這兩次五年計劃的實際任務與成果予以簡括說明，因爲經濟上的一切決定和作爲，通可視為是政治動向的指標。

我們已經講過，第一次五年計劃的開始，那是對於新經濟政策時期的經濟（或新經濟政策前期的經濟）的一大轉換；如把後者看爲蘇聯經濟的恢復期，前者就算社會主義的建設期。

蘇聯在當時還是一個經濟落後的農業國家，牠周圍環繞着向牠採取包圍態度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此種情勢下，蘇聯要避免或突破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首先就得完成自己的經濟的獨立，這即所謂『一國社會主義』建設。在這種建設程序開始時，即第一次五年計劃開始時，世界甚至蘇聯國內的人士，都為其後果表示懷疑，但時至今日，事實已為我們明白證示了。

關於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根本任務，斯大林曾明確的指示出來，即『五年計劃的根本任務，在使蘇聯轉化為工業國；徹底驅除資本主義分子，擴展社會主義經營形態的戰線，並為消滅蘇聯國內階級，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而立起經濟的基礎。又五年計劃的根本任務，並不僅在工業本身方面，同時還要建立起運輸業農業得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裝和再組織的那種工業；把分散的小規模農業，移到大規模的共營農業的軌上，由是鞏固農村方面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使蘇聯完全失去資本主義復活的可能性。最後，五年計劃的根本任務，在造出一種使蘇聯國防能力增到最大限度所必要的、一切經濟的技術的前提，以期對於外國加諸蘇聯的一切武力干涉的嘗試，和一切武力攻擊的嘗試，具有斷乎抵抗的組織的能力。』

概括言之，蘇聯第一次五年計劃的主要目標：（一）在急速使生產力發展，以除去其技術上的後進性；（二）在使農業國變為有高度發展生產手段的工業國；（三）在使私有的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為社會主義經濟所代替；（四）在使日益增大其勢力的集體農民，能對富農行使有利的鬪爭；（五）在使廣泛的大眾生活水準改進；（六）在消除該國之文化的後進性；（七）在增強國防力量。不過，在這些項目中，究以發展有關這一切方面的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為其要鍵。斯塔林亦曾說：『五年計劃的基本之環，為重工業。而重工業之中心，又為機械製作工業。因為只有重工業，纔能使工業全體，使運輸業，農業再建起來。五年計劃的實現必得自重工業開始，從而五年計劃實現的基礎，必得安置在重工業復興上面。』

惟其如此，故五年計劃在主要各工業間之投資分配額，乃如次表：

重要工業五年間的投資分配額

工 業 部 門	投 下 資 本 額 (百萬盧布)	本 體 的 比 率
金 屬 工 業	五、五三一	三一·八%

燃 料 工 業	三、〇七〇	一七·六
纖 維 工 業	二、六二六	二二·九
化 學 工 業	二、〇四六	一一·七
建 築 材 料 工 業	一、二三六	
食 料 品 工 業	一、一六〇	

共計投下資本總額一百八十六億四千萬盧布中，關於重工業者佔百分之七十八，關於輕工業者，僅佔百分之二十二。而就全體工業與由國家預算配給農業上面的投資額相比，（五十億乃至五十六億，後者又大有遜色。不過，工業由此巨額投資建設改造的結果，運輸業農業等等都相伴而發生莫大的變革。

我們這裏沒有詳述五年計劃之實績的餘裕。設粗舉其犖犖大端，則在工業方面的實績，可就下列這些方面得到說明。（一）新設大工廠，為耕種機的製造，飛機的製造，各種化學工業，電機製造以及其他部門必要的精緻複雜的機器等生產工業，在五年間所建設的大工廠，計有二千四百九

十所，其中有投下資本一億盧布以上的工廠十所，投下五千萬乃至一億盧布的十一所。(二)製鐵工業，重工業中最大規模的新設企業，為製鐵工業，一億五千萬盧布以上資本的製鐵企業，計有九個；這些企業所屬工廠每年生產的標準，預計為六十五萬噸的銑鐵。(三)煤礦業汽車工業消費品生產，煤礦業在一九二八年，有二百六十七個礦穴，年產煤二千五百七十萬噸，至一九三二—三年，礦穴雖減少二十六個，採煤量卻將近增加一倍；在五年計劃中，投資五千萬盧布以上的汽車工廠，共有十一所；關於消費品生產工業，新設有五個毛織物工廠，約投資一億盧布；此外，生產八萬噸到十萬噸玻璃的工廠有五。生產四萬噸玻璃的工廠有六。(四)天然資源與工業上的配置，五年建設計劃的特徵之一，就是應天然資源與各地方的特殊性而配置生產機關，如在後高加索等煤油產地設立煤油工廠，在烏拉爾等鐵產地設立鐵工廠，都是有計劃的配置。(五)企業的結合，為了廢物利用，原料減少，副產物精製等，把各種企業依計劃結合起來，如磷酸肥料生產和硫酸生產的結合，木材業和製紙業的結合，金屬工廠與玻璃工廠的結合等等皆是。(六)生產過程之組織與合理化，如個別生產之專門化與集中，企業的協作、原料、器具、材料、機械等供給集中的結合，動力的電化，以

及天然資源與工業的適切配置之類。(七)動力的電化與集中，一九二七年工業中所使用的原動機的全動力二百五十萬馬力中，電動力有百萬馬力，但是五年計劃新設工業所用的發電總能力，已達百五十萬基羅瓦特。每一工人的動力，由三千二百基羅瓦特，增到六千基羅瓦特。

以上是五年計劃工業上的實績。與工業生產相較量，農業生產在對工業生產的百分比上，是處於劣勢的。比如工業生產額在五年計劃開始的一九二七—八年佔百分之四五·二，同時農業生產額則佔百分之五四·八；但至五年計劃終結的前一年，即一九三一年，後者反過來只佔百分之四〇，前者卻佔百分之六〇。不過在此百分比上的農業生產額的劣勢，只能說是由於工業生產增大的速率過於猛烈，而不能就此就認定農業生產的減退或遲緩。在五年計劃推進過程中，蘇聯的農業生產技術與耕地面積，都在不絕的增進。就前者而論，蘇聯全國在一九二八年所用的曳引機為二九·七〇二臺，一九二九年為四二·一三六臺至一九三〇年已達七三·四八九臺；農業機械的總價格，由計劃開始第一年的十億盧布，增至計劃終結第五年的三十億盧布。再就耕地面積說，通全國計算，一九二九年為一一八·〇四七公頃，至一九三一年已達一三六·四〇七公頃。

技術如此改進，而耕地面積又復不絕擴增，故其農業物產表示迅速的增加。

交通運輸業方面，亦隨工農業的發展，而大大改良擴增。鐵道方面，除新裝備與電氣化計劃外，五年中所建築的路線，計長二萬九百基羅米突。而其運輸貨物的數量，則由一九二八年的一億五千六百三十萬噸，增至一九三一年的二億四千四百萬噸。其他如河川方面的四大運河的開鑿，海上運輸的擴增，都是國內工業農業發達的必然結果。

特在以上這些方面來考察蘇聯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實績，還不易顯現其社會主義建設的意義。如工業如水陸運輸業，主要都是由國家經營，我們似不易由此看出五年計劃中社會主義成分，戰勝資本主義的私有的成分的實際。但在農業上，卻顯然表示了『量』的增進中之『質』的變化。蘇聯全境的農地，屬於個人經營與屬於集體農場及國營農場的百分比，有次表所示的變化：

個人經營與社會主義經營農地的百分比

國營農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	一·九	一·九
	三·九	三·九	三·九
	二·八	二·八	二·八

集體農場	三·五	二八·六	五八·七
個人經營	九四·六	六九·六	三三·六

在五年計劃開始推行的一九二九年，個人經營佔有全面積之百分之九四·六，而社會化部分，僅佔極少的比率。事隔兩年，情勢不變了，在一九三一年，個人經營部分，僅及全耕地面積之三分之一，至一九三二年，其面積更形縮小了，到了一九三三年，差不多形成一九二九年之反比。

第一次五年計劃在『量』上與『質』上的大成功，為第二次五年計劃立下了經濟的基礎。就因此故，這新五年計劃的任務，就與舊五年計劃不同。廣泛點講，牠是企圖把全國農業經濟與工業打成一片，形成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藉農業品與工業品之直接交換，以調節城市與農村的關係。蘇聯第十七屆共產黨大會，關於新五年計劃編成的指令中有云：

『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成功，樹立了蘇聯繼續強烈發展社會主義成長的基礎……』

『大會認定新五年計劃中的根本政治任務，在徹底肅清資本主義份子及一切階級，徹底絕滅產生階級差別及榨取原因，克服經濟中資本主義的殘滓，及喚起大眾的意識，喚起全蘇聯

勞工大眾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之意識而爲其積極的建設者。

『迅速增加工人及勞動大衆的福利，肅清寄生階級，使變爲生產者，這是國家收入一般的增加之基礎。大會認爲新五年計劃終了時，應供給人民消費的主要日用品，至少較第一次五年計劃終了時，增加二倍或三倍。

✓ 『此等任務之實現，必須將全般國民經濟——即工業運輸農業——加以技術的改造，方克有濟……』

至於國民經濟之技術改造上最重要的要素，在工業及運輸方面，應以普遍的電化爲基礎，對於農村亦逐漸採用電化，因此使用廣大的水力資源，並利用各主要地方的煤藏及地方的各種燃料。新五年計劃預定：一九三二年的一百七十億基羅瓦特電力到一九三七年至少應增至一千億基羅瓦特。煤的開採在一九三二年爲九千萬噸，至少應增至二億五千萬噸；煤油的開採，須增加一倍乃至三倍。此外，關於黑色冶金工業、有色冶金工業、化學工業、鐵道運輸、水運、畜牧等等方面，皆有龐大的擴展計劃。爲了充分供給人民的消費品，故新五年計劃對於發展輕工業及農業，特別注意。

看看又到新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了。在這一年的開始，我們至少可以對牠前四個年度的實績，作一個簡括的回顧。首就新五年計劃中重工業方面說起吧。重工業中的電力，在一九三二年（即新計劃開始的一年）為一三、三九〇百萬基羅瓦特，至一九三五年，已達二、九〇〇百萬基羅瓦特，而同年度計劃所定額數不過二四、九〇〇百萬基羅瓦特，其成績可謂優良。煤的生產，由一九三二年的六四百萬噸至一九三五年達到一〇八百萬噸，而同期每個煤礦工人的生產量，則由一九二噸增二七三噸。石油的採掘量，一九三二年為二二二七萬噸，一九三五年為二六七七萬噸。同時期銑鐵生產，由六、一五七千噸增至一二一、四九三千噸。鋼鐵生產由五、九二二千噸增至一二、五二〇千噸。機械工業中之耕種機（包含曳引機在內），計由五萬一千輛增至十五萬六千輛。收割兩用機由一萬輛增至二萬輛。火車頭由八二八千輛增一、八〇七千輛。貨車由二萬二千輛增至九萬輛。日常金屬用品的生產，由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三年中，共值十五億盧布。一九三五年是新五年計劃的第三年度，這一年度的下半期，開始『斯泰哈諾夫運動』（Stakhanov movement），所以一九三六年被稱為『斯泰哈諾夫運動年』。『斯泰哈諾夫運動』是蘇聯在社

會主義建設上提高勞動生產力的新標幟。在這標幟之下，蘇聯千百萬勞動大眾都明白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意義，因而自願加速的求其預定計劃的實現。以致在本年度的工農業生產上，產生無數驚人記錄。就重工業方面言，新五年計劃預定一九三七年的總產量，與一九三二年比較之百分率二三四·六，但一九三六年第一季的總產量，與一九三二年同時期比較之百分率，已爲二二·六·二，這表明新五年計劃在重工業方面的計劃，差不多可在四年中大體完成。而且其中有些部門如機械產量，在一九三六年第一季已超過了全計劃的預定額。一九三五年蘇聯輕工業全部生產，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三二·五，但一九三六年比一九三二年超過百分之七〇，而就中特別大量生產的是蘇織工業（百分之二六〇）絲織工業（百分之二三三）和毛織物工業（百分之二二五。）皮革工業產額，一九三六年較一九三二年多四·七倍，製革工業增加一倍，製棉業增加三·二倍。一向比較遲滯的鐵道運輸，在一九三六年亦因『斯泰哈諾夫運動』而有極大的進步。一九三六年前七個月，鐵道載客載貨量均大增加。裝車額由同年一月的七七、六〇三輛，增至七月的九〇、四九六輛較之一九三五年度七月之七二、九五二輛已增加百分之四·三。

最後就農業方面說，由於全盤集體化的實現和大規模技術改造基礎的完成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累進，也是一年比一年的迅速增加，而收穫率之提高，更是非常驚人。不過，我們在這裏沒有從各方面來考察第二次五年計劃中之農業實績的餘裕，僅能就以次三點來指出其輪廓：第一，農業全盤機械化的任務，大體已算完成，例如在一九三四年，各種優良的集體農場的收穫量的十分之九，已由收穫兩用機進行。而從來各種農業機械的生產比例很不均衡，至一九三五年，已經把此種傾向改正；農業機械生產總數增加百分之二三，收穫機、打殼機各增百分之四九，洗淨機及選擇機各增百分之五三，收穫兩用機在一年之內增加二萬輛，差不多達到了一九三七年的預定增加數。此外，一九三五年增加的新式曳引機為六八、五〇〇輛，其動力總數由前一年度之三、七九九·〇〇增至一七三·〇〇〇匹馬力，超過第二次五年計劃各年度的預定數字以上。而在一九三六年，更預定有新的八萬四千架曳引機供給農村耕作。隨曳引機增加而增加之曳引機站，一九三四年是三千六百所，一九三五年為四千所。由此可以概見機械化之一般。第二，農業各部門的生產率的提高，已到了合乎理想的境地，這是農業機械化與技術進步必然的結果。就計劃中第三個年度

的一九三五年說，全部農業經濟的生產量，較前一年度增加百分之二四·二，其全部生產額，總共增加了十五億盧布以上。一九三六年的成績更佳，據塔斯社電訊：『截至九月十五日止，蘇聯全境糧食已收穫者佔預定總額百分之九四，各集體農場已完成計劃之百分之九六，用聯合機收穫之計劃，已超過百分之四〇。』第三，全盤農業社會化之任務之大抵完成，在一九三〇年時，勞動農民之參加集體農場的，僅百分之二四，但至一九三五年之初，參加人數已佔全體農民總數百分之八〇以上，集體農場面積佔全國耕地面積百分之八五以上，而在同年底，參加人數更進而佔全體農民總數百分之九〇，全部生產出自集體農場的佔百分之九四。富農全部剷除了。到了一九三六年，小自耕農已少到完全不足注意的程度了。

要之，無論在工業上、運輸上、農業上，蘇聯第二次五年計劃都收到了預定的或超出預定的成功。第二次五年計劃主要雖是關於經濟方面的，但因牠的根本任務，是向着社會主義路線的改造，或對於社會主義的完成，所以第二次五年計劃中之經濟的或產業程序的成功，同時就關聯到其他文化軍事諸方面，而尤其是與政治的直接聯繫。

第四節 隨計劃經濟演進而展開的政治動態

在蘇聯這種形態的國家中，其經濟上的一切設施。本來就是根據一定的政治方針與政策，即計劃經濟政策，同時就是牠的政治動態的最好說明，或最具體的反映。不過政治同時又是要以經濟為基礎的，經濟計劃的演進，卻又反過來成為政治新決定或新動態的指南。

新舊五年經濟計劃在社會的政治的意義上之最大收穫，我以為有下述兩個要點，即勞資對立的解消，與都市對農村間之矛盾消滅。茲分別略述如次：

(一) 労資對立的解消 在新經濟政策實施之前數年中，蘇聯曾採行免許制度（即天然資源之開發，如為蘇維埃政府所不能自己經營之企業時，許私人資本家經營），與賃貸制度（即以國有工業的經營、工廠、森林、土地等租給私人經營）。這兩種制度的實行，即是承認資本家的經營之合法的存在，換言之，即是當時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對立問題，還不會解消。在一九二五年，蘇聯全國產業資本有百分之五一·二為私有的財產，而其餘只有百分之四八·八為社會主義財產。在

私有財產中，當然是以小的經營與小的所有佔第一位，但僱人工作的企業亦復不少。不過蘇聯的勞動立法的主旨，完全在保障勞動者的福祉，極力以勞動立法及租稅制度去限制私有經營的利益；迨以剷除資本主義成分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為任務的計劃經濟程序開始，在農業方面的社會化傾向固與時俱增，而工業方面的私有經營，尤不易立足。所以延至一九三五年，蘇聯全產業資本有百分之九七·五為社會主義財產，屬於私有者，不過百分之二·五罷了。資本家的分子既由全國民經濟一掃而盡，資本家對勞動者的階級對立，當然完全解消。此後產業經營者僅為權力團體即官公業。而向來在勞資對立前提下，以擁護勞動階級為目的的職工會及勞動人民委員部的性質，根本變更。在一九三一年，職工會已經當作共產主義的學校，為勞動大眾之生產勞動的指導機關，至一九三三年，勞動人民委員會解體，其重要業務皆移交於職工會。

(二) 都市對農村的矛盾消滅 從來農村與都市間的矛盾對立，係發生於以次兩種事實：第一，農民雖為農產物的供給者，原料品的供給者，但在價格決定上，不能扮演主動的角色，由是他由現代經濟的主流，失卻其獨立性，或形成其依附性，以致在現代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釀成都市工

商階級搾取農民的現象。然農業在國民經濟上的依附性，係由其生產方法上落後性所招致，即第二，農業生產方法沒有準照文化及一般生產技術的發展而發展，農民大概都是從事舊態依然的小規模農業，以小規模農業經營，與鉅大的都市企業較量起來，當然在在處於劣勢地位。誠然，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資本主義化，雖大體把這種農村對都市的對立，轉化為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中的勞資對立，但前一種對立形態，並不會完全解消。蘇聯所承受的沙皇時代的農村經濟遺產，仍是落後的，零碎小規模經營的。蘇聯當局知道要根本除去都市對農村的對立，先須使農村的生產方法，跟上一般的生產技術的水準。所以集體農場化運動與農業機械化運動，成了新舊五年計劃中之農業政策的兩大命題。這兩種運動的成果，我們已由前節揭示其梗概。農業對都市工業的後進性剷除，伴隨那種後進性而發生的一切對立現象，當然不會存在。

因為勞資的對立解消，即資本家的分子之失其存在，以前為防範並防壓資產者擡頭的政治設施，都沒有作用；因為都市對農村的矛盾解消，以前對落後的，分散的，比較缺少革命性的農民所施行的政治差別待遇，亦不能不有所改變，這兩大社會經濟的轉變趨勢，造出了蘇聯去年十二月

公佈新憲法的要求。由新憲法顯示的政治動態，我們將在後面專章討論，而這裏所要指明的，只是蘇聯政治之民主主義化的加強，主要是由於計劃經濟的成功，因為在此計劃經濟推行過程中消滅了勞資的對立，消滅了都市對農村的對立，於是社會構成的主體，就是工農階級。我們早知道蘇維埃政權是工農階級政權；特「階級」一語既隨資本家、富農、地主、中間剝削層的消滅而失其存在意義，那工農就算是全民，工農政權就算是最徹底的民主政治了。

不過這種民主政治的基礎，雖是由新舊五年經濟計劃所造成，但五年計劃之所以能造出此種基礎，則又不能不歸因於其在計劃當中所預懸的民主政治的理想了。

第四章 從民族民生問題所見的政治動態

第一節 蘇聯民族民生問題的特質

蘇聯是一個以社會主義爲理想，並且在迅速向着社會主義轉化的國家。這種性質的國家，在牠還不會完全實現其理想以前，當然會發生民族上的問題，與民生上的問題。不過，在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是既無國界亦無階級的；蘇聯既以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爲職志，牠國內民族問題與民生問題的提起，就視野上說，就內容上說，都與今日發生於一般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這類問題，大有徑庭，換言之，即蘇聯民族問題有牠的特質，其民生問題亦有牠的特質。

以前者即民族問題而論，像蘇聯這樣的國家，其前途展望在包羅全世界爲一大社會，而在此大社會中，融化消泯一切在人與人間發生差別的國家、階級、民族等等。蘇聯在革命以後不久，雖因

種種原因，迫着牠暫時中止世界革命路線，但在牠一國之內，卻不能不設法化除階級、民族、一類差別的畛域。可是單就我們這裏所要討論的民族問題，蘇聯對於這個問題，就遭遇了以次幾種困難：

第一，蘇聯地跨歐、亞兩洲，包括百八十種民族，這些民族使用共有百五十一種的語言，所以一向俄國有『民族博物館』之稱。民族如此繁多，融化工作當極感困難。況加

第二，這些民族無論就經濟發展上講，就文化水準上講，都至為參差不齊。有的民族經濟文化已達到近代資本主義國家之水平，有的民族還過着部落的遊牧的生活。不但此也，還有

第三，在這些民族總共人口一億三千八百萬人（一九二六年統計現已達到一億七千萬）中，俄羅斯民族三大主支之大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及白俄羅斯人，就佔有百分之八十，其餘佔次多者爲土耳其族或俄羅斯回教徒(Russian Mohammedans)，再次就是歐芬民族(Ugro-Finnic Group)蒙古民族而人口佔絕對多數的大俄羅斯民族，歷來又是俄國的統治者，革命以後，也還是他們居於領導的地位，他們所處的地域，是舊俄工業中心所在，文化水準，亦較其他民族爲高。所有這些都是使蘇聯全境內『弱小』民族必然引起離心傾向，或不易融化消泯其種族畛域的因素。而況

第四、環居蘇聯周遭的帝國主義國家，又極盡挑撥離間之能事，使包括在蘇聯境內的非俄羅斯系民族，甚至使那些屬於大俄羅斯系統的烏克蘭人，脫離蘇聯的版圖。

凡此種種，皆爲蘇聯民族問題所由提起的動因，而依據這些動因，我們又極易明瞭蘇聯民族問題，有其不同於任何帝國主義國家之民族問題的特質，即從大的視野來說，帝國主義國家的民族問題，在如何使其國內的各弱小民族，或被統治的民族，與統治者民族保持一定的分離或區別。日本對於臺灣人、朝鮮人的差別待遇，最近意大利在新領土阿比西尼亞設定的許多限制白人與黑人接近的法律，都是顯明例證，而德國之迫害猶太人，那是更無待論的。反之，蘇聯卻是另一幅光景。牠對於其境內的雜多民族，卻在多方設法消泯他們中間的自然的歷史的差別，牠對於民族問題的解決，就是在向着這個反乎帝國主義之道的方向前進。

民族問題如此，關於民生問題，蘇聯與一般帝國主義國家所取的態度，亦是一個對照。事實上，蘇聯之民生問題本身，就與一般帝國主義國家不時嚷叫的所謂『民享』問題，大異其趣。蘇聯是走的社會主義的道路；『各取所需』，是其民生問題解決的極致，正如『世界大同』，是其民族問

題解決的展望一樣。爲了說明上的便利，我們不妨先在這裏把各資本主義國家所提出的民生問題，作一個概括的考察。

高度的資本主義國家，是由資本家階層及其所統治的廣大勞動者階層所組成的，這種國家之『民治』("by the people")『民有』("of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三大原則，實際並不是指着全體人民，而寧可說是指着資本家階層，近代民主政治乃爲資本家階層所設，爲資本家階層所治，那已經是天下之公言；至若關於『民享』或『民生』範圍內的保護私有財產，誰都知道那不是爲了愛護勞動者，反之，卻是爲了使勞動無產階層不要侵犯資本家階層的財產。不錯，勞動立法乃至社會保險制度等，都像是爲了保障勞動階層的生活問題而設，但我們一考察近代社會立法制度所由成立的全過程，就知道那怕這些保障勞動者生存的法律，其主旨乃是爲了要防阻因生活無保障而對資本家生產，或對資本家社會秩序引起妨害擾亂的無產大衆。總之，民生問題是在資本家社會嚴重存在的，但這個社會卻不便，實也不能把此種問題正式提起。然資本家社會不肯提起的，或被歪曲的提起的民生問題，在以實現社會主義爲職志的蘇聯，

卻就要當作其根本任務來求其解決。特在一切生產工具都屬於工農蘇維埃的社會，民生問題的障礙，已經不是在分配方面，同時這種社會的生產力，完全由牠過去在資本主義社會所受的束縛，梏桎改變過來了，從而其障礙也應當不是在生產方面。但依據下面幾種事實，蘇聯即在革命以後，其民生問題仍舊存在着。那幾種事實是：

第一，蘇聯所承受的是經濟落後的舊俄的遺產。而這遺產又經過了三年帝國主義戰爭的大破壞。所以在革命之始，第六次共產黨大會在一九一七年八月曾對當時經濟狀況有如下之估計：『戰爭進行三年以來的俄國經濟狀況爲生產勞動之全部消耗殆盡，生產解體，運輸網之破敗不堪，國家財政之瀕於最後的破產，及爲此一切之結果的便是食糧恐慌，人民飢餓，燃料缺乏及一般生產工具之不足，失業有增無已，人民之極度貧窮等等。』在這種狀況下的蘇聯人民生活狀況，已備極可憐了，但

第二，還由此經歷過了幾年的內戰與封鎖。牠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曾集中其一切資料與力量以與白黨和國外干涉者博鬥；當時環境至爲險惡，烏克蘭及其所產的麵包煤鐵，高加索及其所

產的煤油等々皆被敵人截斷；麵包和燃料之儲藏，亦已被擄劫得如空如洗。迨

第三，當蘇聯工農大眾以飢餓中的苦鬪，博得決定勝利，而走上新經濟政策途程時，一方面因資本家份子逐漸擡起頭來，在已經解決過了的分配問題上投下一大暗影，同時又因蘇聯力圖迅速有效的恢復戰前經濟實力，而其周遭資本主義國家，更不但未完全解除封鎖，且多方予以破壞，於是對於一般勞動大眾生活水準的提高，就很成問題。

蘇聯的民生問題，是在這些特殊情勢下產生的；那不是餓着肚子的大眾，看着大量牛奶小麥，投到海中喂魚的怪異現象下產生的問題，而是由生產系統破毀，生產品缺乏與災荒景象所形成的問題。這就是蘇聯民生問題的特質。

在革命後將近二十年的今日，牠的民族問題固然得到了徹底解決，其民生問題亦大體解決了。茲分述其梗概。

第二節 解決民族問題的途徑

蘇聯民族問題發生的事實，我們前面已經分別指出了。然則對於那種性質的民族問題，蘇聯是採取怎樣的途徑去解決的呢？一九一八年十月二日，蘇維埃政府曾宣布俄國各民族之權利（The Rights of Nationalities in Russia）共四點：

(一) 各民族平等並享有主權。

(二) 享有完全獨立之自由的民族自決權。

(三) 廢除各民族的宗教特權和限制。

(四) 俄國境內少數民族之自由發展。

這是蘇聯解決民族問題的一般原則；但這些原則，大體是就各民族所享有的政治權利言，或者是就蘇維埃政府賦與各民族的政治權利言。可是，各民族，特別是那些比較落後，比較弱小的民族，是否能夠享受這些權利，與其說是取決於蘇維埃政府的民族權利平等政策，卻寧可說是取決於各該民族的文化經濟諸方面的進步，是否够得上一般的水準。於是，我們在這裏就要參照列寧關於民族問題所提出的幾個口號：

(1)『民族自決』與『取消民族特權。』

(11)『蘇維埃給予從前被壓迫民族以經濟文化的幫助。』

(111)『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以社會為內容，民族為形式。』

這第一個口號，與前述四個原則相當；對於這個口號的實際運用，是下面這樣：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之頃，對於各民族的宣言是：『俄國的回教徒，窩瓦河流域及克萊米的韃靼人；西比利亞及土耳其的克爾基茲人及薩爾特人（Sartes）；外高加索的土耳其人及韃靼人，你們的信仰和風習，你們民族的制度和文化，以後仍是自由人的，不侵犯的。你們有權利享受牠們；你們須知道：你們的權利，正如俄國各民族的權利一樣，都在革命和工農兵蘇維埃強有力保護之下。你們要協助革命運動和革命政府。』迨至一九一八年七月蘇俄根本法（The Fundamental Law for the R. S. F. S. R.）宣布，其中已規定要把『特別具有民族或地域特徵的區域』合併成聯盟蘇維埃，又規定自治的地方團體可『依據聯邦形式加入蘇俄。』但願否加入，加入後願否繼續，一聽各民族自決。因此，根本法中表示：『蘇維埃俄羅斯聯盟共和國，為根據自由的原則，聯合各自由民族

的蘇維埃民族聯盟共和國，自願聯合，爲列寧的民族政策的最主要骨幹。』

其後，在一九二三年七月批准施行的憲法，更具體的規定：聯盟各共和國，在憲法所指示的範圍內，得獨立行使自國的主權。各共和國得依照地方狀況，調節內國商業；管理自國工業；規定利用土地的原則，處理自國領土內的移居；統轄糧食，社會保安、裁判、勞動保護、教育及國民保健等；爲自國需要制定統計；佈告地方大赦；組織自國的行政、民警及經濟。這樣，各共和國實握有極廣泛的權力或法律上所謂主權。牠們只在聯盟全體利益的必要範圍內受到限制。此外，各共和國還保有隨時退出聯盟的權利。

至關於蘇聯最高權力機關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及此大會閉期中代行其職權的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產生方法，和構成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民族院與聯邦院的對等權力，依照我們在本書第二章所解述過的，那已充分表示了民族平等原則的精神。不管某共和國某民族的經濟如何落後，其文化水準如何低落，但他們在政治上所享的權利與自由，卻毫無差別。『取消民族特權』的口號，是在這種絕對平等的政治組織中實現着的。

他若在『蘇維埃給予從前被壓迫民族以經濟文化的幫助』的口號下所成就的實績，這裏限於篇幅，不能詳細描述，我們僅就幾個經濟文化一向落後的幾個地域來例示其發展概況，如外高加索共和國的格魯齊亞，在第一屆五年計劃中，其國民經濟投資額共七萬萬盧布，而在第二屆五年計劃的一九三五年一年中，卻投下四萬萬零一百萬盧布，至一九三六年更增至六萬一千六百萬盧布。在國民經濟中，工業部門佔百分之七四·九；一九一三年的電力僅八千基羅瓦特，一九三五年已達十萬零五千基羅瓦特，一九三六年更增至十六萬基羅瓦特。歷年來，那裏許多新工業都建設起來，現在有一百十七種工業經過了徹底的改建。農業方面的耕地面積計增加二十萬俄畝。阿美尼亞共和國的工業，單在一九三五年一年中，就增加百分之六七·八，其電力在數年之中，由一千五百基羅瓦特，增至四萬一千六百基羅瓦特。其耕地面積在一九一八年僅有八萬俄畝，而一九三五年則達四十二萬一千俄畝，計增加五倍以上，隨着經濟發展，其文化事業亦異常進步；一九二〇年，全阿美尼亞的學生僅四千五百人，一九三五年竟由羣衆學校吸收了二十一萬三千名學生；在四十七所工業專門學校及十三所大學內，共有學生一萬七千四百人。單在一九三五年一

年中，用阿美尼亞文字印成的書籍有一千種之多，報紙八十八種，雜誌十七種。阿則倍疆也是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民族，但十餘年來，牠的各種工業都極迅速的發展，耕地面積較前增加百分之五十。並且，在革命以前，牠幾為未開化的土耳其民族，女人完全不識字，現在則初小及中學的學生，達四十八萬人，大學亦有十五所，計學生一萬一千名。此外，其他許多落後民族的經濟與文化，都有與這相當的發展，而其發展的全過程中，又是採取社會主義的方式，即是採行消除人與人間之種種自然的歷史的差別的方式，所以在資本主義世界永遠沒有解決希望的民族問題，在蘇聯卻已有徹底的解決，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斯塔林在蘇聯第十八屆代表大會席上，曾表述此種經緯說：「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共和國，乃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全蘇聯代表大會所構成……其構成原則，為全蘇聯人民之平等與意志自由……當時各民族間之關係，尚未照應有之方式奠定。當時對於俄人之猜疑尚未完全消滅，其離心之作用依然存在。在此種條件下，必須在經濟的政治的及軍事的互助基礎上建立各民族的友誼的合作，聯合彼等為一多數民族的國家。蘇維埃政權早已明知此中之困難……但仍決定試創一多民族國家，因其深知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成立之多民族國家，必能

戰勝任何困難。由彼時迄今已歷十四年，足證此爲一長期試驗。結果如何？那無疑表明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建立多民族國家之試驗已完全成功。此無疑乃列寧民族政策之一勝利。吾人將如何說明此勝利乎？第一，剝削階級之剷除；因剝削階級爲民族衝突間之主要組織者；第二，剝削現象之絕跡；因剝削能挑撥相互猜忌，煽動民族之相互仇視；第三，工人階級之把握政權，因工人階級爲一切奴隸之敵，以及國際主義之忠實信仰者；第四，在一切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各部門中之各民族間相互關係之真正實現。最後，蘇聯各民族以民族主義爲形式，以社會主義爲內容之民族文化的高度發展。凡此一切及其他相類因素之結果，已使蘇聯各民族根本改變其特徵。彼等相互猜疑之情緒業已消滅，彼等相互友好之情緒業已發展。因此，在聯盟國家制度中，多數民族之真正友誼合作遂終建立成功。」

這段話對於蘇聯解決民族問題的經歷，言之綦詳；要不外社會主義的理想之完成，必得消除民族畛域，而民族畛域之消除，又必得在社會主義的建設過程上，使各民族之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皆有均等的發展。

第三節 解決民生問題的途徑

我在本章第一節已經指出，蘇聯的民生問題的發生，不是由於目前通行各國的分配上的不均衡，而是由於經過大破壞後的生產上的不充實。不錯，為恢復經濟凋敝狀況而實施新經濟政策的結果，曾經在一九二六年度前後造出了失業現象，但當第一次五年計劃採行不久，此種現象已逐漸剷除。不過，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根本任務，在使蘇聯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即在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獨立性，因而，重工業成為其注意努力的中心。就因此故，第一次五年計劃雖不忽視大眾生活水準的向上，但為了成就基本建設的任務，多少還不免在這方面感覺沒有收到美滿的結果。這裏姑先就工業領域來說吧。

自新經濟政策實施程序開始以後，蘇聯已放棄了戰時共產主義時代以物品支付工資的制度，改以貨幣支給。貨幣工資依勞動的熟練與專門的程度，定為幾等；在第一次五年計劃將開始以後諸年度的勞動月給表中，計一九二七年為六四·六四盧布，一九二八年為七〇·九四盧布，一

九二九年爲七七・五六盧布，一九三〇年爲八三・三〇盧布，一九三一年爲九七・八三盧布。從這些數字看來，勞動者的工資，似在不絕騰貴，然此種騰貴，主要是由盧布漸次減價所引起的物價騰貴的直接結果。所以據多斐爾特(Dr. Gerhard Doffert)博士所說：『依公定統計，一九三一年工業勞動者的月收工資，平均約九十五盧布。如假爲名目月收工資爲九十八盧布，則蘇維埃聯盟之勞動者的物質生活水準，已足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同一水準相匹敵。然精密調查起來，其間頗有出入，即（一）蘇維埃聯盟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購買力懸殊；（二）滿足個人需要所必要的有用消費品，蘇維埃聯盟與資本主義國家比較起來，其量太少，其質亦極貧弱。』

總之，蘇聯第一次五年計劃對於工業勞動者的生活水準，並不曾有怎樣了不起的提高，雖然工資以外的像『休養之家』與療養所一類社會設施，在當時已露端倪，但政府爲購入實現計劃經濟所必要的機械與原料，而力求多多輸出的努力，已把他們所能夠享用的僅有的物質，亦大加限制了。

然而，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成功基礎上所樹立的第二次五年計劃，就特別注意到勞動生活環

境的改善，與生活水準的提高。由是對於輕工業部門的消費品生產，亦相應倍加努力。就勞動者全體而論，一九三六年四月的工業勞動者平均工資，較之一九三三年增加百分之八七·二，而一九三六年全年的平均工資，較之一九二八年增加三倍半。同時在盧布價格隨第一次五年計劃成功而日趨堅定的情形下，此種工資的增加，並非由於幣價跌落所引起的物價騰貴的結果，而是勞動者熟練增進生產能力加大的結果。事實上，勞動者除了直接由國家領取的工資外，還間接在各種方面受到利益。比如，工廠爲了文化與社會事業所支出的設備費，即對於文化休養機關、旅行機關、音樂室、電影院、地方俱樂部、運動室、工廠內休養室、廉價食堂，乃至勞動者住宅修建所支出的費用，都算是對於勞動者的工資以外的支出。至若伴隨勞動條件而享受的每年一個月的休假（工資照給）以及爲婦女勞動者特別規定的許多權利，通爲勞動者生活改進的最好說明。工資迅速增加，同時勞動者又在各方面受有特殊待遇，故他們除了改進生活（物質的文化的）外，還能逐漸增加其儲金。下表爲勞動者百分之十二儲金的工廠中的國立銀行支店的儲金增加表（勞動者除此銀行外，還在其居住附近的銀行從事儲蓄。）

	儲金者數	平均儲金
一九三四年一月	二七〇	九一盧布
一九三五年一月	三〇〇	一五四盧布
一九三六年一月	三六〇	一五七盧布
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	四一二	三〇六盧布

儲金的增加，與工資的增加，保有相當的比例。然而這還是就一般工業勞動者而言。在一九三五年下半期發動『斯泰哈諾夫運動』以後，蘇聯勞動生產力突飛猛進，由是參加『斯泰哈諾夫運動』的勞動者工資，都有極迅速的增加。

在工業領域內的勞動者生活改進情形，既如上述，我們以下要略述農業領域內的農民生活狀況了。

事實上，在工業勞動者生活沒有多少起色的第一次五年計劃中，一般農業的生活景況，亦同樣的無何等改進，由第一次五年計劃初期即一九二八—九年施行的領券制度，那就是要在農業

未充分發達，穀物供給不够滿足需要的情形下所採行的確保急激工業化的非常政策。當時農村方面由國營農場所提供的穀物，不過佔百分之六，其餘有百分之九四是在個人農民手中。富農把穀物隱存起來，在積極消極方面圖謀反抗政府，政府為消滅此種反抗，堅決採強制的分配手段即領券制度，此後又在一九三一年設立農村政治部，以彈壓並驅除富農，使國營農場與集體農場迅速發達，其結果，農村怠工的景象消泯，農業勞動生產力得到解放。農業迅速機械化集體化，耕地面積擴大化，由是農民的生活乃隨收穫的增加而漸形改善。因為蘇聯各種企業（不論是工業抑是商業）在獲得計劃以上的利益時，其利益得用以從事該企業上之勞動者的福利設施。在農業上亦是如此，集體農場把總收穫中額定賣給政府的，對曳引機配給所償付的，以及為保險及其他積存金開支的通通支銷後，其剩下的餘額，就分配於各農民，所以收穫愈多，集體農場全體的地位愈好，農民的收入亦愈增加。就一九三四年說，把上述各種開支扣除後的蓄積部分，每個農家有一百五十盧布到三百盧布。據國民經濟中央統計局調查八萬五千個集體農場的結果，每個農家在開支一切後所分配得的現物，在一九三二年為穀物五·五公石，馬鈴薯二·二公石，野菜〇·五公

石，至一九三三年，順次爲九·八公石，五·七公石，一·四公石；到一九三四年，則順次增至一〇·九公石，七·八公石，五·四公石。事實上，農民除了由集體農場所分得的現物外，更還由自己的土地，收穫有種種作物。大體上，他們的主要食品，幾乎全由集體農場獲得，而牛乳、肉、野菜等等，則主要得自個人自己的經營。因爲依照集體農場新章程的規定，不需要社會化的小塊土地，是得分與集體農民作爲菜圃之用的。

隨着農民收入的加多，經濟生活的充裕，其文化生活，其社會各方面的設施，亦由國家設法提高；當前蘇聯境內各地的農村，已都完全改換了一個面目。農村豐裕，農產物如我們前章所述的迅速增加的結果，以前在分配上所採行的領券制度，亦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依據上面所述，以工農爲主體的蘇聯社會的工業勞動者與農民的生活，在今日雖還不曾達到「各得所需」的理想境界，但我們一環顧資本主義世界充滿着失業與飢餓所造成的恐慌景象，就得承認這日益趨向繁榮坦途的蘇聯的民生問題，已經有了大體的解決。

第四節 由平等的結合到平等的享受

由上面的說明，我們得在這裏指出：蘇聯解決民族問題，民生問題的方法與途徑，都非資本主義國家所能仿效，事實上，資本主義國家亦決不會想像牠們有採行那種方法的必要。因為在蘇聯成爲問題的問題，在資本主義世界是用另一種態態，另一幅面目表現出來。

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是由種種區別人與人，使人與人保持着一定距離的法律制度所維持。階級身份制財產制，種族的政治的優越權等等，無一不是企圖使社會或某一政治區域內的一部份人對其他部分人保持一定的差別。對同民族用階級身份制財產制來表示區別，對被統治的異民族，更在此等差別制外加上一些種族優越感種族特權，以及種族差別待遇等等。所以有人說：「現代資本主義的特徵，不僅是對於國內勤勞大衆之剝削，尤其是對於別的國家或民族之掠奪。這種經濟的特質反映到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上就是國外種族與國家之隸屬，即認種族國家不能平等；有全權國家，有無權國家，此外又有第三等國或種族（殖民地）。因此，布爾喬亞的憲法，不

僅是對內壓迫勤勞大眾的工具，而且到現在還更進一步，變成一國家對另一國家，或一種族對另一種族壓迫和剝削的工具。」如像英國憲法效力之擴大到愛爾蘭、印度、加拿大、澳洲、南非；國憲法擴張其效力到安南、摩洛哥；日本憲法擴大其效力到朝鮮、臺灣乃至傀儡滿洲國，皆是很好的榜樣。誠然，這些被統治的國家或種族也有其憲法，但那種憲法的主要原則，就在維持其對於統治國統治種族的不自由不平等的隸屬關係。所以被統治國或種族對於統治者的叛變與反抗，就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民族問題的尖銳表現，但資本主義世界或帝國主義國家對於那種性質的民族問題的解決方式，就是用牠們的毒氣和大礮去鎮壓去征討；一經征討鎮壓下來，則又用更不自由、更不平等的法律，去防範其下次的叛變與反抗，因此民族問題永遠在資本主義世界殘留着，而且日益增大其嚴重性。那種民族問題儘管顯然是由不平等的差別待遇所激成，但資本主義在本質上需要維持那種差別，那與社會主義在本質上需要破除那種差別正好是一個對照——一個在民族問題上的對照。

惟其如此，蘇聯對於民族問題的解決，與其說牠是在發揮寬大為懷的一視同仁的平等精神，

就不如說是牠那種國家社會形態，有採行平等民族政策的必要。蘇聯在開始運用其以自由平等爲原則的民族政策的時候，其境內的許多民族，許多共和國，並還不會十分自覺的意識到此種政策的特質，從而牠們對於當時採行此種政策之主體的蘇俄，即對於一向擁有民族特權的俄羅斯人，還懷着疑忌的態度，但直到一切事實說明了民族平等爲社會主義的必須實現的理想現在，每個構成蘇聯的民族或共和國，都確切明瞭各民族的平等結合，不是出於若干革命者的好意，而是由於革命的制度的根本要求。

我們如把這種事實與前述民生問題作一連帶的考察，就更可洞悉此中的關鍵。我們都知道，社會主義制度的理想，就在達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大目的。蘇聯憲法中規定的『不工作者不得食』的原則，就是在實現那種大目的過程中或過渡期中所採行的有效步驟。特這種步驟的採行，表面上看似簡單，然求其能切實推行，則必須除了打破一切經濟的特權，社會的特權外，還當打破種族的特權；特權是剝削的寄託與庇護，要剷除一切特權，從而剷除剝削現象，然後始能順利施行『不工作者不得食』的原則。無例外的平等工作，無例外的平等享受，單就種族的範圍內

講，那將使俄羅斯人對於土耳其人，猶太人，以及其他種種色色的小民族，或各民族相互間失去任何種族差別的意義，而且，他們由自然歷史條件所造成的語言體格膚色習慣等等方面的特点，那亦將在平等結合（政治的婚姻的）與密切往來的過程中，而逐漸消失。

不過，在這裏，我們還得注意一件促成民族平等原則實現的因素，那因素，同時又是人人平等享受的重要內容，所以我們必須附帶在這裏指出，並加以簡括的說明。蘇聯革命指導者告訴我們：『社會主義是不能在文盲的國家實現的，』這是說，文盲不能理解社會主義，不能建設社會主義，也無從享受社會主義所給予他的物質以外的文化上精神上的福祉。我們知道，革命前的俄國，不僅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同時也是文化程度低落到幾乎與中國相伯仲的國家。十月革命後的第一天，蘇俄雖已決定充分發展人民教育，並於一九一九年一月頒佈『單一勞動學校的章程』，於同年三月通過『人民教育』的辦法，但因當時正在內戰期間，百廢待舉，而經濟條件又異常貧弱，所以在文化建設方面沒有怎樣了不起的成績。迨後經過新經濟政策時代而入於第一次五年計劃前期，蘇聯在一方面固已造出了推行一般教育設施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也在經濟建設上

造出了擴展教育程序的緊迫需要。所以在一九三〇年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之傾，斯塔林曾說：「現在主要的是開始進行義務初等教育；我之所以說「主要的」，是因為這種工作在文化革命事業上實有其決定的意義，且早已到了進行此種事業的時期。因爲現在蘇聯絕大多數的地方，已有組織普及初等教育的一切必需的條件。」惟其條件具備，故在小學肄業的兒童，在實施普及教育前一年度的一九二八—九年，僅爲八百九十一萬人，比較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間的七百萬，僅多一百餘萬，但到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其數竟達一千一百萬人。在一九三六年中，各小學初中高中所包括的人數，共爲二千五百五十萬人。由是在普通學校服務的人數，亦相應迅速增加，即在一九三〇年爲三十八萬八千人，至一九三五年已超過七十五萬二千人。以識字人民增加的數字說，照一八九七年的調查，帝俄識字人數爲全人口的百分之二二·三，到一九三三年則已增加至百分之九〇。現在無論在蘇聯境內那一個落後民族間，都不容易發現一個文盲，文盲掃除運動，已經百分之百的成功了。而且，蘇聯近幾年的教育，不但在逐漸普及化，且在不斷高深化；一九三〇年，在大學受業者爲十九萬一千人，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則增至五十二萬二千人。而在這五

十二萬二千人中，女生佔全體百分之三八。

以上是蘇聯教育之量的方面的發展的情況，但我們尤當注意的是其質的方面的改進，即是其文化政策之政治意義。大體上，蘇聯教育有三大特徵：其一是單一勞動學校制度的採行，即牠剷除過去帝俄時代的階級教育，把所有帶有特殊社會化性質的教育機關，都予廢絕。作為普通教育機關的單一勞動學校，計分有三種：第一種是國民滿八歲即入學受教四年的所謂國民皆教主義的義務教育；在原則上，這種學校不但不取費用，並對貧寒兒童供給衣服皮鞋，教科書畫食等等。第二種是在這四年上再加三年的所謂七年制初等中學。第三種則是在這七年上再加三年的十年制，此十年教育都屬於普通教育，普通教育終了，則移向高等教育。但七年制學校終了，可直進中等職業技術學校。這是從蘇聯教育制度方面看出的民主的精神。蘇聯教育的第二特徵，就是特別注意實科的技術教育，特蘇聯這種技術教育的目標，與資本主義國家所注重的職業教育不同。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誠然是促使蘇聯採行此種教育程序的一大原因，但其實還有更根本的意義在乎其中，即『不工作者不得食』或『各盡所能』，那是社會主義所加擔於其每個組成份子的勞動。

義務，勞動技能之獲得，乃其履行那種義務的必備條件。至若使就學者不專偏於一門技術知識，使其習得容易由一種經營或一種職業轉向其他經營其他職業的習慣與技能，那更與資本主義國家把專門者當作「機械」訓練，使其變為本行以外一無所知一無所能的機械式教育又不可同日語了。最後，蘇聯教育的第三特徵，就在以徹底的貫輸社會主義意識為其教育主旨。政治教程是蘇聯學校教育的最重要科目。共產黨大學蘇維埃黨學校，以及啓蒙學校等等固不必說，就在其他各級普通學校，成年學校，高等成年學校，下而至於幼稚園中，殆莫不極力貫輸其社會主義政治意識，使他們成為社會主義的真正擁護者。

至若學校教育以外的一切文化設施，如兒童之家、托兒所、圖書館、文化俱樂部、讀書之家、戲院、電影院、雜誌報章書籍出版機關等等，無一不在秉承着民主的社會主義化的精神，從多方面來提高文化水準與增進建設的技術準備。而在去年公布的新憲法中，更明確規定「蘇聯公民享有教育權。此項權利，由普及義務之小學教育，包括大學教育之免費，大學生之絕對多數的受國家津貼，各校之以方言講授，工廠，國營農場機械曳引機站及集體農場中勞動者工業技術，農業等免費教

育之組織，爲之保證。」這是適應蘇聯建設成功而規定的國民教育權；對於這種權利的享受，沒有種族男女階級的差別。總之是徹底平等的。

由此我們知道，文化上的平等享受，與經濟上及其他社會政治方面的權利的平等享受，有同樣的或更大的意義。教育不但具有融化各民族之感情與自然和歷史特點的機能，且是克服一切非社會的意識的武器。所以教育文化上的平等的民主主義的精神，同時又可看爲是促進民族平等結合，與助成其他一切方面之平等享受的有效手段。

第五章 從外交政策所見的政治動態

第一節 被封鎖中的奮鬥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的最初二三年中，蘇聯與世界其他各國，不僅沒有任何正常關係，且進行着正面的爭鬥。布爾希維克黨人完成了推翻現存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革命，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看來，這已是十足的大逆不道；他們更大聲疾呼的號召各國勞動者奮取政權，鼓吹各殖民地革命獨立；更進而毀棄過去一切條約，否認一切外債，沒收外人在俄投資，因此愈不能見容於各資本主義國家。在革命爆發的最初數月，各帝國主義者還是採取傍觀監視的態度。他們一方面認為布爾希維克黨絕不能鞏固其政權，不久自會崩潰；另方面德國的東部戰線還在不斷的進展，他們希望赤俄還能繼續對德作戰。到一九一八年夏初，帝國主義者再不袖手旁觀了，採取直接武裝干

涉政策，援助白黨，組織暗殺與暴動。英、法的軍隊蹂躪俄國的西南部，日、美則由海參威（Vladivostok）侵入西伯利亞（Siberia）；柯爾哈克（Korlchak）、但尼金（Danikin）、猶頓尼希（Udanish）與佛蘭格爾（Frangel）之流，無一不是在帝國主義者的援助與指示之下而行動的。

一九一九年之末，各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均告失敗，白黨亦盡被赤軍擊潰，到一九二〇年布爾希維克政府已戰勝國內一切白黨。那時的俄波戰爭，是英、法直接消滅赤俄政權的最後嘗試，亦不能有較好的結果，這使帝國主義者對俄國的態度不得不有所改變。而且，赤俄占有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十二分之一的人口。列強用經濟與政治的封鎖把她摒諸國際生活之外，對蘇俄固然是絕大的威脅，但對各資本主義國家亦是極大的損失，何況在大戰的破壞之後，這一廣大市場實有異常重要的作用。

一九二〇年初，協約國不得不放棄直接干涉的企圖，且轉而趨於經濟的往來。他們避免在政治上與蘇俄接近——即不發生外交關係，但自認應與俄國人民通商，即帝國主義者經過蘇俄國營合作社來與俄國人民貿易。他們將在俄境的軍隊撤退以後，協約國最高理事會發表宣言：「協

約國政府再不教唆邊境各國與蘇俄繼續作戰，因爲戰爭對於這類國家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同樣，協約國政府亦不使她們以侵略政策施之於俄國。但如果蘇俄侵犯她們的合法國境，則協約國將與邊境國以一切援助。」宣言中關於通商的說明，謂「通商關係不僅對於蘇俄經濟的改善是必需的，即對其他各國的經濟改善也是必需的。」最後，宣言中屢次聲明「如果蘇維埃政府不終止布爾希維克的宣傳，不接受一切文明國的原則來決定外交政策的方針，則協約國不能與之發生外交關係。」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經濟的封鎖是已撤消，但政治的封鎖仍在繼續。另方面，蘇俄政府自成立之始，即揭橥對外的和平，布爾希維克革命的基本政綱，原來就是土地麵包與和平三者。當協約國正在直接間接干涉俄國革命時，新政府即發出和平的呼聲，以賠款與割地來訂立的布勒斯特和約，固然是由於列寧氏預見到德國革命的行將到來，主要的仍是新政府要取得喘息的和平時間。當一九一九年春，國內戰爭尚未終結，列強政策尙未改變時，新政府已接受協約國的召請，準備與後者談判帝俄國債，以原料付息，給予租借地等問題。在蘇俄西部邊境新成立的五國，芬蘭、愛沙

尼亞、拉特維亞、立陶宛與波蘭，原均爲帝俄的領土，革命後先後獨立。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蘇聯均與之訂約，承認其獨立。這固然是其民族政策的實施，但也表現其對和平的渴望。

一九二一年以後，蘇俄的地位比較鞏固，白黨的勢力已被消滅，這自然要改變其在國際間的地位。各帝國主義者雖仍堅持其政治封鎖的政策，但實際上則等於開始承認蘇俄，這就是各國與蘇聯商業協定的成立，帝國主義的臺柱大英帝國首先於一九二一年三月，與蘇俄訂立商約，五月俄、德商約成立，十二月俄、意商約成立。

自然，蘇俄國際地位的這種轉變，並不僅原於其自身的穩固，而主要的還是各列強本身的要。求摧毀蘇俄政權的一切企圖，既已都證明其失敗了；而大戰的破壞，失業的恐慌，正日益加甚的威脅各國，成爲『世界商店』的大英帝國，首先感覺到這一問題的嚴重。當時自由黨的代言人在觀察雜誌上說：『俄國現在成了全世界的中心問題，我們在今日才感覺到俄國超脫世界經濟系統以後的結果……俄國糧食的中心，我們沒法進去；俄國是全世界的大市場，我們也沒法進去。打開她的門戶是應該由西歐發動的。飢荒（俄國的）促進了我們在戰後所發生的問題的總解決，就

是以供給俄國恢復生產的工具的方法，來取得我們人民所必需的工作和麵包。」

大英帝國不僅使自己，且使其他各國也與蘇俄發生經濟關係。一九二二年一月六日，在康耐(Cannal)召集的協約國最高理事會，迫於魯意喬治的催迫，通過了下列的決議案：「協約國在召集會議以前，共同表示一致的意見，在二月間或三月初決定召集經濟和財政會議。在這會議中，所有歐洲各國，連同德俄、奧匈及保加利亞均需派代表出席……比較強有力的國家能一致努力進行，是恢復歐洲在大戰中斲傷的元氣的必需條件……這樣的 effort 必須消滅那橫在商業前途的荆棘，弱小國家必須得到外來的大宗貸款……協約國認為有利於工作的根本條件，當歸納到下列幾點：一國不能侵略其他各國的原則，根據這原則的基礎，一國有一國的私有制的組織，有一國的內部生活和行政制度；在這關係上，每一個國家有權採取適合於本身的系統……」

引文後面一段，自然是對俄而發，這表示帝國主義者已不是以前那樣的死硬了。其次提出對俄信用借貸的條件，主要的是承認債款，賠償損失及禁止宣傳。在康耐通過的議決案的最後一段說：「如果俄政府為保障利於俄國商業發展的必須條件計，要求協約國的正式承認，那協約國是

絕對同意的，但須以俄國接受上述條件為條件。』

這宣言發出以後，接着蘇聯參加日內瓦會議，後來也參加過其他的會議。但債務、賠償、宣傳等問題，終未解決，是以蘇聯與各國還祇能在半復交狀態中。

新經濟政策實施以後，蘇聯經濟地位迅速恢復，其對於世界經濟的作用加大。大英帝國不再堅持上述先決條件，首先於一九二四年二月二日承認蘇聯。在同年中，接着有意、挪、奧、希臘、瑞典、中國、丹麥、墨西哥、法蘭西等承認蘇聯。一九二五年一月，日本亦與以承認。到這時為止，除北美合衆國而外，世界各主要國家均先後承認蘇聯，從這時起，她纔有比較正常的外交關係。

第二節 對歐洲的外交政策

大英帝國是資本主義的臺柱，其殖民地遍及全世界，蘇聯所號召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殖民地獨立，無異是掘挖大英帝國的基石。雖然首先承認蘇聯的是牠，但最堅決最頑強而且始終不渝的成爲反蘇策動者的也是牠。

在直接干涉與援助白黨的活動中，大英帝國固是主要角色。即在那時期以後，英帝國仍是沒有時刻放鬆了蘇聯。一九二三年的洛桑（Lausanne）會議，對土耳其海峽問題的決議，允許列強的海軍通過海峽到黑海來威脅蘇聯。同年，向蘇聯提出哀的美敦書，提出四項嚴峻的要求，以及後來的洛迦諾（Locarno）會議，均可以視為武裝干涉的變形或引伸。

一九二三年末的改選，英國工黨揭櫻英、俄復交，商業借貸，承認蘇維埃政府等，作為競選的口號。因此而戰勝了保守黨，由工黨首次組閣。是以這時英國首先承認蘇聯，並於同年八月，訂立英、俄條約，解決戰前債款及英僑投資問題。這一短時期可以說是英、俄邦交最順利的時候。在該年冬季，保守黨製造第三國際總書記季諾維也夫（Zinoviev）函件，謂後者陰謀組織英國的革命，因此推翻了麥唐納內閣，保守黨重握政權，又恢復了積極的反俄政策。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事件，與因此而展開的中國國民革命，在英帝國主義者看來，是「莫斯科的魔手」在作祟。帝國主義者認為「英國所受中國慘劇的影響，是由蘇聯造成的。」更宣傳說，「在中國，或須以蘇維埃的模型來沒收外國財產，也是可能的。」英帝國主義者除了直接壓迫中

國革命外，更號召其他國家來對付蘇聯。

一九二六年五月，英國百萬礦工大罷工，蘇聯職工會以大量金錢接濟罷工者，更加惡化了英俄關係。當時英國對俄提出正式抗議中說：『英政府對於俄政府之以罷工基金援助工人的行動，深為痛惜。』並說『此種步驟決非以友誼關係解決雙方問題所應有的態度。』至於個人與保守黨刊物更極力攻擊蘇聯，號召驅逐『莫斯科的匪黨』，詆毀蘇維埃政府為『無人信用的匪徒。』

兩國惡感的發展，愈益深刻。一九二七年五月，英國乃正式向俄宣布絕交，這時候，英國實懷有極大的決心與希望。當時每日郵電的社評說：『這一步驟，英國必能使蘇聯在近東，中東及遠東的威信掃蕩殆盡。在中國、波斯、阿富汗及土耳其，必然在最短期內產生這一步驟的結果。另方面，邊境各國，自芬蘭以至羅馬尼亞，亦必受英倫之慫恿而表示決心……』誠然，英國政策是曾發生相當效果的。絕交經過兩年，直到一九二九年工黨重新執政時，纔再恢復邦交。在這期間內，英國從各方面來動員反俄的勢力。蘇聯西部五個新國，本為帝國主義者扶植起來作為反蘇前衛的，現在則加紧各該國中法西政權的確立，製造反蘇的空氣。在西歐，則扶植德國並拆散其對蘇關係。在近東，慫

惠波斯、阿富汗與土耳其的反俄。在遠東，破壞中俄關係，支持日本的進逼。

這一切，並沒有得到怎樣巨大的積極結果。英國自身亦蒙受相當損失。是以工黨二次執政時，即恢復對俄邦交。自此而後，蘇聯埋頭於經濟建設，對外揭橥和平政策，思與資本主義世界和平共處。英帝國為經濟恐慌所苦惱，在外交上除縱德抑法與暗中反蘇外，沒有以前那樣露骨的表示。雖然一九三三年曾因英國維克電器廠工程師陰謀破壞五年計劃案，一度使兩國關係緊張，但不久仍歸平復。

英帝國對滿洲九一八事變之所以異常冷淡，對希特勒之所以一再優容，用意就是使日、德成為反蘇的急先鋒。但近來日本獨占中國的氣勢，使大英帝國感到相當的威脅；而毀盡一切國際公約，軍備迅速擴張，公然要求殖民地的第三帝國，也不能使大英帝國安枕無憂。近兩年來，英蘇關係較前轉好。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蘇聯國勢增強與和平外交的成功，另方面則是日、德的威脅，使大英帝國有時不得不引蘇聯為聲援。去年夏天，蒙德婁（Montreux）會議的海峽新公約，英蘇海軍協定，英、蘇商務貸款等，都表示大英帝國對蘇聯政策的相當轉變。不過，這種轉好固然是事實，但英

國並不會放棄其反蘇組織者的重要使命。

蘇聯與法國的關係，在最近三四年以前，向是處在敵對的地位，甚至在許多地方，法國較之大英帝國更為露骨。這裏自然也有其特殊的原因。戰前法俄關係最為密切，法國資本家於帝俄時在那裏有大量的投資，其數為七萬三千二百萬盧布，占全體外國在俄投資三分之一，蘇俄革命後概行沒收；其次，赤俄違背協約與德單獨媾和，德國軍隊得以集中西線，這使法國增大巨大的犧牲；最後，法國不像大英帝國那樣急於希求蘇聯的市場與原料。是以法國一向與英國站在一起來成為反蘇的組織者，並特殊的在波蘭與羅馬尼亞指揮反蘇的工作。

德帝國主義的復興，使法俄關係不得不發生變化。希特勒的崛起，更使法帝國主義者擔心其自己的前途。法國必需外有強大的與國方能保障其東境的安全。一九三二年年底的法蘇互不侵犯條約，就是這樣應時的產物。自此以後，在歐洲外交上，法蘇乃趨於大體的一致。正因此法蘇的一致，蘇聯在歐洲外交中纔取得顯著的地位。關於集體安全問題、軍縮問題、侵略者定義問題等，李維諾夫（Litvinov）能高視闊步，毫無顧忌的暢所欲言。一九三四年九月，因法國的斡旋，蘇聯加入了

國際聯盟，這是蘇聯對外關係中之一大關鍵。原來蘇聯對於國聯的態度，一向是非常冷淡的，且譏之為「帝國主義者分贓的機關」，「是帝國主義宰制弱小國家的工具」。可是自滿洲九一八事變與希特勒登臺以後，世界大戰的風雲，日益緊急。這時候，擺在蘇聯面前的是兩個問題：或是袖手旁觀的讓戰爭爆發，抑或設法阻止這種大流血慘劇。無疑的，她應該採取第二條道路。國聯固然不能阻止戰爭的爆發，但國聯的瓦解卻無疑將加速戰爭的到來。蘇聯之所以一反其原來的態度而加入國聯，也就因此。她企圖加入國聯機構以後，可以完成下列幾種目的：

第一，促進國際不侵犯條約的普遍成立，締結對於侵略國共同防衛的協約。第二，緊緊拉住法國及其所領導下的衛星國，以遏止德國反蘇聯及製造戰爭的暴行。第三，利用英國之要對抗法、美及壓迫弱小民族的行為。第五，貫澈自己的和平裁軍計劃，用和平會議或其他方式來促進普遍的裁軍運動。法、蘇的接近，以去年五月法蘇互助公約的訂立，達到最高的成熟。該公約的內容，據法國外交部正式發表的，有公約五條及議定書三條，其要點如下：（一）法蘇兩國如受到歐洲國家的威

脅時，應立刻互相諮詢（遠東問題除外）（二）法、蘇兩國未經挑釁而本國領土受到侵略的時候，不管侵略者是國聯會員國或非會員國，都應該立刻互相援助。（三）公約內條款如與簽約國一方所負擔的條約義務相抵觸者不適用。（四）經簽約國彼此同意，得自由參加性質相類的協定，參加該協定以後所產生的約束，可以代替本公約所產生的約束。（五）本公約批准後，並有效期間五年。這次訂立的公約，大體上係以國聯盟約第十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為根據，即是用公約來保證國聯盟約的兌現。同時，又不受國聯機構的阻礙，因為在議定書中，規定『如行政院未發表建議書，或建議書未一致通過，則簽約國互相援助的義務仍要實行。』照這樣看來，則法蘇公約無疑的給與歐洲和平以極大的保障。

蘇德關係恰與法蘇關係的情形相反。三四以前，兩國是非常和好的。因為在那時德國是不滿意現狀的國家，時刻在企圖推翻凡爾賽和約，蘇聯則又困於英法的包圍政策，時刻感到威脅，這是使兩國接近的第一點。其次，蘇聯原為一農業國家，德國則為一工業國家；德國需求蘇聯的原料與市場，蘇聯亦要求德國工業品的供給。這是使兩國結合的第二點。蘇聯革命後十多年，與德的友

好關係就這樣建築起來的。一九二五年洛迦諾協約的成立，正是英國企圖把德國拉到自己一邊以孤俄國之勢；接着德國加入了國際聯盟，也可以看為德蘇分離的最初徵兆。但兩國仍然維持著較好的關係。希特勒登臺以後，雖然還有德蘇議定書的訂立（一九三三年五月），但這主要的是由於經濟的原因。國社黨的政治思想及其政綱，首先即企圖犧牲蘇聯以「恢復大日耳曼的優越」。他們念念不忘情於烏克蘭（Ukraine），因為那裏正是德國所需要的大糧食庫，大工業區與礦產地。希特勒在其『我的奮鬥』中，公然宣稱要在蘇聯邊境設立殖民地。國社黨外交健將盧森堡（Luxemburg）在其『向東方躍進』一書中，主張侵入蘇聯是十分必要的，謂「烏克蘭脫離蘇聯，乃是歐洲最重要的問題。」總之，自國社黨執政以後，無時無刻不在企圖進攻蘇聯。

去年九月，國社黨在紐倫堡（Nuremberg）開大會，其中心任務即是『與世界第一號公敵布爾塞維克主義之威脅相爭鬪。』宣傳部長戈培爾（Goebel）說：『布爾塞維克主義者，瘋狂犯罪之行為也……故布爾塞維克主義問題，實即歐洲生死存亡之問題。』希特勒當時向勞工陣線演說，更謂：『假使德國有烏拉爾（Ural），西伯利亞及烏克蘭之麥田，則將優游自如而無庸奮鬥以圖生

存矣。」正在同時期，蘇聯紅軍在明斯克（Minsk）舉行操演，蘇聯要人於罵國社黨之餘，更聲明已準備擊潰任何進攻蘇聯的敵人。這可以表示兩國關係的緊張。最近日德反共同盟成立，更使兩國關係惡化萬分。

除對這幾個主要國家的關係而外，再來看看蘇聯在歐洲方面和平外交的一般活動。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七日，蘇聯與土耳其訂立不侵略條約。一九二六年四月與德訂立中立條約，同年九月與立陶宛訂立友好中立條約，並先後與德訂立仲裁條約及和平條約。一九三二年一月與芬蘭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同年二月與拉特維亞訂不侵略及中立條約，五月與愛沙尼亞訂不侵略及仲裁條約，五月將蘇波不侵略條約展期至一九四五年。一九三三年九月與意大利成立不侵犯條約。一九三四年波羅的海諸國將與蘇聯所訂之不侵犯條約延期至一九四五年。七月與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立陶宛、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國訂立侵略界說條約。這一切都是蘇聯企圖和平的努力與成功。

至於對普遍的和平與裁軍問題，蘇聯亦有其獨特的地位，早在一九二二年，蘇聯前外長齊采

林(Chicherin)在日內瓦(Geneva)會議上提出普遍的裁軍計劃，終於受到列強的反對。此後蘇聯與國聯的關係日益惡化。二四年間瑞士境內沒有蘇聯代表的蹤跡。直到一九二七年第四次軍縮準備會議中，以李維諾夫為領袖的蘇聯代表團纔在日內瓦大顯身手。李氏在那裏大聲急呼的要求「立刻地徹底地普遍地實行軍備縮減。」照他的提議，所有用以殺人的軍器、兵艦、化學戰爭品、兵工廠、礮臺等都在廢除拆毀之列；所有的海陸空軍一律遣散，軍事組織統行撤消。自然，這樣的提議，是蘇聯故唱高調，不會為列強所接受，於是蘇聯代表再提出一個比例的軍縮計劃。一九三二年軍縮會議正式開幕，蘇聯代表仍堅持其比例軍縮計劃，一樣遭到拒絕。在一九三三年的軍縮會議中，李維諾夫仍說：「我們深信所有國家最好的安全保障，莫過於完全廢除軍備，或者在最短期內將軍備儘可能作大量的縮減。」「侵略國」的定義就是蘇聯代表團在這時候提出來的。蘇聯看到軍縮會議無望，在一九三四年五月提議將軍縮會議改為和平會議，由各國互訂不侵犯條約及保障公約來防止戰爭。然而，這一點仍然為許多國家所不能贊同。

第三節 對東方的外交政策

蘇聯對東方弱小民族的政策，自始即注意扶植弱小民族，培養其反帝國主義的力量與鬪爭，揭擧無條件的民族獨立的口號。一九二〇年，開於巴庫（Baku）的東方弱小民族會議，除宣示一般的民族平等與獨立的原則外，季諾維也夫更說：『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應聯合起來，以作神聖戰爭，而這種戰爭應以打倒英帝國主義為首着。』英帝國之所以永不放棄反蘇的組織任務，蘇聯的東方政策亦為其主要原因之一。

就在這時候，蘇聯對波斯、阿富汗與土耳其宣言，放棄帝俄時代在後列諸國中所取得的一切特權。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間，與上述三國先後訂立友好條約。此後，土耳其在蘇聯援助之下，已成為獨立國家。波斯、阿富汗的地位亦較前為優，她們與蘇聯的關係，至今也還在友好狀態中。

成為中國領土之一部的外蒙，在一九一一年中國革命時，即投入俄皇懷中而成為半獨立狀態。一九一九年中國政府乘西伯利亞混戰之際，曾一度用兵於蒙古。一九二〇年白黨勢力漸侵入

蒙古至一九二一年四月且佔領庫倫，蒙古國民革命軍取得赤軍的援助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奪回庫倫，組織蒙古共和國。自此而後，蒙古即在蘇聯卵翼之下而成獨立國家。去年春成立的蘇蒙協定，使二者的關係更為密切。

蘇聯與中國的關係，經過幾次變化，這是吾人所熟知的，一九一九年七月與一九二〇年十月，蘇聯政府對中國發表兩次宣言，申言廢棄以前中俄間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一切不平等的權利與特權，因此頗能博得中國人士的同情。特別在南方的革命運動中，國民黨領袖與蘇聯更有密切關係，直到一九二七年，中俄關係纔漸惡化。一九二九年因中東路事件，中蘇即斷絕國交。九一八事變發生，中蘇兩國均感覺到日本的侵逼，乃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又正式恢復了邦交。

當帝國主義者武裝干涉蘇聯時，日本也是極賣氣力的一個。一方面是要撲滅資本主義的敵人，同時更企圖奪取西伯利亞沿海州(The Maritime Province)及北庫頁島(Sakhalin)，以實現其大陸政策的迷夢。不料蘇聯勢力日益加強，終於奪回其東方一切領地。日本於失望之餘，乃於一九二五年一月隨其他列強之後而承認了蘇聯。不過，日本在這方面的野心並沒有根本放棄，當

國交談判時，她即提出許多要求。雖遭蘇聯的拒絕，但終得到一部分的滿足。例如繼續讓予日本庫頁島的煤油採掘權，承認樸茨茅斯條約等。國交協定正式簽字以後，北洋漁業協定與北庫頁島煤油協定亦相繼成立。根據北洋漁業協定，蘇聯承認日本漁民有投標納租捕魚的權利。根據北庫頁島煤油協定，自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起，日本得在八個特定地方採掘煤油四十五年，另外十一處試掘十一年。此後數年中，日蘇關係雖說不上親密，但也並不十分惡劣。九一八事變使兩國關係發生極大的變化。東北四省既入日人之手，立即與蘇聯發生直接的衝突，傀儡國東北二面突入蘇聯境內，西面與外蒙毗連，最容易引起糾紛。而且根據日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則沿海州、北庫頁島、西伯利亞以及外蒙古都應成為他的版圖。是以雖有中東路的讓渡，亦不能消弭兩國的糾紛。同時，日帝國主義為要見好於列強，得以盡量的宰割中國，乃以反赤的前鋒自任，並經常製造邊境糾紛以作為進攻中國的烟幕。蘇聯數年來亦努力於東方的經濟建設，加強遠東的軍備，且因西方取得法國的支持，加入國聯以後，對日態度亦轉強硬。因此，數年來兩國關係，特別表現出十分緊張。

如果把兩個社會的根本對立，及日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的野心撇開，則日蘇兩國所爭執的

問題，有以下幾種，第一是北庫頁島的煤油問題。我們知道在現代海空軍及軍事工業中，煤油佔着絕端重要的地位。日本正是缺乏煤油礦的國家。北庫頁島每年產油量，據說差不多佔日本全部產油量之半。現在蘇聯在那裏創設了大規模的煤油採掘廠，而日本在該地十一個地方的採掘權又行將滿期，這使日本大起恐慌，會迭次要求永久的與獨佔的採掘權，自爲蘇聯所不能接受。

其次是北洋漁業問題，日本在該地的漁業原來是以八比二對蘇聯佔優勢的，但到一九三年頃，日蘇漁業即行平分秋色了。蘇聯組織的是國營大規模漁業公司，實行競賣制度，使日本漁業處在極不利的地位。第三是國境糾紛問題，蘇滿邊境從圖門江口直至滿洲里的西面，長凡四千三百餘公里。若再加上滿蒙的邊界線，其總長實達五千公里。如果是邦交親睦的國家，尙無問題。但以有野心的日本對強大的蘇聯，本極容易發生糾紛。加之日本爲要表示其爲反赤的健將，爲要散佈侵略中國的烟幕，乃繼續不斷的製造邊境衝突。

以上三點是近來日蘇爭執的具體事件，數年來蘇聯在西方有和平外交的勝利，在東方有強固的防禦工事，對日本固沒有表示畏縮態度，但始終在企求和平。幾次對日提議訂立互不侵犯條

約，提議組織混合委員會以解決邊境問題，均遭日本的拒絕。對煤油與漁業問題亦允重開談判，假如日本不過事苛求，並不是沒有妥協的可能。最近日德反共同盟的成立，顯然極巨大的影響日蘇關係，是以行將簽字的漁業協定亦告擋淺，兩國外交的前途，很難有光明的希望。

第四節 對美國的外交政策

蘇聯與美國的關係，在開始時即與對其他列強不同。當蘇維埃政府成立之始，美政府並未表現出極端的仇視，而是表現自由主義的態度。因為美蘇遠隔重洋，布爾塞維克的毒焰不易傳染過去；美國雖然也參加大戰，但因此而得到的是富庶與繁榮，而不像其他國家那樣支離破碎，因之也不至對布爾塞維克有一夕數驚之感。威爾遜所倡導的自由主義，也不無一部分的影響；最後，對俄干涉中，其東方強敵日本勢力必大形擴張，這是美國所不願意的。這許多原因，構成美國的較溫和態度。

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威爾遜向國會提出聲明書說：「這裏有一種以確定此項（軍事的）

目的和原則相號召的呼聲，這呼聲在我聽來比較目前充塞於和平空氣中的呼聲還要動人，還要懇切。這就是俄國人民的呼聲。俄國人民在德國橫蠻無情的暴力之前，受盡了流離失所欲訴無從的空前浩劫，因為德國從來不曉得什麼是寬假，什麼是憐憫的。他們的力量似乎在最後掙扎中，然而他們的精神從不會屈服的，在原則上和行動上也是不會讓步的。」

威爾遜根據布勒斯特蘇維埃代表的要求，繼續在聲明書中說：「他們關於爲正義和人道所能容納的意見，說得非常懇切，非常透澈，非常善意又非常同情於全人類的幸福。我認爲這種意見必能引起一般愛好人類的人們的狂喜……不論現有的俄國領袖是否信任我們，而我們將以全副的精神，願意並希望能求得使我們有援助俄國人民的可能，並實現他們的熱烈希望——自由與和平。」

威爾遜對蘇維埃政府對和平的要求，提出有名的十三條款內中第六條是專爲蘇俄而發的：「撤退協約國駐俄的軍隊，解決一切關於俄國的問題，足以保障全世界各國的最完善最自由的協作，達到獨立決定本國政治發展和民族政策的目的，同時亦足以使俄國容納於自由民族的隊

伍中，任其選擇合於本國國情的國家形式，並與牠以所探求所期望的援助。」威爾遜的這種態度，頗得到當時俄國人們的歡迎。自然，美國對蘇維埃政府的善意，不是十分真實的。她會同其他列強一樣的出兵干涉。不過這未必是她的本意，她『希望協約國不要急於武裝干涉，希望俄國人民能從夢中覺醒過來。』她以為「推翻布爾塞維克統治的最好辦法，是從內部發動。」照美國一向的外交政策看來，這是頗合邏輯的。

在干涉的過程中，美國因與日本衝突，事實上給與布爾塞維克以許多便利。日本的企圖是永久的獨佔西伯利亞，而美國則要開放那裏的門戶，且特別注意於取得中東路與西伯利亞鐵路的管理權。美軍為要打擊日本勢力的膨脹，竟給赤軍以許多方便。是以當時日方宣傳「美人是很明顯的布爾塞維克的同情者。」美軍首領格萊夫（Greif）竟與赤色游擊隊勾結，以中立地帶供赤軍作修養生息的基礎。後來一切干涉都失敗，美則首先同意撤兵，這也表現美國政策的特殊處。

然而，空洞的同情，終不能掩避兩個世界的根本對立。蘇聯並不曾如帝國主義者所希望的從內部崩潰，反而是日益生長與壯大起來，因此，美國自由主義的態度也就日益消蝕殆盡。是以其他

國家都先後承認蘇聯，而美國則獨樹一幟的久不與以承認。自然，別的國家有其不得不承認的苦衷，美國亦自有其久不承認的特殊原因。首先，美國的工業發展，毫不依賴俄國市場，在拉丁、美洲、中國與歐洲，美國正有不少的投資地與市場。其次，美國農業恐慌實阻礙兩國有復交的可能，因為美國在世界市場上久已感覺到俄國麵包競爭之大患。第三，蘇維埃政府取消克倫斯基（Krensky）政府對美的債務並沒收美人的財產，給與美國人民以巨大的損失，並破壞私有財產權的神聖，這為美國所不能忍受。最後，美國勞動者的政治意識非常落後，不像西歐勞動者那樣，可以影響其自國政府的對蘇政策。因此，美國所以久不承認蘇聯。

九一八事變以後，遠東局勢發生空前的變化。日本佔領東北四省，且繼續向整個中國本部進攻，東亞的均勢眼見將被日本的獨佔所代替。這不僅影響蘇聯在遠東的地位，且威脅着美國在遠東的利益。這使十餘年來尚未發生外交關係的兩個大國，不能不作深長的考慮。尤其，一向堅持不承認主義的美國，不能不改變態度。同時，蘇聯第一屆五年計劃既經完成，第二屆五年計劃正在進行中，牠需要大量的機器與資本，而在大恐慌中的美國卻正苦於資本與機器的沒有銷路。當李維

諾夫在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中宣稱蘇聯每年將向國外購買十萬萬金元的貨物時，不獨英國保守黨有些動容，即一向仇視蘇聯的紐約華爾街的人們也聯想到復交後的生意經。是以使美、俄復交成為可能的，由於下列三種原因：（一）美國需要俄國的市場；（二）蘇聯需要美國的貸款；（三）兩國需要維持遠東的利益與均勢。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羅斯福總統給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加里寧（Kallenin）一封公函，要求兩國舉行復交談判。加里寧立刻作一覆函，中說：『閣下在尊函中正確的指示出了反常的局勢，這一局勢不僅不利於兩國的利益，而且不利於一般的國際情勢。因為牠能增加不安的因素，能阻撓締結世界和平的行程，兼能激發破壞和平的力量。』從這裏，我們亦能看出促成美、俄復交的主要原因。

同年十一月十八日，美、蘇復交的協定正式成立。這一成就，在蘇聯對外關係上自有不小的影響。是以『真理報』當時很躊躇滿志的說：『美國放棄牠的傳統的不承認政策，這是蘇聯實力與重要性的最大表現……蘇聯何以成爲世界最大的因素，其唯一的說明，是在蘇聯具有經濟的政

治的軍事的實力……蘇聯在政治上與經濟上已成爲最大的強國，即使最大的資本主義強國對她也不得不加以考慮。」

第五節 在對外政策上反映出的政治動態

在上四節中，將蘇聯的對外關係，已給與一簡略的敍述。這裏，我們將從其對外政策中來考察其政治的動態。我們知道，外交不過是內政的延長，要能十分明瞭其對外政策的變動，還得瞭解其國內的大政方針。

首先，成爲蘇聯對外政策中之主要特徵的，是其自始至終所標榜的和平政策。蘇維埃政府剛成立，即呼求不割地不賠款的普遍和平。更因德帝國主義的壓迫，乃進而承受屈辱條件以取得和平。對其他曾經武力干涉其內政的列強，亦竭盡力量以企求和平關係的建立。最近數年來，其和平政策的努力與成就，更爲一般人所熟知的事實。

在這一和平政策中，我們可以看出與其內政的緊密關聯，並且此和平政策實施時的程度與

技術，亦隨着其內政而發生過若干次的變化。在蘇維埃政府誕生後的最初二三年中，剛承大戰的破壞之後，再加以殘酷的內戰與列強的干涉，這時的國計民生，實困苦萬狀，她為鞏固其既得政權，不得不以極大的代價以取得喘息的和平時間。在取得國際承認的前後數年中，政權雖已經鞏固，但其經濟地位還是異常艱窘。為了恢復其最低限度的生產，使達到戰前的水平，不能不企求和平。這正是新經濟政策實行的時間，各帝國主義者看來，亦不若前一時期實行軍事共產主義之可怕，因而較易與之接近。

第一屆五年計劃開始於一九二八年。這一計劃的創立，是建築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之上。蘇聯企圖在短期間內追趕上歐、美列強，在經濟上與軍事上成為現代化的國家。同時並通過五年計劃，來摧毀在新經濟政策中所生長起來的新興資產者與富農。正是因為集中力量於建設與從事國內的爭鬪（反新興資產者與富農），對外需有進一步的和平。所以這一時期的外交活動，其主要目的有二：第一是避免並防止戰爭的爆發；第二是建立蘇聯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之緊密的經濟關係。「與資本主義列強和平共處」，這一口號是與『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政

策相因而產生的。而執行這一政策的李維諾夫也正是從這時起漸露頭角而代替了齊采林(Chicherin)。

第一五年計劃完成，第二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蘇聯國力本已大增，國防亦較前為鞏固。似乎對和平的希求不像以前那樣迫切，但事實上並不如此。社會主義的建設，永久需要和平，而戰爭將壞毀蘇聯的一切建設。去年夏天，蘇聯外交代言人拉狄克(Radek)曾說：『我們現在更以為在蘇聯以內建設社會主義問題，是可以切實解決的，而且這一問題的大部分現在已經解決了。蘇聯的和平政策，便是以這種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為依歸。』雖然日、德從東西兩方面來壓迫蘇聯，她的國防實力也在不斷的發展與充實，然而她還是用盡一切可能的方法來換取和平。

說到這裏，人們可以設想，蘇聯將來是否有一天要放棄和平政策，我們看來，大概是不會的。因為蘇聯的立國精神與其他國家不同，他根本消滅了資本主義的剝削與壓迫，因之，不需要對外的戰爭。現代戰爭之所以發生，是由於獨佔資本要求國外市場原料與投資地，而蘇聯則根本沒有這樣的戰爭動力存在，所以將永久的需要和平。

蘇聯對外關係的第二特徵，是一般所說的雙重外交。這與他的立國精神也有密切的關係。她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其目的是消滅各種各色的壓迫者與剝削者。因此，她對各國政府雖竭力保持和平關係，然對各國人民則必然給與極大的精神上的刺激與興奮。她常隨着自身的需要，來直接間接發動國外被壓迫者革命運動以作自身的應援。

在第一時期，蘇維埃政權剛成立，基礎未固，國內外的敵人從各方面襲擊。這時候，蘇聯不顧一切的盡力資助西歐的革命運動，以減弱敵人的勢力。在第二時期，英帝國主義者指揮邊境各國加紧的進行反蘇運動，給她以很大的威脅。所以蘇聯亦努力資助東方弱小民族，特別是中國的反帝即反英運動。五年建設計劃開始以來，她需要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要避免帝國主義對她的直接壓迫，其世界革命的策略亦不像以前那樣的急進。自斯大林戰勝托洛斯基以後，這一政策的應用即逐漸顯明，到目前也還在繼續中。

不過，所謂雙重外交的對外政策，蘇聯大概是永不會放棄的，這將是其和平外交的永久伴隨物。從蘇聯看來，若沒有後者，則其和平外交將是無意義的向資本主義投降。而且蘇聯自認其存在

與強大，祇不過是世界革命的開端，其前途是與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者革命，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獨立，不可分離的。她執行這一策略時，固可因其本身的政治情狀而有緩急之不同，但決不會根本放棄。

第三，蘇聯對外政策的成功，一方固然是由於其國力的日漸增強，另方面也由於其獨特的社會制度。一切自然富源都歸國有，對外貿易由國家經營，這使她能運用其經濟的力量，以達到外交的目的。在新經濟政策之下，對內允許小所有者與富農的活動，對外可以出租企業與礦產與國外資本家經營，這是其對外關係轉好的許多重要原因之一。她用此作鈎餌來引誘列強就範。對外貿易操在國家手中，可以用巨量的輸出輸入，作為對外關係之討價還價的工具。特別近數年來，各列強都陷入大恐慌的痛苦而不能自拔，於是蘇聯這個廣大的市場更顯得重要。德、蘇從前之所以長久維持親善的關係，英國之所以屢次積極反蘇而終不得不與之媾和修好，美國之所以不得不放棄其不承認政策。這一切，固然有其他的原因，但蘇聯之能以對外貿易作為外交的工具，亦有莫大的助力。雖然在別的國家，其對外貿易政策也能影響其外交關係，究不若蘇聯那樣能運用自如。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蘇聯外交政策的根本方針及其每一波動，均與其建國的基本精神，其社會與經濟制度的特徵，其國力的強弱與國內政治的變動有直接的聯繫。

第六章 從軍事與國防所見的政治動態

第一節 赤軍的組織

因為蘇聯具有獨特的社會制度，其軍隊的組織，在某方面說，亦與其它國家的不同。就保衛國家的安全而言，蘇聯軍隊與其它國家的沒有差異。但除此之外，在共產黨人看來，赤軍還負有更重大的使命，即援助世界勤勞大眾的鬪爭，並構成世界革命之強有力的支柱。自然，這祇是遼遠的理想而已。共產黨人以世界革命為其最大目的，他們在軍隊中亦經常作這樣的宣傳。在赤軍野外教練綱領中，其第一項即有這樣的規定：『赤軍是世界唯一的最初的普羅利塔利亞國家的武器，遏止對於敵視社會主義及社會革命的一切企圖，而防衛蘇聯的獨立；且是為了擁護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及勞動大眾的和平勞作與自由而編成的。』赤軍一方面擔任蘇聯的防衛，同時以其存在的事

實援助世界被壓迫的勞動大眾自由解放的鬪爭。』這裏可以看出赤軍的第一特點。

其它國家的軍隊，固然也有相當的政治教育。但蘇聯軍隊特別着重於此。我們知道，蘇聯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軍隊的政治教育，完全由共產黨統制施行。凡共產黨的政策，政治理想，都成爲軍隊的基礎訓練。是以蘇聯軍隊的思想極爲統一，團結異常堅固，這是爲其它國家所不及的。不僅如此，即士兵與軍官的成分，亦表現共產黨的強大支配力。去年第七屆蘇維埃大會時，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杜加契夫斯基 (Tukhachevsky) 曾說：『在我們赤軍裏，黨員及其青年團員佔百分之四九·三的數目，軍官中已達到百分之六八·三的比率。更就軍官中各種階級來看，聯隊長階級黨員佔百分之七二，師團長階級佔百分之九〇，軍團長則爲百分之百。』這樣的軍隊成分，充份表現共產黨的獨裁力量。這可以稱爲赤軍的第二特點。

蘇聯一方面採取國民皆兵的制度，同時又施行勞動大眾的軍隊制。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五日，創設紅軍的第一道訓令中即說：『過去的軍隊是資產階級用以壓迫勞動階級的工具。在政權轉移到勞動者和被壓迫者手中的過程中，有創立一種新的軍隊以保衛蘇維埃政權，以爲建立全民

衆武裝以代替常備軍的基礎之必要。這種新軍隊是歐洲正在發展中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石。紅軍是由勞動階級中最可靠和受組織訓練最久的分子組織而成的。蘇聯兵役法裏面又規定：「蘇聯全體公民有擁護蘇聯國家的義務，唯武裝的防衛祇限於勞動者。對於非勞動分子，則課以防衛上其他勤務。」

十餘年來，在蘇聯，執干戈以衛祖國，祇是勞動者之可敬的義務。其他非勞動的人們，則不能參加。但最近通過的新憲法，已把這一限制刪除。然而，這並不是原則上有所變更，而是基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非勞動份子已日見減少或甚至消滅，事實上可以不需要那一條限制，而不至發生危險。這是赤軍的第三個特點。

資本主義各國的軍隊的組成，無論是由於募兵制，或者由於徵兵制，終帶有幾分強迫的性質。兵士與長官的利益，軍隊與一般社會的利益，常常彼此不相調和。在蘇聯則不同，其軍隊的職責是保衛勞動者的政權，保衛勞動者的利益；而軍官與士兵本身就是勞動者。軍隊與社會乃至國家，是一整個的調和的統一體。軍隊內部在物質上與精神上完全平等，為同一的目標而奮鬥。社會經濟

愈發展，政治愈清明，則軍隊物質精神生活亦隨之提高。而且，兵士的生活，較之一般勞動者更為優越而更有保障。如因作戰而殘廢，則其本人及其妻兒均獲得生活的保障。是以在蘇聯，兵士不僅不以服役或作戰為苦，且視之為無上光榮的事業。這不僅是賴於共產黨的政治教育使然，其獨特的社會制度實為其基本原因。這是赤軍的第四個特點。

明白了蘇聯軍隊的如上各種特徵之後，再來考察其兵役制度及赤軍的組織。蘇聯是採取徹底的國民皆兵制，國民服兵役年限為自十九歲起至四十歲止。由十九歲到二十歲，為徵集前的時期，受兩個月的軍事教育。由二十一歲至二十五歲，為現役時期，實受徵兵訓練。由二十六歲至四十歲，為預備役時期。此後則脫除兵籍。

主要的國防力量，由現役公民構成。凡男子達到二十一歲的徵兵年齡時，即受徵兵檢查。根據其體格、教育程度、政治意識等各種條件，來分別使之服役。現役中分為正規軍、民軍、軍事生產勤務及隊外教育部隊四種。達到現役年齡的公民，按照其本身的條件，被派到四種部隊中之一去服役。正規軍是抽選最優秀的分子組成的。主要的是工廠工人、集體農場的農民、貧農、共產黨員及

青年團員。他們常駐軍營，受着訓練，爲國防的基本力量。根據國防的見地，配置到各要害的國境方面，這與其他各國的正規軍沒有多少差別。

民軍是蘇聯赤軍的獨特組織之一，由「基幹部」與「交代部」兩部所組成。基幹部有與正規軍同樣的規模，質的方面亦大體相同。五年的現役期間中，有十八個月或十一個月爲召集期，構成戰時的編制，受着完全的野營訓練。此外，並於每年冬季有一二週的短期召集，在退休期內，各村落中還有每六日一次的召集，由幹部巡迴的教導。交代部的召集期間，沒有基幹部那樣的長，但其優點是在以居住地爲基礎而編成的，在召集期間，也是戰時編配，受完全的野營訓練。

這種民軍制，在蘇聯兵制上，是極爲重要的，用較少的消耗來維持強大的軍力，平時能保持堅固的地方團結，戰時的動員亦極見迅速。特別是集體農場的組織，對於民軍的訓練有特殊的便利，使之能發生近於正規軍的效能。

除正規軍與民軍而外，有隊外現役軍，即是未編入正規軍與民軍的現役公民，編入軍事生產勤勞部隊或隊外教育部隊。所謂軍事生產勤勞，是在各自的生產經營內的服役，期間定爲二年，受

國防委員會所規定的軍事教育。隊外教育部隊，於五年現役期間內有六個月的召集，受軍事訓練。

全蘇聯的軍事領導機關，是人民委員會中的軍事委員會。全國赤軍以三軍爲一單位，分爲若干集團軍，由委員會管轄。集團軍最高長官由軍事委員會委員充任。集團軍之下有軍，軍之下爲師，三師爲一軍，一師三團，一團三營，一營三連，一連四排，一排四班，每班平時九人或十人，作戰時增至十四人，每連增加一排。軍事方面，每一單位有一負責指揮的人，如軍長、師長、團長、營長、排長與班長，另設有副軍長……副營長等。軍事系統以外，尚有軍事的政治組織，即各級黨代表及政治部主任各一人，營無黨代表，僅有一名政治指導員。黨代表與政治工作人員在軍隊中有其特殊的作用，軍隊的政治教育，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等，都由他們執行。軍事長官於傳達上級命令或發出命令之時，如沒有黨代表的署名，不能發生效力。

此外，蘇聯原有一種祕密的軍事組織，名「葛貝烏」，爲一種祕密的政治警察。其職務爲偵查與監視各處人民、黨員、官吏等的行動及關於政治上的表現。唯其組織既爲祕密，故其規模的大小與內容，均不爲一般人所知道。這一個組織近來名義上已是取消了，但實際上許還是繼續存在。

第二節 軍事教育的普遍

除軍隊的組織而外，蘇聯國防運動的具體設施，包括的範圍極為廣泛。其中比較重要的，當推學校學生及一般青年人人民的軍事訓練，甚至從幼稚園與小學起，即開始施行軍事教育。幼稚園的兒童玩具，許多為飛機、戰車、槍砲等物，兒童也學着室內射擊。幼稚園的教師也預備有充分的軍事知識，且時受專門家的檢驗。

凡學校、研究所、工廠、俱樂部、集體農場等公衆聚集的地方，常有學習軍事的設備，特別是著重於航空瓦斯室的設備。內面備有飛機的模型，各種瓦斯的標本，防毒服裝及關於瓦斯預防法的書籍等，以增進民衆的軍事知識。在蘇聯，人們深知未來戰爭的範圍決不限於戰線以內，即遠在戰線後方的都市及鐵路等等，亦將受敵軍的炸彈及瓦斯等物的襲擊。是以在蘇聯，不僅是正式軍隊，即是一般國民亦甚行着防備敵空襲擊的訓練。例如防毒面具，兵士固然人人具備，即一般國民也大都購置，其價格特別低廉，大約當一雙皮鞋價目之四分之一。

在許多國家內，電影與戲劇，多半是有閒有錢的人們的娛樂品。在蘇聯，則電影與戲劇主要是社會教育的工具，是宣傳國防思想的利器。蘇聯國內所演的影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為國立攝影所的出品，其題材以宣傳共產主義與國防思想為中心。在戲劇方面也是這樣，我們試舉一宣傳國防思想的劇本於下，以作例證：

『在蘇聯國境的某工廠，青年工人羣衆開始受軍事訓練。但其中有一個青年，祇熱心於音樂，對軍事教育認為多事。有一次，國境對方所住的白俄，突向這工場襲擊，工廠工人羣起執槍應戰。這個熱心音樂而輕視軍事教育的青年，不知道槍的使用方法，不懂避彈的門檻，首先負傷了。其他許多工人則因受過軍事教育，所以能利用適當地勢與防禦物，終於打退了襲擊的敵人。』

像這一類的戲劇與影片，在蘇聯最為流行。

這裏所說的還是一般的軍事教育，此外更有具備組織形態的，『如國防航空化學協會』、『共產主義青年團』及學校內的軍事訓練等，則更為重要。

『國防航空化學協會』雖是一個社會團體，但在蘇聯軍事上負有極重大的使命。因為有了

這個團體，蘇聯獲得使全體民衆直接參加戰爭的途徑。牠使蘇聯對於武力的準備更有廣大的把握，使空軍得到猛進的機會。使民衆的掌握軍事的技術。因此，牠可以使廣大的民衆成為紅軍的後備軍。其主要目的是要在工廠、學校、農場及一般公共組織中，建立軍事的根基。這個協會的小組織，在各處向人民灌輸軍事方面的知識，廣播軍事書籍雜誌及報章等等。至於協會會員，則受了較完全的軍事訓練。

這方面的軍事教育所採用的基本手段是分為三級。第一級是為全無軍事知識的人們而設，一年內有一百二十小時的軍事教育時間。第二級為修完第一級的人們而設，其教育時間亦為一百二十小時。第二級的教育修完後，還有第三級。

另外還沒有軍事知識研究會及軍事講習所等組織，學習步、騎、砲、機關槍、通信、戰車等較專門的教育。這類研究會或講習會的舉行，每次以十五人或六人為一教育單位，多為室內或操場教練。至於野外教練，則是倣效軍隊的組織，編成分、小、中各隊來舉行。

國防航空化學協會的會員，四年前即有十萬小組，一千一百萬人。現在人數至少已有三千人。

共產主義青年團是青年共產黨員的集團，其作用異常重大。假如國防航空化學協會可以算爲赤軍後備軍，則青年團是聯絡青年軍官與士兵的骨骼。紅軍中最年輕的爲二十一歲，青年團則專門吸收十五歲至二十歲的青年。先有了組織訓練以後，再加入紅軍，自然能收事半功倍之效。而且，青年未入團之前，普通已受過一次訓練，即自七歲以後加入兒童團。這時已受了統一的思想訓練，社會主義的思想已深入他們骨髓。再經過青年團的陶鑄，更成爲有思想有熱血的青年，自可練成極優良的軍人。近年來，青年團團員，特別在海空軍方面有偉大的建樹，在鐵甲車軍方面也成爲中心力量。依軍事當局的計劃，青年團員將成爲各個特種部隊的中心領袖和紅軍中的中心勢力。現在每四名紅軍中有一名青年團員，五名青年軍官中有一名團員。

在各級學校中，軍事訓練亦爲重要的部門。蘇聯初級勞動學校是採前四後三的七年制，在平時已充分帶有軍事教育的色彩，到第七學年，則以軍事訓練爲必修科目。這一年，軍事教育的實施大體如下：

第一，講授戰爭的威脅，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的武力干涉，蘇聯的國防問題等，共八小時。第二，

蘇聯赤軍的概況，十二小時。第三，防空知識及演習，二十四小時。第四，射擊教育，十小時。總共有五十四小時。

在中等學校，軍事教育也是必修課目，而且把她作為入營前準備教育的一部分看待。至於專門學校及大學，則所受軍事訓練的時間更多，且有三個月或四個月的野營訓練。學生在畢業時，得受中級幹部（尉官級）的試驗，凡試驗合格的即成為預備中級幹部。

對於婦女的軍事教育，蘇聯也沒有忽視。雖然法律並不強制她們擔任軍事服役，但社會輿論與教育都鼓勵她們能夠與男子一樣的執干戈以捍衛國家。是以在蘇聯，未成年的女子與男子受同樣的軍事訓練。此外，並有特別適合於婦女的特殊軍事訓練。

第三節 海陸空軍的實力

上面兩節所述，是蘇聯軍役制度，廣泛的國防實力及一般國民軍事化的概略。現在來考察其狹義的國防實力，即陸海空軍的實力。

蘇聯於國內戰爭結束時，劃全國為九個軍區。「九一八」以後，因為遠東局勢的緊張，將東部軍區加以變更。即將西比利亞軍區東部劃為遠東特別軍區，配置重兵以捍衛邊疆；在西比利亞以西成立了烏拉爾軍區，藉以保衛重工業的基地；更將後貝加爾成立為獨立軍區。這是在遠東方面的設施。在西境，因為德波的威脅，將原有烏克蘭軍區劃分為基輔軍區與哈爾可夫軍區。於是全國由九軍區增至十三軍區，即莫斯科、白俄羅斯、列寧格勒、哈爾可夫、基輔、窩爾加、北高加索、後高加索、中亞細亞、烏拉爾、西部西比利亞、貝加爾及遠東特別軍。

陸軍兵力，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原為步兵二十一軍，轄步兵師七十二，騎兵軍四，轄騎兵師十七，其約六十萬人。自一九三四年始即開始擴大軍隊的數目，到目前已有一百六十萬人。計正規兵（包括民兵基幹部）六十九萬人，民兵部隊交代部六十六萬人，特別軍隊二十五萬人。以其編制言，則正規步兵師團三十五個，民兵步兵師團五十個，正規騎兵師團十五個，民兵騎兵師團五個。

不僅是陸軍的數量龐大，其機械化與化學戰的配備，亦極完全。步兵所擁有的武器，計有輕機關槍二萬挺，戰車四千餘部。

近年來蘇聯砲兵有長足的進步，而武器的增加尤為迅速，總計有輕砲一百團，重砲二十五團。此外尚有各種口徑的補充砲。砲兵後備隊多編入砲兵旅，平時屬軍區司令官指揮。此外，每一軍團有砲兵一團，由三營組織而成，每營有一五六吋釐重砲兩中隊，一〇七吋釐野戰砲一中隊。

每一軍區與每一軍團有若干高射砲團與多數高射砲營。每一步兵師有砲兵一團，一騎兵師有由六中隊所組成之砲兵一團，每一騎兵軍團有一直屬砲兵大隊。

在機械化方面，赤軍約有工兵二十三營，八十五獨立連，二十一中隊。造橋工兵十一營。此外，一軍團有築路工兵一營，總指揮部所屬工程兵有二十營至三十營，工程兵中有鐵路兵約二十團。又有交通兵十四團，三十八獨立交通營。

對於化學戰爭，蘇聯特別注意。在十餘年前，蘇聯即開始設置化學戰部，後來又設置化學戰爭特別研究委員會。一方面努力於研究和普及，另方面更組織常設化學部隊，化學聯隊與獨立大隊。此外更在一般軍隊中添設化學部隊，努力於化學戰的訓練。目前計有製造瓦斯工廠十七所，瓦斯兵三團，十一獨立營與十二獨立連。至於一般的化學戰訓練，則有上文所述的國防航空化學協會。

專司其事。

蘇聯海軍原極落後，現則因其國勢的加強與世界風雲的緊急，亦有相當的建設。目前蘇聯分配於其國防海岸線的兵力大體如下。第一，在波羅的海方面，有二萬五千噸級的戰艦四隻、潛水艦五十隻、航空母艦、巡洋艦、驅逐艦等大小共約百隻。

在過去帝俄時代，對黑海艦隊是很重視的，因為那時帝俄的目標，是企圖掌握韃靼尼爾海峽，以控制土耳其與巴爾幹。革命後，蘇聯一反從前的侵略政策，與土耳其保持友善關係。是以在黑海方面並沒有巨大的海軍配備，共有戰艦一艘，航空母艦巡洋艦、驅逐艦等共二十艘，潛水艦十五隻。

「九一八」事變以前，蘇聯在遠東的海軍設備，異常薄弱。事變後，則以極大的注意力來加強其海防。現計有航空母艦一，驅逐艦二，潛水艦二十五，水雷艇二，機械水雷敷設艦十一，礮艦十二。這些艦艇的武裝設備都很堅實，且有很多的魚形水雷與機械水雷，沿海岸有完備的海軍港埠設備，且有新的海軍要塞在建築中。

近年來，蘇聯更應用現代科學為武器，以極大的犧牲來致力於北冰洋航路的開拓，企圖使遠

東從這裏與歐洲結聯起來，且將以白海爲中心而成立一新海軍區。

蘇聯海軍的進步，自然遠不及陸軍與空軍。但蘇聯當局仍是在注意海軍的強化與近代化。在青年中間，也有這樣的宣傳。且設置海軍兵團，專從事於海軍兵士的教育與訓練。艦艇的大量建造，也在陸續的策畫與實施中。在全蘇聯第七次大會中，杜加傑夫斯基的演說中曾指明：『若以上次第六回大會當時的勢力爲百分之一百，則現在的數字，潛水艦爲百分之五百三十五；沿海防裝艦艇爲百分之二千一百；水雷艇爲百分之四十七……』由此可以看出蘇聯海軍勢力的擴張。

在現代戰爭中，空軍佔有絕頂的重要，這是盡人皆知的。若干年來，蘇聯特別注意於此。當一九二二年時，蘇聯空軍爲二十中隊，一九二五年爲八十中隊，二八年一百中隊，目前則增至三百五十中隊，擁有四千架飛機。同時還配備有高射砲團，獨立聯隊，獨立大隊及機關槍隊等。特別是戰鬥爆破隊的增加，氣球汽艇的添置，均值得注意。法國航空部長谷特（Pierre Cot）最近在法國衆議院說明法國空軍現狀時，曾說：『據予所知，世界各國空軍，其機械較之吾國爲優者，僅有蘇聯一國。』（見本年二月二日哈瓦斯電。）照這個話看，蘇聯空軍之優良，可說是世界之巨擘了。

這還僅是就軍用航空的實力而言，至於民用航空亦極為發達，這對於空軍有極大的幫助。自一九三三年起，非軍事航空中央統轄機關，改稱為非軍事航軍本部，直屬於蘇聯人民委員會，其最高負責人為赤軍最高幹部人物，我們很可以把非軍事航空作為空軍的別動隊看待。

民用航空機，現在約達到一千架以上。僅就一九三四—三五年的預算數字看，民用航空項下達二億三千萬盧布之巨。航路的佈置，是主要都市間的聯絡，邊境地帶與西伯利亞的航路建設。一九三五年度，航空路延長到七萬七千基羅米突，旅客輸送約一二二、〇〇〇人，郵件輸送達六千六百噸。

上述的國防航空化學協會，在這裏具有特殊的作用。近來在蘇聯特別流行航空技術的實習和訓練，不斷的舉行降落傘與無發動式飛機等航空競賽，都可看出蘇聯空軍的潛勢力。

第四節 東西境的國防

僅是普遍的軍事教育的設施，與龐大的軍力。這還不能表示蘇聯國防能力的全部。這裏，我們

應來考察一下蘇聯的國防工業及其東西國境的實際國防設備。

我們知道，第一、第二兩次五年計劃，主要的是國防計劃。在第一次五年計劃實施時，共產黨要人們即是主張國家經濟建設的實施方案，須以國防的基礎為主，應根據國防的見地，來確定工業的發展及軍事化學工業的實施。是以當時人民軍事委員會主席伏洛希諾夫（Vorochilov）說：

『離開國防，便沒有五年計劃存在的意義。』是以『五年計劃應該從對預想敵國的聯合勢力，在獲得勝利上所必要的國防組織這一點出發。』大家都知道，第一次五年計劃是偏重於重工業的，日常必需品的生產並不會受到同等的注意，甚至頗有缺乏之感。這裏的原因就是為的充實國防，因為沒有重工業，是不能談到國防的。

第二次五年計劃裏，仍然沒有輕視國防的重要。此計劃的提綱中，即顯明的說，國防能力須有更進一步的鞏固，並特別指明應注重於化學工業的發展，保持機器製造業在工業中的領導作用，消滅鋼鐵工業的落後性，提高冶金工業的生產，發展各地的石油事業。此外，還指明應改善鐵路運輸的落後，增加新的鐵路線。這一切都與蘇聯有密切的關聯，必須有充分的發展纔能保障物質的

自足與鞏固國防。

冶金、鋼鐵與機器製造等部門，原為工業發展的基礎，同時也是國防的基礎，因為一切槍砲戰車軍艦等的製造都基於此種工業。在帝俄時代，這些部門的工業均異常落後。一九一三年銑鐵與鋼鐵的生產，各僅四百餘萬噸。經過世界大戰與內戰的破壞，直到一九二九年，蘇聯冶金工業纔恢復到戰前的水平。而礮火、飛機、戰車、化學裝備等凡為近代軍所不可缺少的設備，仍是非常貧乏。經過兩次五年計劃之後，情形完全不同了。在一九三五年，銑鐵與鋼鐵的生產，各達一千二百五十萬噸，屑鐵九百四十萬噸，每部門均較從前增加三倍之多。

機器製造業以一九三四年為最盛，以粗金屬工業而言，該年開始工作的，有克利伏羅斯基鐵廠；在五金工業方面，有欽監茨基製鉛廠，奧強尼啓才電氣製鋅廠，烏法來斯基製鎳廠，德涅普羅夫斯基製鉛聯合廠，以及薩拉爾的鉛鋅礦坑等。基於這些金屬工業的發展，蘇聯機器製造業有長足的進步。目前軍隊中的一切近代化的新式武器，蘇聯均能自給而不外求。

在國防工業中佔重要地位的石油開採，蘇聯亦有驚人的成績。計石油鑿井成績，在一九三二

年爲七四三千米，一九三三年爲八三八千米，一九三四年爲一、二四〇千米，一九三五年則增至一、六〇〇千米。三年之中，增加兩倍以上。至於化學工業，也在獨立的發展着。

此外，如飛機製造工業，在蘇聯是最新進而成績最優良的軍事工業。本來在初時，蘇聯僅有木造機，繼則進爲木造與金屬混合機，其次進爲全金屬機，現在則爲全鋼機了。目前蘇聯一切軍用民用飛機，均爲蘇聯科學技術用自己材料所製成。

這一切，是蘇聯強力國防的基礎。有了堅強的國防工業，龐大的海陸空軍方有成立的可能，方有發生巨大效力的可能。

明白了蘇聯國防工業的大體輪廓以後，再來考察其東西境的具體國防設施。蘇聯的領土固異常廣大，但其緊要的邊防卻爲東西兩面。近數年來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與軍部指揮下的日本，都是野心勃勃，時刻想成爲反蘇十字軍的英雄。希特勒及其黨徒們屢次公開宣言要殖民於蘇聯境內，要奪取烏克蘭與烏拉爾等區。日本則數年來從不曾停止的製造邊境糾紛，作爲進攻的口實。近且東西兩大侵略國家締結意義重大的協定，完成其反蘇的大團結。

蘇聯的西境並不與德國毗連。在德蘇之間，隔着一個重要的國家波蘭，此外還有波羅的海三小國即立陶宛、拉特維亞與愛沙尼亞。德國若進攻蘇聯，必須經過這些國家，甚至北方的芬蘭與南方的羅馬尼亞，也將有德軍行動的可能。近來蘇聯已明白褐衫黨人的威脅，屢次提議締結東歐保安公約，其目的就是要遏制國社黨的冒險行爲。但因希特勒的破壞，終於沒有成功。

既不能由條約上獲得其西境的安全保障，蘇聯乃轉而強化自己的國防。在去年，將其西部邊境，重新劃爲五個軍區，配置巨大的防禦工程。五軍區的劃分大約如下：

(一)卡里利安區 (Carelian Zone) 在極北面接連芬蘭一帶，從斯辟茲堡海到拉多加湖爲止，全長七百五十哩。(二)波羅的海區 (Baltic Zone)，從芬蘭灣南下到特維那 (Dvina) 止，包括蘇聯和芬蘭南部及與愛沙尼亞、拉特維亞相連的邊境，全長三百四十哩。(三)白俄羅斯區 (White Russian Zone)，從特維那南下到濱立貝河 (Pripet R.) 的支流爲止，正在蘇聯西部邊境的中段，全長約一百五十哩。(四)烏克蘭區 (Ukrainian Zone)，也是蘇聯與烏克蘭接壤的一段，長約一百三十哩。(五)黑海區 (Black Sea)，是在極南面的一帶，沿着尼斯脫河，與羅

馬尼亞接壤的地方，全長約三百哩。

在這西部邊境一帶，蘇聯已完成極堅固的防禦工事。去年九月八日，日本同盟社發表一個華盛頓電訊說：「根據可靠的軍事消息，蘇聯防備德國的侵略，在西部邊境建築與法國「瑪奇諾陣線」一樣堅固的地下礮壘，這工程已經完全告竣了。」

除陸上防禦外，還有海上的防禦工程。德國海軍掌握着波羅的海的霸權，這給列寧格勒以極大的威脅。但蘇聯在這方面也有強固的佈置。第一是作為列寧格勒前衛的克隆斯塔得（Kronsstadt）海軍礮臺，位於列寧格勒港外三十哩的柯特林（Kotlin）島上，附近多是淺灘，北面船艦完全不能通行，南面裝有極堅固的礮臺。這是彼得大帝傳下給蘇聯的最重要的遺產，一向被稱為『蘇聯的直布羅陀』。第二是與列寧格勒成為犄角的潑斯可夫（Pskov）與配置在列寧格勒附近的無數礮臺，與空軍爆炸機的活動相呼應，使敵方的海軍不易得逞。

去年秋末，蘇聯在西部邊境，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舉行陸空軍大操演。有巨型爆炸機大隊出動，有高速度坦克車的表演，有種種機械化部隊參加，而最值得人們注意的是用大隊巨型飛機把

許多兵士連同機關槍坦克車運送到敵人後方，數分鐘內配置妥當，向敵人進攻。這次演習使各國參觀的武官與專家讚嘆稱羨，必然使國社黨的冒險不得不有多少顧忌。

我們再來看看東境的國防，蘇聯所謂的遠東，係指東部西比利亞而言，包括沿海州、阿穆爾州、伊爾庫次克州與雅庫次克共和國。這一廣大地面原極荒涼，人烟極少，離開歐俄中心區有數千至一萬公里之遙，文化極為落後，工農業均不發達，僅有一單軌的西比利亞鐵路，交通運輸亦甚不便。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蘇聯對日本一再採取退讓政策，乃實際情境的逼迫使然。但自那時起，蘇聯即加緊的鞏固其遠東的國防。現在，那裏的輕重工業農業乃至直接國防工事，與數年前迥不相同。先就重工業而言，在伊爾庫次克與布亞特蒙古區，都開始了龐大的建設計劃。煤鐵礦，大電站與冶金工廠等，都先後建立起來。到第二次五年計劃完成時，這裏將成為極大的綜合工業區。其次，在黑龍江下流有新建設的城市康沙摩爾斯克，是冶金造船、軍械與汽車等工業的中心。其他如伯力、海參威、北庫頁島等地，造船、採油、製油、製革、捕魚、飛機等工業均有大規模的發展。

西比利亞的運輸與交通，也有極大的進步。去年，西比利亞鐵路敷設雙軌成功，其運輸能力較

前增加五倍。同時，正在建築中的B A M鐵路，由貝加爾湖之西直達日本海北端的蘇維埃灣，長三千六百公里，亦將近完成。此外還有若干短距離鐵路也在建築中。

農業方面，現已完成集體化的工作。舊有的富農已被肅清或遷徙內地，代以受有充分政治教育的青年農民與退伍軍人。如此這又使遠東國防更加鞏固。

這是遠東方面的基本國防佈置，至於這方面的兵力則有如下的數目。第一，陸軍約二十七、八萬，內正規軍二十五萬，特別軍三萬。計步兵十餘師，騎兵二三師，戰車約千輛，裝甲汽車五百餘輛，邊界小要塞一千二百餘。第二，空軍約有飛機七百餘至八百架，其中包括有相當數目的重爆炸機，續航能力達二千幾百公里。此外如海軍的配備，上面已說過，這裏不贅。

第五節 政治上的國防總動員

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國家，用最大的努力從各方面取得和平，這自是有近若干年來的事實作證明。但另方面，她卻也從各方面來準備戰爭，從本章所述看來，這也是事實。她增加軍隊的數目，擴

充軍備，使全國公民甚至婦孺在內，都受軍事訓練，似乎要把一萬七千萬人民都練成戰士一樣。這種矛盾現象怎樣解釋呢？那要求之於蘇聯共產黨的政治思想。

據共產黨人看來，戰爭是現社會中不可避免的慘劇。且謂戰爭不是別的，祇不過是繼續推行政府政策的另一方式。他們以為現代國際戰爭，有幾種可能的方式。第一，各資本主義的國家為其本身的生存，不得不企圖取得比現在所以佔有的更多的殖民地。但因全世界殖民地已分割完盡了，則他們必因此而發生戰爭。這樣的戰爭，是發生於各國統治階級之間的似乎不與蘇聯相干，但最後還是要牽連到她身上去。

第二種戰爭，是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戰爭。即是亞洲、非洲等被壓迫民族為解脫外力的壓迫，爭取自身的獨立與自由而爆發的反抗戰爭。由蘇聯共產黨人看來，這種戰爭很容易轉化為國際的階級戰爭。他們認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有產者的自私慾望，已經淹沒了他們的民族意識。在爭鬪中他們可能的與其本國的下層人民分道揚鑣，且各在國際上追求援助。因此，這種戰爭發生，蘇聯也有轉入漩渦的可能。

第三種是帝國主義者聯合起來向蘇聯進攻。共產黨人最怕這種戰爭，然而他們十二分的確信這樣的戰爭必然無法避免，遲早總是要到來的。他們自己承認，蘇聯與資本主義的列強，是絕對的矛盾而不能調和，經常用極端懷疑的眼光來注視全世界。他們教育全國兒童以及窮鄉僻壤的鄉愚，要他們謹防這樣的戰爭，並要求每一個人在這樣的戰爭中，應為保護蘇聯而戰到最後一滴血。自然，這不能說是共產黨人的過慮，或者故意聳人聽聞以遂行其軍國民教育的政策。歷史的經驗確實是如此，革命後數年中英、法、日、美各國的武力干涉，援助白黨的叛亂，這些都是蘇聯人們所不能忘懷的。

蘇聯要人們對於戰爭的態度，從不帶絲毫感情，而是如同對其他的實際問題一樣，任用冷靜的頭腦來加以考慮與分析。他們不存任何僥倖避戰的希望，而是在政治上時時刻刻準備戰爭。自幼稚園的兒童直到垂死的老翁，他們的腦筋中總認為各資本主義的列強是時刻準備着向蘇聯進攻的。這不是軍事上的或經濟上的備戰，而是政治上的備戰。從蘇維埃政權誕生之日起，這種政治上的備戰精神即已瀰漫全國，始終未變，且隨着國際風雲的緊張而緊張。

不過，蘇聯的人們並不是悲觀主義者，認為戰爭永久不會停，或者人類社會存在一天，則戰爭終將繼續一天。恰與此相反，他們以為祇要資本主義消滅，勞動者得到世界範圍的勝利，則戰爭自會終止。他們觀察一切問題，總是從經濟的範疇出發，對戰爭的考慮也是這樣。他們以為戰爭不外是爭奪物質利益的階級鬭爭，內戰是有產者與無產者的鬭爭，國際戰則是兩國統治者間的戰爭，而蘇聯與帝國主義戰，則是國際資產者對國際勞動者的戰爭。他們懼怕轉入戰爭，然而對行將到來的戰爭又存有莫大的希望，認為那是新社會的催生婆，蘇聯一定能獲得勝利，世界勞動者定能與牠聯合起來，建設大同社會。這樣的結論，固然也自有他們的邏輯根據，然爲了鼓勵人們的勇氣與自信心，要取得政治動員的效用，也不得不如此。

然則若干年來，蘇聯對外的和平政策，如加入國際聯盟，主張軍縮，提倡保安公約等，又將如何解釋呢？這一切都是主張和平的努力和表現，但並不是根本上放棄了戰爭的準備。反之，且可作爲一種備戰的手段看待。在共產黨人看來，社會主義者絕不應從廣義的反對一切戰爭，例如勞動者反對有產者的戰爭，是不可免的必然現象，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也絕不能長久和平。

的共處。他們自信勞動者沒有解除有產者的武裝，完成其歷史使命以前，決不能先自解除武裝。列寧氏曾說：「我們永不會說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可以脫離武力的倚靠。」這句話的精神，在蘇聯是十二分的採取與實施了。列寧氏還說過，『和平條約是樹立戰爭的基礎。』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其和平政策的意義了。

自然，蘇聯所採取的這種立場與政策，自有他們自己的理論根據，與實際的要求。我們這裏，也並不在於批評其得失是非，祇是指明其政治的備戰這一事實而已。•

第七章 從黨爭上所見的政治動向

第一節 蘇聯黨爭概述

大家都知道，蘇聯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共產黨也如同其他國家的許多政黨一樣，是免不了內部派別爭鬭的。或者可以說這裏的派別爭鬭，較之其他政黨更為劇烈而殘暴。我們對於蘇聯黨爭，原無甚興趣，但以蘇聯政治的每一動向，輒首先在黨爭中表現出來，是以在這裏不得不略加介紹。

本來，蘇聯黨爭之影響其政治動向，是在十月革命以後的事，而且亦祇一九二四年以來最為重要。但以蘇聯黨爭，有很長久的歷史淵源，且各派系的關係又甚錯綜複雜，吾人為明瞭其緣委起迄及其內容，不得不略一回顧以前的史跡。

蘇聯共產黨的前身，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該黨創立於一八九八年，唯成立之始，全體重要人員均行被捕。因帝俄政治，向以黑暗專制著名，在西歐早已公開存在的社會民主黨，在俄國則為非法的組織而被禁止活動。直到一九〇三年，所謂的社會民主工黨纔算正式成立。唯自此時起，其內部即開始了派別的爭鬥。多數派（布爾希維克）與少數派（孟希維克）的名稱，即產生於該年的黨大會中。一方面列寧氏的主張得到大會中多數的擁護，遂名為多數派；另方面與列寧對抗的馬爾丁諾夫(Martynov)，祇得到少數的擁護，因名為少數派。至於兩方面所爭執的問題，則有以下幾種：第一是關於政綱的，列寧氏主張社會民主工黨應採取確定的政綱，揭出根本的主張和奮鬥的目標，且應將資本主義在俄國發展的特殊狀況詳加分析，然後定出實際的政策。少數派，則祇主張廣泛的分析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一般的推論勞動者革命之必然發生，但不定出實際的鬪爭策略。第二是關於土地問題，列寧氏主張達到相當時期，應提出土地國有的主張，少數派又不贊成。第三是關於黨員資格問題，列寧氏主張僅接受黨綱繳納黨費的不能算是黨員，必需參加所屬黨部的工作，纔能取得黨員的資格。少數派的主張則恰與

此相反。此外，關於對自由主義派與社會革命黨的態度問題，兩派的主張也是彼此對立。

在這時期，托洛斯基氏還是該黨中後進的青年，但已漸露頭角。起初，他是與少數派一致的，不久又行退出，採取與兩派不同的另一種立場，且周旋於兩派之間，努力於兩派的聯合。

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爆發，使社會民主工黨間派別的爭鬭更為尖銳。少數派的意見，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資產階級以下的各階層都是共同的反對沙皇制度。是以勞動者應該與資產者合作，不應該反對牠，特別是不能奪取政權。因為這將超出了民主革命的階段，將是破壞與資產者的聯合戰線。

多數派的意見恰與此相反，他們認為那雖是民主革命，但其目的應是『工農民主專政』，而不是資產者取得統治權。該派的首領列寧氏說：『這樣的勝利，定將成為一個專政……因為工農所需要的一些急不容緩的改革要實現，必然引起地主，大資產者及專制政府之拼命的反抗。要打倒這個反抗，壓倒反革命的企圖，沒有專政是不可能的。但這是一個民主主義的專政，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這個民主主義的專政是不能動搖資本主義的基礎的。』

托洛斯基氏這時候已顯然的獨樹一幟了。他固然反對少數派。但也反對多數派。他批評列寧氏的工農民主專政，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他說：『列寧將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與工農革命的民主專政之間，規定原則上的不同。這是純形式邏輯的推論，完全爲遁詞，是離開生產力的水平與工人階級統治間之物質矛盾。』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終於失敗了，革命羣衆受極大的犧牲與打擊。社會民主工黨亦在沙皇政府壓迫之下而解體。黨員之被判處徒刑，充軍、坐獄者不可以數計。但其內部派別的爭鬭卻仍沒有停止。這時候，社會民主工黨中已有少數人當選爲國會議員，但其活動沒有若何成績。於是該黨內有一部分人主張召還議員，不要公開的活動，祇從事於地下工作，這是所謂『召還派』。另有一部分人則以爲失敗後，革命已是無望了。用不着再向那方向進行，應當取消一切祕密組織與活動，專門從事於公開的合法的爭鬭，這是所謂的『取消派』。此外，也還有其他許多的小派別。

自此以後，托洛斯基氏的地位日益增高，且在很長的期間內與列寧氏對抗着。從一九一一到一九一四年，社會民主工黨內部有『八月團』(August Bloc)的小組織存在，與列寧氏所主持

的黨中央相對抗。而此八月團的首領即爲托氏。

祇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托氏纔正式加入了多數派，他與列寧氏的政治意見才算完全一致。不過這時候，多數派內部又發生了新的變化，即一向與列寧氏一致的季洛維夫（Zinoviev）與加米聶夫（Kamenev）二人，這時卻獨樹一幟的反對列寧氏的主張。因爲列寧氏主張勞動者奪取政權，而此二人則主張民主革命尙未完成，土地革命不獨沒有完成，且未開始，是以祇能如一九〇五年那樣，進行工農民主專政。列寧氏的主張終於勝利了，季加二人祇得屈服，不過數年後他們又轉入了反對派，以反抗正統派的斯塔林。自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後，多數派與少數派已完全分離，且成爲敵對的狀態，此後的派別爭鬭，純爲多數派內部的問題。

十月革命後，共產黨及其政府，標榜和平。一九一八年夏天，歐洲大戰的前途雖已決定，但德軍在東線還是節節勝利，這使呱呱墮地的蘇維埃政府難於應付，因而又發生政策上的爭執。當時列寧氏主張新政府應取得喘息的和平時間，是以應接受德軍所提出的苛刻條件。托洛斯基氏則主張『不戰爭，也不媾和』，即是表示蘇維埃政府沒有戰爭的能力了，但也不向德屈服。另有一派人

以布哈林 (Bukharein) 與拉狄克 (Radek) 為首領，即所謂左派共產黨。他們反對對德媾和，而是要進行對德的革命戰爭，藉以發展西歐的革命運動。這次爭論的結果，後來又是列寧氏取得了勝利。

一九二一年，蘇維埃政府雖在軍事上政治上取得了勝利，但經濟上則遭逢着空前的危機。列寧氏主張採取新經濟政策，取消軍事共產主義，恢復市場關係，對農民表示讓步。托洛斯基氏開始是反對新經濟政策的，後來經過長久的辯論以後也就贊同了。但這時候另有一部分人，即所謂『勞工反對派』，極力反對施行新經濟政策，攻訐列寧氏，謂這是犧牲自己的主義與勞動者的利益，以與小資產者的農民妥協，致使俄國有走向資本主義前途的危險。然結果，這一派的意見還是失敗乃至於屈服。

一九二四年列寧氏之死，對蘇聯共產黨發生絕大的影響。在以前，其內部雖然不斷的發生派別爭鬭，但列寧氏具有極大的權威，每一爭論的最後，勝利總屬於他。列氏一死，就缺少這樣的一位中心人物來統率一切，是以此後的派別爭鬭表現為特別激烈，且終至於分裂。另方面，列寧氏未死

以前，共產黨的大權已落入斯大林手中，該氏在以前雖沒有十分特殊的建樹，但一向是隨着列寧氏共同奮鬥，因而以列寧氏的唯一繼承人自命，對其他人們自不免稍存疑忌之感。特別是托洛斯基氏具有絕頂的聰敏與才智，對於蘇維埃政府的創造又具有莫大的功勳；在過去，托洛斯基與列寧二人的名字與照片，在蘇聯全境是互相聯繫着的，在國際間亦復如此。現在，共產黨內的大爭鬭與分裂，則以斯大林與托洛斯基為中心而展開。

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使蘇聯社會發生極大的變化，因此使共產黨的內部爭鬭更趨尖銳。新經濟政策使鄉村富農與中農的勢力不住的增加，城市中新興資產者（Nepman）的地位也日益增加。以這一問題為中心，在共產黨中展開了左中右三派的爭鬭。中派是掌握黨國大權的斯大林，即所謂正統派。右派以賴可夫（Rakov）與布哈林為領袖，其趨向為扶植農民，擁護新經濟政策。左派即所謂的『反對派』，以托洛斯基為首，他認為農民是私有產者，若其力量過大，可以根本危及蘇聯政權，使之轉向於資本主義道路。這樣，托氏的反對派活動在列寧去世之後即行開始了。

季諾維夫與加米聶夫二人，在政見上與斯大林本不甚一致。到一九二五年末，該二氏公開反

對中派與右派，其主張則大致與托洛斯基相近。一九二六年，二氏纔與托氏正式聯合，成立新的反對派，於是其爭鬭乃更具體而尖銳了。中派與右派為了應付對方的進攻，亦能暫時的團結一致。

兩方面的爭鬭既為空前的劇烈，其所牽涉的問題亦異常複雜。凡國內政策，對外政策，各有不同的見解，這一切且留在下一節去敘述。托洛斯基以其絕頂的天才，政治的能力與革命領袖的歷史，在爭鬭中發生極大的作用。這使正統的斯塔林派不得不採取壓迫手段以資對付。在一九二六與二七年，反對派之被開除黨籍與流放的數以千計。托洛斯基既遭受充軍之苦，且於一九二九被驅逐於蘇聯國境以外，直到現在也還是在各國飄流着。季諾維夫、加米聶夫與拉狄克諸人，經過斯塔林壓迫之後，早於一九二八年宣佈悔過投降。唯暗中仍在繼續反正統派的活動。前數月報載，前二人以圖謀暗殺而被執行槍決，拉狄克亦以嫌疑而被捕。這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外人自難明瞭，但蘇聯內部的爭鬭，或許因此小告結束。現在獨樹反對派大旗以與斯塔林相抗爭的，祇有找不到自由安身處的托洛斯基而已。

布爾塞維克革命的元老，有的因派別爭鬭而自殺，有的則被殺或被放逐。現在存留的已寥若

晨星，亦云慘矣。

第二節 正統派與反對派所爭論的主要問題

上節所述是蘇聯黨爭之一般的概略。這裏，我們應把反對派與正統派之間所爭論的主要問題簡略的敘述一下，藉以窺探在正統派所指導下的蘇聯政治動態。

首先是對於俄國革命發展的道路及十月革命的意義，兩派各具有不同的意見。正統派的意見以爲俄國革命先有工農民主專政，然後纔有無產階級專政。這是俄國革命發展的道路。至於十月革命即是社會主義革命，是世界革命的起點。無產者奪取政權後，開始社會主義的建設，並能大大的影響到西歐勞動者的革命。是以正統派的首領說：『十月革命不祇是西方社會革命的信號動力和基點，並且是第一，世界革命將來進展的基礎。第二，在蘇聯境內開始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

托洛斯基的意見則與此不同，他以爲十月革命本身不能算是完成的社會主義革命，祇不過

是西方社會革命的信號和起點而已。假設世界革命延遲下去，假設西方成功的社會革命不能在最近時期內實現，則蘇聯勞動者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了。至於對革命發展的道路而言，是與這一問題相關聯的。托氏一向主張『不斷革命論』，反對『工農民主專政』說，即是反對革命的『階段論』。他以為民主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俄國革命絕不能停止於民主階段，必須一直發展到社會革命，不然則祇有失敗。所以他在一九〇五年即提出『工人政府』的口號。另方面，所謂社會革命必不能停止於國家範圍，必須發展到世界範圍。托氏說：

『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到十月罷工的中間，作者用了這一種觀點觀察了俄國革命的性質，得到了「不斷革命論」的一術語。這一名稱在意思上是說，站在俄國革命面前的不能是資產階級的目的，雖然這也在上面。革命不能在最近，在資產階級的任務上解決，不無產階級要握得政權。無產者把政權拿在自己手中，並不為革命是資產階級的範圍所限制。反之，為了保證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要在其統治之初期完成；不僅加深的突破封建財產，而且加深的突破資產階級財產。在這種情形之下，牠不僅與一切資產階級的派別，而且與廣大的農民羣衆作敵視的態

度，他們在革命初期仍進行與革命鬪爭，在廣大的農民羣衆協助之下無產階級走向政權。在落後的國家之中，有多數農民人口的牽制，工人政府之矛盾祇有在國際範圍內，在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舞臺上纔能得到解決。」

上面的引文，可以表現托氏「不斷革命論」的全部意見。

第二，我們要介紹的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是否可能的問題。依照反對派的意見，如果沒有若干重要的西歐國家的勞動專政成立，則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托洛斯基說：『欲在民族國家範圍中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的。』又說：『在像俄國這樣經濟落後的國家內，沒有經濟和技術發達的國家的幫助，完全的社會主義建設是不可能的。』在反對派看來，既然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有待於西歐勞動者革命的成功；則目前蘇聯的主要任務，不是急於進行不可能的社會主義建設，乃是要加緊世界革命的煽動與組織。他們批評正統派拋棄了勞動者的國際立場，成爲『社會愛國主義』。托氏說：『若希望在國家的範圍去看社會革命的前途，就是上了國家的狹義觀念的大當，這就是社會愛國主義的真諦。』

正統派的意見，則以爲一國建設社會主義是可能的。他們批評反對派的見解是悲觀的，是取消論的，且與西歐社會民主黨的意見一致。斯塔林在一九二七年說：『我們達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目的就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政治基礎。我們能不能用自己的力量造起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能不能造起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需的經濟基礎？能的。然則什麼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實質和經濟基礎，是不是夢想天堂實現於地上而得到普遍的滿足呢？不是的。那是小資產者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實質的觀念。造下社會主義經濟實質的意思，就是把農村經濟和社會主義工業合成一個整個的經濟，置農村經濟於社會主義工業支配之下。根據農村經濟和工業出產品的直接交換的基礎上，調整城鄉的關係，防止和消滅產生階級特別是產生資本的途徑，最後還要確定直接能以消滅階級的那樣生產和分配的條件。』

從上一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正統派對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態度。

第三是關於蘇維埃國家與政權的性質問題。據反對派的見解，蘇聯自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後，國家與政權的性質已逐漸發生變化。蘇聯政府不祇是代表工人的利益，且也扶植並助長各級農

民的勢力。更進一步的說蘇聯國家已漸失去無產階級的性質，將來必有資本主義勢力取而代之一日。是以托洛斯基與季諾維夫等，呼號着蘇聯已走入空前的危機，主張『工人國家的再興』。他們以為共產黨指導的政府應當實行保障社會主義建設和無產階級利益的純粹政策。假如不能這樣做，則顯然應該改組。

反對派認為蘇聯已不是無產階級的國家，而是工農的國家，且有時甚至還代表新興資產者的利益。他們把蘇聯自革命後至一九二六年時分為三個時期。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年為第一時期，即是新經濟政策以前，蘇維埃國家還能實行勞動者的階級政策，農民及其他私人資本的勢力毫無作用，且受工人的剝削與政府的壓迫。一九二一年至二五年為第二時期，蘇維埃國家的無產階級成分則比較前一時期為軟弱。而在一九二五年至二六年第三時期，蘇維埃國家的變化愈大，牠已不能實行適合勞動者與反對有產者的政策。往後去，假如不加以改造，則無產階級將日漸削弱，私人資本的勢力反日益擴大，終至使國家變質。

正統派的人們自然反對這種說法，他們認為蘇聯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是無產階級的政府。農

民並不是與勞動者平行的階級。政府中雖有代表農民利益的人物，但這祇是表明共產黨的聯農政策而已。他們以爲無產階級的勝利與社會主義的建設，必須依賴於這兩個階級的合作。雖然國內存在有資產階級，但其力量並不巨大，且在各方面受國家的限制。政府不難用各種和平的方法，以保障社會主義生產的勝利。他們也承認鄉村間階級鬭爭是存在的，但不是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鬭爭，而是貧農與富農的^{對立}鬭爭，用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建設，不難消滅富農的力量。

第四，關於經濟政策與農民問題的爭論。我們知道，正統派與反對派的爭論，許多是由於實行新經濟政策而產生的。而所謂新經濟政策，即包含着對農民的態度問題。正統派認爲繼續此政策的實施，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必要階段。反對派則以爲這裏已產生極大的危險，應即早施以補救，應實行許多重工抑農的農法。

反對派主張提高國營工業品的價格，因以多取得利潤，作爲發展工業的原始資本積累。正統派則反對這種意見，以爲這將發生許多流弊；第一是破壞工農的聯合，因爲提高工業品的價格，使組成人口絕大多數的消費者農民蒙受損失。這樣，農民必將懷疑「工人政府」，使蘇聯國家的基本

磚發生動搖。第二，若實行提高工業品的價格，則受損失最大的是中農和小農，而他們合佔全體農民百分之九十左右。如果這大多數的人口離開政府，則所謂工農同盟將發生危險。第三，工業品的消費者不僅是農民，工人也在內。工業品價格的提高，工人也將一樣受損失。若果以增加工資來抵補，則所謂『資本積累』的效果豈不又歸失敗。第四，提高物價的結果，使佔全體農民百分之四十的貧農勢將不能維生，不得不流入城市而增大失業羣。

自然，正統派也不能容易把反對派駁到。後者以為實行這個政策時，可以加重富農與中農的捐稅，減輕小農的租稅。因此不致影響工農的聯合。對工人而言，自需提高工資，但工資提高，亦將提高生產力，因而不至抵消所提高的利潤。至於小農流入城市，則國家可用積累資金來開設工廠以資容納。

其次，對中農的態度問題，也是兩派爭論焦點之一。正統派以為中農數目佔全體農民百分之五十左右，必須繼續與他們聯合的政策，方能恢復並發展農村經濟。因此，他們主張以貧農作為農村的基本力量，聯合中農，剝削富農。反對派雖不明顯的反對聯合中農政策且以為中農固有利於

農村經濟的發展，但上層中農與富農有密切的關係，其力量的膨脹，將不利於社會主義的建設與無產階級政權。

反對派認為國營工業的擴張與發展的速度，應超過農業的擴張與發展。要這樣，社會主義的建設才有基礎，無產政權才有保障。然而工業建設的資本從何而來呢？如上述他們主張剝削富農和上層中農，其方法為提高貨價與加重農稅。他們以為資本主義發展之前，有資本的原始積累。社會主義的建設也需要一種積累。而此對農民的剝削，則正是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

正統派不贊成這種意見。他們以為農業固能因工業的發展而得到改進，但農業的發展也能促進工業的進步，而且兩方的發展，若過於失其平衡，則必為不健全狀態。依照反對派剝削富農及上層中農的辦法，勢將產生若干流弊；首先，富農及上層中農既遭國家各方面的剝削和壓迫，勢必轉而壓迫和剝削貧農，以為補償，這將加緊鄉間的階級爭鬭。其二，農民既受了壓迫，則農村經濟的發展必大感困難，因之使其購買力不能增加，工業品的國內市場亦必不能擴張。其三，一部分農民既不能受到國家的保護，反之且受國家的摧殘，則蘇維埃的建設工作，勢必遭受許多障礙。

最後，對於世界政策，兩派亦有相反的意見。一九二四年以後，資本主義漸趨於部分的穩定，各國政局亦經過暴風雨之後而達到暫時的安寧。因此，正統派認為當時是革命後的休息時期，各國勞動者不應作奪取政權的冒險，免受無謂的犧牲。而是應該從事準備工作，準備『第二次的戰爭』。一九二六年，正統派的領袖說：『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就大體而論，是在局部的暫時的穩定局面之下。現在的時期是革命的休息時期。各國共產黨應當準備無產階級，從事將臨的革命。資本家雖作鞏固穩定局面之無效的嘗試，但這不能不引起工人階級反資本家的鬥爭及其勢力的聯合。各國共產黨必需參與這樣不斷加劇的階級鬥爭，而變資本家的進攻為無產階級的反攻，以求無產階級政權的樹立。若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各國共產黨必須抓到依附第二國際和改良派的職工會的廣大工人羣衆。所以，統一戰線的策略，是各國共產黨必須而且應當採取的。』

正統派對世界問題的意見既是這樣，所以在歐洲進行『統一戰線』的策略，拋棄即時革命的路線。當時蘇俄職工會與英國職工會合組英俄委員會，就是這種政策的具體表現。

反對派的諸領袖，特別是托洛斯基的意見則完全不是如此。首先，反對派以為歐洲資本主義

國家並未居於穩定時期，反之，各國正有莫大的危機，此危機不久將促起勞動者革命。例外的祇有美國而已。托洛斯基著有歐洲與美洲一書，即是說明這種意見的。其次，西歐各國工人雖多半在第二國際與改良派工會指導之下，但要奪取這些羣衆，祇有揭發第二國際『出賣工人的罪惡』，使世界勞動者不受他們的愚弄，絕對不能與他們取聯合的行動或一致的步驟，以自毀信譽。是以，英、俄委員會一類的組織，在反對派看來，是絕不應存在的。

這是就大體而言，至於對個別事件，如對德國革命問題，對社會民主黨關係問題，對殖民地問題，對中國問題，印度問題等，兩派都具有相反的見解。唯限於篇幅，這裏不能一一敍述耳。

第三節 正統派勝利以後的政治設施

我們站在第三者的地位，無論是同情蘇聯與否。但她佔有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十二分之一的人口，那裏發生的一切事變，是頗值得吾人注意的。蘇聯是代表一個新社會制度的國家，而此新社會制度，前此並沒有成例，一切需待她自己開闢與創造。在這種情形之下，路線的選擇和決定，

當然不是一件輕易的事。稍一不慎，即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險。這正如從獨木橋上渡河，一步走錯了，便會跌到深淵裏去。也因此，所以在其開步走的時候，其內部容易發生意見的爭執。各派都有自己的政策，都有自己的路線。從上文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爭論自俄國革命開始時即已存在，在祇是後來更劇烈而已。

派別爭鬭的最後結果，正統派的斯大林取得了勝利。近十餘年來蘇聯的政治設施，都是根據中央派的政治路線而展開。反對派事實上已被瓦解，特別是去年季諾維夫與加米聶夫等被執行死刑後，反對派此後在蘇聯恐不能有任何活動。往後去，蘇聯大概也還是要繼續正統派的政策。

自一九二八年始，派別的爭論在蘇聯內部事實上已告了一段落。正統派已壓平了反對派，而獨行其是的執行自己的政策。照近十年來的事實看，正統派的政見似乎比反對派為高明，因為歷史證明斯塔林派的設計較為準確。蘇聯已經走過了獨木橋，安然的站在平坦大道上向前躍進。經過了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在經濟上已經有了莫大的成就。不獨與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不同，沒有恐慌，沒有失業，其經濟日益向上的發展。而且，全部工業為社會主義性，農業有百分之九十

之上爲社會主義性；新經濟政策下的新興城市資產者與富農都被消滅，因而使社會階級結構發生趨向平等的變化；一切勞動者的工作時間減少，工資增多；文化生活方面亦大爲增進，文盲近於絕跡。照這樣看來，則一國能否建設社會主義問題，正統派用事實來解答了。

對農民的態度問題，亦曾是兩派爭論的中心。反對派始終認爲農民是私有者，他們不能共同建設社會主義。正統派並不會接受他們的意見來壓迫中農，剝削富農。而是使用經濟的方法，把農民誘導到集體農場來，另外以國營大規模新式農場來作榜樣，以實例來教導守舊的農民，使他們不得不離開私有的小經濟而走向社會主義之路。反對派所鼓吹所警告的蘇聯政權的變質，資產者的復活，政變的行將到來等，都成了不曾兌現的過慮。現在，蘇聯的農民既沒有征服工人，蘇聯政權也不會變質，反而工農的聯合似較前緊密。這一方面似乎又使反對派失望。

在歷史過程中，許多事情是難得想像，難得預見的。反對派以前憂慮蘇聯沒有原始的資本蓄積來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非剝削農民不能解決這一問題。但事實上，國營企業與對外貿易的利潤，特別是全體國民的踊躍投資——購買公債券，全體農民的參加集體農場等，卻充分的解決了

這一問題。一般所憂慮的蘇聯技術落後的問題，經過數年學習期間，到目前已成爲充分現代化的國家，一切精巧的生產工具，她已不依賴輸入而能自己生產。至於斯泰哈諾夫（Stakhanov）運動，勞動者從事增加生產的競賽等，這種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更是人們所不能預料的。

特別表現正統派政策的實施及其勝利的是蘇聯新憲法。兩派所爭持的許多問題，在這憲法中都可以尋出充分的答覆。這部新憲法，可看爲過去十年間正統派政策的總結，另方面也可以看爲是正統派此後政策的指針。關於這一點本書另有專章論述，這裏不贅。

至於對外政策，正統派的『資本主義暫時部分穩定』說，看來似無背於事實。若干年來，蘇聯在正統派指導之下，放棄直接鼓動世界革命的企圖。特別在歐洲表現是如此，牠與資本主義國家合作。且結成同盟，加入國際聯盟，同牠一向所咒罵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外交官握手言歡；用『聯合戰線』，『人民陣線』等比較妥協性的口號，代替了『勞動者奪取政權』，『組織蘇維埃政府』等口號。這一切都是中派正策的對外表現。

兩派的意見，究竟誰是誰非，或者都欠妥當。這一問題，作者不能加以判斷。我們的目的，是要知

道在蘇聯執政黨的內部，有如此這般劇烈的爭論；而此爭論並不是無關緊要的遊戲，乃是決定一個泱泱大國的政治前途。

第八章 從憲法改革所見的政治動態

第一節 蘇聯憲法的特徵

憲法爲一國的基本大法，凡立國的根本精神，中央及各級政府的組織，人民的權利義務等，都規定在這裏。是以憲法的修改或改訂，最能表現一國的政治動態。蘇聯憲法自有其獨特之點，不容易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相提並論，但從蘇聯新舊憲法的差異處，來觀察其政治的變動，仍不失爲可靠的方法。

蘇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正式成立，是在一九二二年十月革命後所成立的蘇維埃政府是蘇俄（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而不是蘇聯。蘇俄爲蘇聯構成中之一份子。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

共和國，白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及外高加索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等，開聯合會議於莫斯科，結成聯盟，這就是蘇聯的誕生。同時，將全蘇聯盟條約及聯盟成立宣言二者合併為蘇聯憲法，於一九二三年七月四日經第一次聯盟蘇維埃大會頒佈，這是最初的蘇聯憲法。

該憲法由上述兩部分構成，第一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成立宣言。這裏，表現其立國的基本精神及所以成立的緣起，其文簡短而重要，我們全部錄引如下：

『自蘇維埃諸共和國成立以來，全世界的國家即分為兩個集團，資本主義的集團與社會主義的集團。

『在資本主義集團內，所存在的：民族的仇讐及不平等，殖民地的奴隸制度，盲目的愛國主義，民族的抑壓及虐殺，帝國主義的侵略及戰爭等。

『在這社會主義的集團內，所存在的：相互信賴及平和，民族的自由和平等，人民之平和的共存及親睦的共動關係。

『數十年來，資本主義的世界，企圖將民族的自由發展與人剝削人的制度相混合，以解決

民族問題，現已證明失敗。而民族間的糾紛反日益加烈，馴至威脅資本主義本身之存在。資產階級已無力組織人民之共同關係，其事至明。只有在社會主義集團中，只有在那團結自己周圍大多數住民的無產階級獨裁政治之下，纔有根本打破民族的壓迫，樹立人民相互的信賴狀態，及建立友愛共同關係的基礎的可能。

『也只有因着這狀態的存在，各蘇維埃共和國纔能戰勝內外一切的帝國主義，肅清國內內亂，保持國家的生存，且着手於和平的經濟建設。

『然而綿亘數年的戰爭所遺下的結果，使田園荒蕪，工場停止，生產力被破壞，以及經濟資源涸竭。因此，各共和國對於經濟建設的努力，不能充分的發展，且依據現在各共和國之分立狀態，恐國民經濟之復興，根本爲不可能。

『他方因國際政局之不安定，及遭受新攻擊的危險，使各蘇維埃共和國不能不設置共同戰線，以與資本主義相敵。

『而且蘇維埃之權力組織，爲其有特殊的階級共同性質，所以蘇維埃諸共和國勞動民衆

自身，也自然能結合爲一社會主義的集團。

「根據以上諸事實，蘇維埃各共和國，爲保持外部之安全，國內經濟之繁榮，及民族自由的發展，遂有結合爲一同盟國家的願望。」

『最近蘇維埃大會，以滿場一致，決定組織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爲保證本聯盟爲平等的人民之自由團結，各共和國均有自由脫退聯盟的權利，現存或將來建設之一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家，亦可自由加入本聯盟。新聯盟國家，自一九一七年十月起，已將其基礎置於人民之和平的共同生活及友愛的共動關係上。本聯盟國家期待能求爲一抵抗世界資本主義之可靠的壁壘，而且能將全世界勞動者團結於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之下。』

從上述的宣言看來，很容易明瞭聯盟之社會主義的立國精神，及其以保障新社會制度的存在與繁榮，並反抗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攻爲其重大任務。聯盟憲法的第二部分，爲諸共和國建立聯盟的條約。這裏主要的內容是規定聯盟最高政權機關的組織、權力，與其相互間的關係。

第二部分共分十一節，第一節爲聯盟最高機關的權限。將全蘇聯的外交、經濟、金融、財政、對外

貿易、交通、國防、教育、立法等大權均集中在最高中央政府手中。第二節爲加入聯盟各共和國的主權及國籍，說明各共和國得自由退出聯盟，並在聯盟憲法允許之下，行使其獨立主權。第三節爲蘇聯蘇維埃大會，規定其開會時期與組織法，並以此爲聯盟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第四節規定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組織與權限。第五節規定中執委會幹部會的組織與權限。第六節則爲聯盟人民委員會的組織與權限。第七節爲聯盟最高法院。第八節爲聯盟人民委員部。第九節國家政治局。第十節則規定加入聯盟各共和國的最高政權機關的組織。第十一節規定聯盟的國徽國旗及首都。

這是蘇聯最初的憲法。我們很容易看出這部憲法是不完全的，因爲在宣言中，只列舉若干抽象的原則，而第二部亦僅規定中央政權的結構。至於憲法中最重要的部分如人民權利義務等項，則付缺如。但我們應知道，在聯盟沒有成立以前，已經有了諸蘇維埃共和國的存在。她們各有其自己的憲法，關於人民權利義務及選舉被選舉權等項，那裏已有詳細的規定。研究聯盟的憲法，應以加入聯盟各共和國的憲法作補充，纔能窺得全豹。

因此，我們應將成立最早，規模最完備的蘇俄（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憲法，作為聯盟憲法的一部份看待。這部憲法成立於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五年以後雖常有修正，但大體則仍舊。此憲法共分爲六部，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部爲勞動及被剝削的人民權利宣言，首先確定蘇俄爲工農兵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及地方政府概歸蘇維埃掌握。第二，承認各民族的絕對自由。第三，爲防止人剝削人及階級的區分，乃將土地、森林、礦產、水道、工廠、鐵道、銀行等收爲國有，取消對外的債務；祇有勞動者有受武裝的權利。第四，爲反資本帝國主義，公布一切對外祕約，實行對壘敵軍的工農交歡政策，以革命達到非合併非賠償與民族自決的議和政策。第五，反對資本主義國家對弱小民族的壓迫與剝削。第六，允許蘇俄境內弱小民族獨立。第七，排斥剝削階級於蘇維埃政權之外。第八，各民族得自由加入蘇俄聯邦。

第二部爲蘇俄聯邦共和國憲法的根本原則。這裏所規定的第一是工農聯合着組織獨裁政府，破壞資本主義以保證社會主義的前途。第二，爲保證勞動者意識上的自由，使教會與國家

分離，學校與教會分離，凡爲公民都有信仰宗教或反對宗教的自由。第三，爲保證勞動者的真正言論自由，使報紙不隸屬於資本家之下，而將印刷及出版的技術與物質資料，移歸工農。第四，爲保證勞動者有完全的集會自由，允許公民有集會結隊游行的權利，一切公共集會場所歸勞動者處理。第五，爲保證勞動者的結社權，給他們以精神與物質上的援助。第六，勞動者都有自由受教育的權利。第七，勞動爲人人應有的義務，不勞動者不得食。第八，凡屬公民均負有保衛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義務，故兵役爲人人共有的責任。唯攜軍械以保護革命的光榮，僅屬於勞動者。第九，凡國外勞動者在蘇俄境內工作時，享同樣公民權利，蘇俄並收容國外政治犯及宗教犯。這一切都是第二部的主要內容。

憲法第三部，規定中央權力機關的結構。第四部爲地方權力機關的結構。第五部爲選舉權的規定，這是後面將要討論到的重要之點。這裏規定凡蘇俄公民，無男女宗教民族的差別，凡年滿十八歲者，均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但應以具有下列資格者爲限：

(一)自食其力者，自食其力的家族，工農商三業的勞動者雇傭者；

(二) 共和政府下的海陸軍人員

(三) 在以上二類中之一，而現時不能工作者。

又規定，屬於以上三類之一而犯以下各條款之一者，不能有選舉及被選舉權。(一)雇傭他人以謀利者；(二)不以勞動而依資本家私業的盈利以生者；(三)商人代理人中間販賣者；(四)各教會中的教士；(五)舊政府下的警察偵探及前俄皇族；(六)犯精神病者；(七)經法庭宣告犯罪者。

至於工人與農民的選舉權，照憲法的規定並不是完全平等。例如地方蘇維埃大會的成立，由鄉蘇維埃所選代表，按居民二萬五千選代表一人為比例，而市蘇維埃代表則每五千人得選代表一人。省蘇維埃大會，村蘇維埃每居民萬人選代表一人，市蘇維埃代表則每二千人選代表一人。其他各級蘇維埃代表的選出，城市居民均較鄉村居民佔優勢。

選舉方法，則為間接的、多級的與公開的選舉。

憲法第六部為財政政策，這裏說明沒收資本家的財產，使全國人民，對於生產分配上，立於平等地位，國民代表認為關於特定情形，或關於全國公益，應將私有財產權加以侵犯時，政府當助成

其事。

憲法第七部，規定共和國的國徽及國旗。

上述七部分構成蘇俄憲法，爲聯盟所屬各共和國憲法之母。其他各共和國的憲法均依此爲標準而制定。聯盟憲法之所以祇規定國家機關的組織與權限，以及國家政府與各共和國的關係，而關於國民權利義務等項則付缺如實。因聯盟憲法與各共和國憲法是互相補充，互相構成而爲一完整憲法。把這兩部憲法合起來研究，我們纔能瞭解蘇聯憲法的全貌。

蘇聯憲法的內容，我們已經知道了大概。這裏，應來略一考察其特徵。首先，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所謂私有財產權的神聖，工商業的自由，雇佣勞動的自由等制度，爲一般憲法所尊重的，在這裏卻沒有牠們的地位。反之，在蘇聯憲法中，明確規定破壞私有財產權，將一切資本家與地主的私產收爲國有，以消滅階級的差別與人對人的剝削爲目標。第二，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憲法規定一切權力屬於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牠公開否認全民政治的民主主義，剝奪有產者的一切權利。以勞動爲人人的天職，規定不勞動者不得食。就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而言，不是像一般那樣以財

產，身份，種族或是否受教育爲條件，而是以是否剝削別人爲條件。在別的國家，掌握政權的是有產者，在蘇聯則祇有勞動者方能參政。第三，在蘇聯憲法中，沒有所謂普遍的或一般的自由與平等，祇有勞動者的自由與平等。是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權利祇給與勞動者，且以特殊方法保證其實現。第四，蘇聯憲法中所表現的民主主義，實較一般的民主主義更爲真實而寬廣。因爲牠沒有一切性別，宗教、民族、財產等限制，凡屬公民都有平等的參政權。不過，這是蘇聯所謂的社會主義的民主，而不是一般的民主。第五，蘇聯國家組織，是採取集權制度，排斥三權分立的原理。一切立法行政司法等權都操在同一最高政權機關。蘇聯以爲政權永久是單一的，即有產者政權或勞動者政權，絕不能分立；至於實行時各機關權力的劃分，則是技術上的便利，並不能作原則看待。第六，蘇聯憲法允許民族的絕對自由與獨立。聯盟所包含各民族，可以自由組成『自治區』『自治共和國』或『聯邦共和國』，她們對於聯盟及其下的共和國，可以自由加入，也可以自由退出。第七，蘇聯憲法具有國際主義的精神，牠容納一切民族的自由加入，且以世界蘇維埃聯盟爲其最高目的，牠摒除一切限制，凡在蘇聯境內勞動的即取得蘇聯公民權利。

凡此諸端，是蘇聯憲法的主要特徵。

第二節 新舊憲法的比較

從舊憲法的構成上看，我們很容易明瞭那是草創時期的產物。其體例並不完全，不整嚴。祇由宣言與條約兩部構成，必需由各共和國的憲法作補充方成全璧，且其內容亦不甚完滿。新憲法則不然，其結構與體例異常嚴緊周到，毫無拼湊之跡。凡社會組織，國家組織，蘇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聯盟各共和國最高政府權力機關，蘇聯國家行政機關，聯盟各共和國國家行政機關，自治共和國國家權力機關，國家權力之地方機關，法院及訴訟機關等均依次排列，最後則殿以公民之基本權利及義務，與選舉制度等。全體共十三章，都一百四十六條。凡社會主義國家所必備的一切根本大法，無不明顯而詳盡的規定出來，無怪乎有人稱爲世界有史以來最完美的憲法。

新憲法第一章爲社會組織，這相當於舊蘇俄憲法的第一二兩部，即勞動及被剝削人民權利宣言與憲法根本原則。而且這裏所規定的，不僅是抽象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乃是根據十

年來社會主義的建設，以國營企業，集體農場及整個計劃經濟作基礎而作出具體的規定。在舊憲法中我們所看到的是對社會主義的希冀與爭求，這裏則充份表現社會主義的成功與勝利。

在一定限度內的私有財產，本為舊憲法時代所允許。新憲法則更詳明的規定：

第七條之後半：『每一集體農家附屬土地上之輔助建築，以及房屋生產牲畜家禽微小農具合於農業組合（集體農場）法規所規定者，作為私有財產。』

第九條；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蘇聯經濟之支配方式……同時法律准許農民及家庭工人之小規模私有經濟，但以基於個人勞動，並不剝削他人勞動為限。

第十條；人民對於彼等勞動收入貯蓄住宅及輔助家庭建築家庭經濟及家庭使用物件，以及個人使用與享樂物件，其所有權均受法律保護。

因為有了這幾條的規定，有人認為這是蘇聯向私有制的讓步。這說法似不合事實，條文中明白規定『以基於個人勞動並不剝削他人勞動為限。』這正適合於第十二條中所言『各盡所能，各取所值』之社會主義的原則。

第二章爲國家組織，與舊憲法無重要的差別。

第三章爲蘇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這裏與舊憲法不同之處，是過去最高權力機關爲全聯盟蘇維埃大會，現在則爲最高議院。過去每年開蘇維埃大會一次，現在則最高議院任期四年。

第四章聯邦各共和國最高政府權力機關；第五章蘇聯國家行政機關；第六章聯盟各共和國國家行政機關；第七章自治共和國之國家權力機關；第八章國家權力之地方機關；第九章法院及訴訟機關；這幾章與舊憲法相比較，或則更爲完善，或則爲過去所無而重新制定。然而較之舊憲法表現最大差異的是第十及十一兩章。

第十章爲公民之基本權利及義務。這裏確定公民有工作權，並按其工作之分量及性質而獲得工資（第一百十九條。）公民有休息權，其事實保證爲七小時工作制，每年例假仍獲得工資，勞動者有廣大的療養院、休息家庭及俱樂部等組織（第一百二十條。）公民年老疾病或失掉工作能力時，仍有生活的保障權（第一百二十一條。）公民有受教育權，免費受普及強迫基本教育，至於高等教育則絕大多數學生可以取得國家津貼（第一百二十二條。）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及

社會生活方面，與男子享有同等權利。並特殊的保護母性及兒童利益（第一百二十三條。）蘇聯公民，不問所屬民族或種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各方面均絕對享有同等權利（第一百二十四條。）蘇聯公民享有言論、出版、集會、街道游行及示威的自由（第一百二十五條。）公民有組織公共機關如職公會，合作社青年團體，運動及國防團體，文化技術及科學團體之權（第一百二十六條。）此外如身體之不受侵犯權，通訊的祕密權，對外國公民的庇護權等亦有規定。至於公民義務方面，與舊憲無大差異，唯執干戈以衛社稷的紅軍軍役義務，舊憲法祇給與勞動者，新憲法則定為一般公民之可敬的義務。在舊憲法中，公民權利多祇抽象原則的規定。這裏則純為積極的具體的規定。如工作權，休息權，生活保障權，教育權，婦女的特殊利益等，除具體而詳明的規定外，並有事實的保證。

第十一章為選舉制度，這與過去之間接的，多級的，公開的與不平等不普遍的選舉制度完全相反。各級勞動者代表會（蘇維埃）代表，即上自蘇聯最高議院，下至市村的蘇維埃代表，均由選民依普遍，平等，直接，祕密投票制選舉之（第一百三十四條。）任何蘇聯公民，在選舉年達十八歲

者，均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惟有精神缺陷及由法院剝奪選舉權者爲例外（第一百三十五條。）代表選舉採平等制，任何公民，不問種族及民族，所信宗教，教育程度，居住地點，社會身份，財產地位及過去活動，均有平等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第一百二十六條。）這與過去之剝奪一部分人的選舉權，及工農的選舉權不平等不同。婦女與服務於紅軍中的公民，與一切公民有同樣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代表選舉採祕密制。候選人的提出，不僅屬於共產黨的權利，勞動者各種社會團體如職工會，合作社，青年團體及文化團體等，也可以提出候選人，這也是爲過去所無的。

我們將兩部憲法比較之後，可以看出，新憲法不僅是形式體例遠爲完善，其內容亦遠爲豐富而美滿。

第三節 新憲法與民主主義

蘇聯舊憲法之讓位於新憲法，從政治上看，自然是一個巨大的變動。但此變動從什麼地方表現出來，其特徵爲何，則許多批評家的意見多不一致。有的說『承認私有財產制的存在』爲其特

點之一。有的說新憲法『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趨向於國家主義化。』有的說『新憲法顯然已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改行民主主義。』有的更說『它已漸與資本主義接近。』這些批評究竟是否正確。讀者自己很容易加以判斷。

我們試把新舊憲法詳加比較之後，可以說新憲法所表現的特徵有兩點。第一牠包含更完整更進步的社會主義質素；第二牠包含更高階段的民主主義。從舊憲法到新憲法這十餘年來，蘇聯社會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因而反映到憲法上來。

就第一點而言，憲法明白規定『蘇聯經濟基礎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及生產資料與工具之社會主義公有；因此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及廢除生產資料與工具之私有，廢除人對人的剝削，而得穩固建立』（第四條。）關於社會主義公有的方式，則定爲國有或合作社及集體農場所有諸種（第五條。）至於『土地及其礦產、水利、森林、工廠、礦業、鐵道、水上及空中交通、銀行、交通工具、巨大國營農業組織以及都市房屋中之主要部分與工業，俱爲國有』（第六條。）更進一步的使『蘇聯經濟生活，均依國家所訂國民經濟計劃之規定及指導，以增進公共財富，並繼續提高勞動

者之物質文化水準，鞏固蘇聯之獨立及其國防」（第十一條。）

僅就上述諸點而論，已足夠看出新憲法中之社會主義的質素，而且這不是理想的抽象的社會主義，而是根據既成事實，已有的社會主義勝利，作出來的具體紀錄。正是因此所以在公民權利那一章中，能確切的保證着公民之工作權，休息權，生活保障權，教育權等等。這是我們從新憲法中所看到的政治動態之第一點。

其次，民主主義之更高階段的發展，這從公民的基本權利及義務，與選舉制度二章中充份表現出來。關於公民權利方面，不僅如上文所述，凡蘇聯公民，無種族民族或性別的差異，在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生活各方面均有同等權利。且更嚴格規定『此為不變法律，此等權利之任何直接間接限制，或依據種族或民族區別，直接或間接給與某一部分公民以若干特權，以及任何種族及民族的排斥，仇恨及輕視宣傳，均受法律懲罰。』對公民之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不僅給與以寬廣的自由，且與以實質的保證。身體家庭及通訊，均為不受侵犯的權利。至於義務方面，將紅軍的服務，開放給一切公民。

關於選舉制度的新規定，更顯明表示民主主義的發展。第一是將多級選舉制改為直接選舉制。在過去，祇有最下級的城和村蘇維埃代表，為直接選舉。以上如區、州、省、共和國以及聯盟蘇維埃的代表，都是一層一層的間接選舉上去。現在則由最下級以至最高級的蘇維埃代表，統由直接選舉。第二是將不平等的選舉改為平等的選舉。在舊憲法中，本來規定工人在選舉中較農民佔有優越權。例如共和國蘇維埃大會，工人每選民二萬五千人得選代表一人，農民則需十二萬五千人纔得選代表一人。現在則一視同仁，毫無輕重。第三是將公開（記名）投票改為祕密（不記名）投票。過去的選舉是由指導團體提出候選人名單，由大會主席團公開宣讀，實行公開投票；現在則改為不記名投票，使選舉人不受任何限制，能自主的審慎考慮，選舉其所願意的人作代表。第四是將不普遍的改為普遍的選舉。新憲法中規定，任何蘇聯公民年達十八歲者，不問種族及民族所信宗教，教育程度，居住地點，社會身分，財產地位及過去活動，均有平等的選舉及被選舉權。因此，舊憲法中所剝奪選舉及被選舉權的人們，如傳教士及曾經當過警察偵探或參加過反革命的人，或剝削他人勞動為生的人們，現在也有同樣的選舉及被選舉權。

根據以上諸端，我們自不能不認為是極高階段民主主義的實現。不過，這不是普通的民主，而是社會主義的民主。牠與後者有緊密的關聯，且祇有與後者關聯着纔能實現。

現在我們要問，這種政治動態何以能發生能完成呢？要瞭解這一問題，我們不得不進一步來觀察十餘年來蘇聯社會經濟的變化。

蘇聯舊憲法訂定時，正是新經濟政策時代。那時蘇維埃政府曾允許資本主義之局部的復活，與社會主義經濟互相競爭。就工業而言，當時雖漸恢復，但其生產額還未達戰前水準，其技術亦異常落後。從性質上看，社會主義工業約佔百分之八十，屬於資本主義的仍有百分之二十。在農業中，地主階級雖經掃除，但富農仍有極大勢力。整個農業幾全為個人經營之中古式的小農場，少數的國家農場與集體農場，在國民經濟中實不佔重要位置。富農力量極大，當時蘇聯尚未提出清算富農的政策。至於國內貿易，亦大體相同，社會主義成份約佔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其餘則均為商人及投機家所把持。

在這種情狀之下，蘇聯政府所注意的是鞏固其勞動者政權，爭取社會主義的發展，以懷疑與

監視的眼光來注視富農及新興資產者，且時刻防範舊勢力的復活。這一切都反映到舊憲法中，使之具有充分爭鬪的氣氛。

經過十餘年的發展，當新憲法成立時，蘇聯情形與以前完全不同。全部工業都建築在現代式的最新技術與組織之上，尤其重工業與機器製造業特殊發展。其生產數量不僅遠高於舊憲法訂立時，且超過戰前七倍以上。其性質，則全部為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工業則已絕跡於蘇聯。

農業方面，大規模的，使用新式技術的國家農場與集體農場，已代替了中古式的小經營農場。富農已全數被清除，小經營所佔耕地面積，祇佔總面積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至於國內貿易，商人與投機家已完全被掃除，全歸國家合作社及集體農場經營。

因此，資本主義制度的殘餘，在蘇聯已不存在，社會主義已取得全盤的勝利。凡人對人的剝削，生產資料及工具全數為社會主義的財產。

隨着經濟的變化，使蘇聯社會的階層結構亦發生變化。地主與大資本家是早被消滅，但新經濟政策時代的富農，新興資產者，商人與投機者等亦被清除完盡。現在所存在的是工人，農民與知識

識者。舊社會的殘餘份子雖仍有少數存在，然其數量極小，不能發生任何作用。從這一點說來，則是剝削者與壓迫者，在蘇聯已經不存在了。現有的三種成份，工人農民與知識者，在過去彼此間有若干差別，是以舊憲法中給與他們的待遇亦不一致。現在工廠的工人與集體農場的農民，其經濟地位完全一樣，並不是前此舊式的農民。至於知識者亦已變質，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出身自勞動者。

正是因為有了這些社會的經濟的巨大變化，蘇聯在新憲法中纔能給與一切人民以社會主義生活的保證，纔能盡量提高民主主義的實施。有了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的物質基礎，所以政治上纔有向這方面的發展。

第九章 結論——蘇聯的將來

第一節 從國內情況看到的將來

蘇聯的政治動態，在前面各章中已從各方面給與了相當詳明的考察。現在，對牠的將來作一簡略的推論，作為本書的結束。但是，要推論將來，須以現在為根據，是以不得不把目前蘇聯的一般狀況作一綜合的鳥瞰，庶不至陷入憑空架屋之譏。

談到蘇聯的國內狀況，我們不能不承認那裏已具有新社會的雛形。資本家與地主已經完全絕跡，成為純粹勞動者的國家。人們的物質享受固然沒有達到怎樣的高度，但人人得到飽食暖衣，過着比較安定舒適的生活，這是世界各國所沒有的。在過去五年內，蘇聯沒有失業的工人，甚且常感覺工人的缺乏，這表現蘇聯社會的優越。據最近國際勞工局的統計，世界各國失業工人總數約

爲二千二百萬。若加上中國、印度等尙沒有統計的失業人口，其數目當爲驚人。然僅此二千二百萬亦足表示社會病態的嚴重，如以一家五口來計算，則此二千二百萬人的失業，必連帶有一萬萬人感覺衣食的缺乏。以此來與蘇聯情況相比較，自使人們不能不有所軒輊。

十九世紀下期以來，歐美各國曾訂立若干社會保險法案，對於勞動者的生活與地位，加以保障。然各國在數十年中所完成的，還不及蘇聯所採用的較爲徹底與合於實際。蘇聯勞動者已沒有失業的威脅，失業保險對他們無關重要。此外如養生送死，疾病醫藥，休假旅行等，都有嚴密的規定，使勞動者在任何時候或任何方面，不至因意外事變而感受威脅。凡產婦嬰兒老弱的殘廢以及鰥寡孤獨等無告人民，以及學生學徒與專門家等，政府都給與充分的生活保障。而且這一切經費並不由勞動者直接擔負，而是有固定的預算。

二十年以前，俄國的農業向以落後見稱。貧窮與飢餓統治着廣大的鄉村。現在則全國十分之九的耕地都成爲國營農場與集體農場，農民以集體的力量，使用各種新式機器，化學肥料，播種優美種籽，有科學的灌溉方法，是以農業生產，較以前能增加四倍之多。以前地主，債權者與官吏們對

農民的剝削和壓迫，現在已完全消滅了。農民所收得的糧食，約有七分之二繳給政府，七分之一作為各種機器的使用費，屬於自己享用的有七分之四。照目前生產增加看來，則是農民所得已較從前全部生產還要多，這可見農民生活的改善。以前，鄉村對城市是處於不利的對立中，農民絕大多數為文盲。現在農村有各種合作社的組織，教育機關與娛樂場所佈滿鄉村，文盲亦消滅殆盡。

在以前的俄國，在現在許多其他的國家，勞動問題與農民問題，是造成社會不安與政治爭鬭的主要根源。在蘇聯，則這兩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已大體解決。那裏沒有資本家，地主，高利貸者，與貪官污吏等對人民的敲搾與壓迫。全蘇聯一萬七千萬人中，無產階級人口約四千餘萬至五千萬，農村人口約一萬萬至一萬一千萬。這樣廣大數目的人口，其衣食住行都得大體相等的滿足，沒有凍餒之憂。因此，必然產生政治上的安定與和平。

自然社會的不安，政治的擾亂，不純由於物質的原因，但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基本的因素。凡衣食豐足，秩序安定，則犯上作亂的事雖不能必其絕無，要亦不易發生。在過去的帝俄，社會階級的阻隔，與其他任何國家相類似。貴族，地主與資本家壓在絕大多數的工人與農民身上。社會地位，政

治權利，去平等主義異常遼遠。即在革命後若干年的一九二四年，失業工人仍然有一百五十萬；農業還是小規模的散漫組織，集體農場祇佔百分之五，富農數目有五百萬人之多，國內商業有一半以上由私人商人與投機者所掌握。

因此經濟的改造沒有完成，於是形成政治上的不能平等。是以從政治權利上看，農民遠在工人之後。而農民中，富農與中農，中農與貧農又均有巨大的差別。此外，對帝俄的遺民，如曾經作過軍官警察及其他依剝削別人而生活的人們，概行剝奪其政治權利。現在則不然，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使資本主義經濟已近於完全消滅，因之社會階級結構大為變化。既然一般人都站在勞動者的平等地位上，是以政治權利亦有徹底的平等，沒有工農的差別。沒有社會身份，宗教信仰及其他任何限制，凡十八歲以上的男女都有平等的政治權利。而且新憲法的頒佈，把間接的公開的不平等選舉制廢除，易為平等的祕密的直接選舉。這樣的民權制度，為歐美各國所少有。即素來自命為奉民主主義的那些國家，與今日的蘇聯相形之下，也應有不勝愧汗之感。

人民既有正當的方法發表自己的意見行使自己的權利，滿足自己的政治要求，自易樂於遵

守現存的秩序，或者在此現存秩序中，講求政治的改進。在蘇聯境內，可能的現在還有若干不滿於現制度的人，眷戀舊社會的生活，企圖打破現狀。但這種人的數目，必定少之又少，在蘇聯上下一體勵精圖治的情況之下，當不能發生大的影響。

蘇聯是民族最為複雜的國家，這是大家所知道的。在從前，大俄羅斯民族是唯一的統治者壓迫者。其他一切民族都是被壓迫者。革命後，採取徹底的民族平等與自主的原則。各民族可以組織自己獨立的國家，可以發展各自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等，絲毫不受外力的干涉。民族問題，對以前的帝俄，以及目前的許多國家，都是政治擾亂的重要因素。而在目前的蘇聯，則已把這一困難問題解決，民族間的鬭爭乃無從發生。

由此看來，則是民生民權民族這許多主要問題，在蘇聯已獲得大體的解決，即是引起社會爭鬭與政治爭鬭的基本原因已被清除。從這樣的現狀出發，來觀察蘇聯的將來，大概可以說，牠的社會經濟將繼續發展，文化程度，生活水準將繼續增高，政治上亦會較今日更為安定。蘇聯的立國精神為社會主義，這是其最基礎的特徵。而兩次五年計劃的成績，亦已充分證明在這方面的勝利。今

後的發展，自必根據既定路線向前躍進。當革命後的軍事共產主義時期，乃承大戰破壞之後，加以內戰的騷擾，列強的干涉，飢餓疫癟的壓迫之下，不得已而採取的軍事統治時代。這時候，蘇聯政府急待解決的問題，是用一切力量來戰勝列強的干涉，消滅白軍的勢力，建立並鞏固蘇維埃政權。新經濟政策的實施，是共產黨在政治上的讓步。這時，蘇聯政府的最主要任務，是恢復社會經濟的一般生產力，因此而不得不對富農與商人作相當的遷就。在一九二八年頃，這樣的恢復工作已是完全成功了。計劃經濟的開始，乃為蘇聯向前發展的開始。前此的時期，可以說是作為這種發展的預備。以後，亦必將繼此路線發展。「各盡所能，各取所值」這樣社會主義的原則，目前已有初步的實現。照過去的發展速度看，在不久的將來也許有充分的完成。

也還有一部分人士，對蘇聯的將來，懷着悲觀的態度。他們以為蘇聯境內富農與新興資產者並未完全絕跡，部分的勞動羣衆亦不滿意現狀，還有左派青年不滿於斯大林的保守政策這些份子都懷着改變現狀的企圖，他們都準備乘機發動，於是蘇聯國內的安寧，不無可慮之處。這種說法，自然不是全無道理，任何人不能肯定蘇聯一萬七千萬人中，沒有少數野心份子存在。不過，經過近

十年的建設之後，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已有了穩固的基礎，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全蘇聯人民中，最少總有百分之八九十是擁護現制度的，而且這樣絕大多數人民擁有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支配力。如是，即令有少數不逞之徒，恐亦不能發生若何影響。

第二節 從國際關係上看到的將來

若從國際情勢來看，則蘇聯的前途，毫無疑問的不能像上述那樣的樂觀。首先，我們應注意，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的蘇聯始終是生死的對立，二者間的矛盾固然可以暫時的緩和，但絕不能根本消滅。在經濟上這是兩種不同的體制，蘇聯的存在，使世界十二分之一的人口的生產與消費，脫離資本主義的體系，使世界資本主義減少十二分之一的市場。而且蘇聯經濟力發展的迅速，爲有史以來所未有，目前蘇聯的煤油、木材、漁產、食糧等，已在向外擴張，曾有一時期使各國懼怕蘇聯貨物的傾銷。若蘇聯各部門工業再繼續發展，將亦使各資本主義國家感受威脅。

若從政治上看，則蘇聯的強大與繁榮，愈是刺激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羣衆，使他們看着有

這較好的榜樣，增加他們打破現狀的決心與勇氣。在蘇聯革命成功以前，所謂勞動者政權，所謂社會主義，畢竟還是抽象的理論，固然有人肯定牠可以實現於地球之上，但也有人說那是幻想的天堂，因此，要人們犧牲目前的一切來爭取那個不可必得的天堂，自非易事。現在，擁有全世界四分一的土地與十二分之一的人口的蘇聯，居然從事這種探險而得成功。這給與世界勞動者的影響，實比單純理論的宣傳與煽動堅強十百倍，這是使資本主義的列強最不能忍受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這是資本帝國主義存在的基石。然而蘇聯一向是鼓吹民族之徹底的解放與獨立，而且自己以身作則，放棄帝俄時代在弱小國家所取得的一切特殊權利，以平等原則對待後者。而第三國際指導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共產黨，都鼓吹並進行猛烈的民族運動。這一點也是使列強與蘇聯不能共戴天的主要因素。

此外，在任何方面，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都是兩極端的對立着。蘇聯固然時刻在企圖世界革命的實現，資本主義的最後消滅；而資本主義列強亦無時無刻不在計劃怎樣消滅蘇聯，填補起來這個資本主義的大罅隙。「布爾塞維克是世界第一號公敵」，這雖然是盲撞的希特勒的呼聲，其

實各列強的統治者也都是這樣的相信。不過他們較爲穩健與慎重，不到大決鬪爆發時，法國是極露骨的反蘇組織者。至於英國更是始終一貫的領導反蘇工作，直到目前，保守黨的反蘇面目，也僅祇較希特勒稍微緩和而已。法蘇同盟固已成立，但這是蘇聯以極大的讓步而取得，而且也不是始終可靠。法國內部有一部分人始即反對與蘇聯結合，將來若遇英國的挑撥，或者還有德國的離間，也許有改變態度的可能。

希特勒登臺以後，向以反蘇先鋒自命，近且公開宣言要奪取烏克蘭與烏拉爾等區。照目前德國政治經濟危機看，國社黨急於企圖以對外的戰爭，來緩和其內部的危機。而向外發展，從那裏下手呢，自然祇有從蘇聯開刀最好，他以為這樣可以取得其他國家的同情與援助。假如其他條件便利，希特勒是很願作這樣的先鋒的。在東方，與蘇聯土地相接的日本，一方面直接感受蘇聯的威脅，一方面也一樣企圖以對外侵略來解決國內社會的矛盾。在反蘇戰爭中，也具有主要的作用。近來日、德協定成立，公開以反共爲職志，這是反蘇十字軍的初步組織，他們正在廣求同志，將來也許還有繼起的國家。

至於美國，雖說在反蘇的組織工作中，並不見得怎樣積極但以自身所受的威脅較小，且有其他國家以急先鋒自命，正落得表面維持紳士態度。然而我們知道，蘇聯成立十餘年後，美國是沒有與以承認的。若將來臨到緊急關頭，美國必然不會放不宣布敵人的死罪。

近數年來，蘇聯對外標榜和平政策，加入牠原來所咒罵的國際聯盟，與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維持極友誼關係，甚且結成同盟。另方面，多數資本主義列強也並不會露骨的表示仇視或要進攻蘇聯，且亦與之講求親善政策。我們知道，這種事實並不能證明兩者的根本矛盾的解消，而是因實際情境的逼迫，暫時互相妥協，互相利用而已。在蘇聯方面，她認為自己的羽毛尚未豐滿，不能冒險進行大決鬪，而世界勞動者亦尙沒有取得政權的力量與時機，不得不暫時與列強周旋。在資本主義各國方面，則由於經濟的大恐慌，列強間彼此的矛盾，被壓迫弱小民族的不安，國內下層人民的反對戰爭等原因，所以也祇得與蘇聯維持和平。然而兩方面都沒有放棄最後大決鬪的決心和準備。

試就十餘年來，世界主要的資本主義列強與蘇聯的關係來看，也可以知道這一問題的嚴重。十月革命後，德國以戰敗的原故而暫時潛伏着，其他如英、法、日、美諸國均會直接出兵干涉，到後來

干涉沒有得到結果，各國又因大戰的疲弊，纔自行撤兵。然而這次干涉事件，卻表現出各列強對蘇聯的關係的本質。此後蘇聯地位已日漸穩固，各國雖放棄直接干涉政策，但向蘇聯包圍與政治進攻，則為其不變的方針。在希特勒登臺以前，歐洲與蘇聯維持友誼的國家，僅一被凡爾賽條約束縛的德國，在那棄其資本主義領袖國家的使命。

照這樣說來，則是蘇聯的將來，正是荆棘滿途。國內情況雖日見光明，恐終於逃不出資本主義的魔網。各資本主義列強彼此之間，儘可以有深刻的矛盾，但對資本主義的叛徒蘇聯而言，卻有共同一致的利害。將來終有一天他們會聯合起來對付這個共同的敵人。希特勒反蘇的吼聲，在許多國家內已取得了同情的回響。

這樣的看法，自有若干真實，但並不完全。蘇聯與各列強是兩個世界，兩種力量的對立。從資本主義這方面來觀察，自是看出蘇聯前途的危險；若照蘇聯要人們的看法，則又得到完全相反的結論。蘇聯與資本主義列強之生死的對立，各列強之日夜不寧的企圖消滅蘇聯，這一切，他們都毫無保留的承認，並以此作為擴張國防，進行國民軍事化的基礎。然而對這種鬪爭的展望，他們是很樂

觀的，以爲最後的勝利是屬於蘇聯。

首先，他們認爲資本主義的聯合戰線，絕難建立成功。各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使他們難得妥協的一致對外，例如上次世界大戰，就是同一體系內協約國與同盟國的生死_對鬪爭。而現在，德法的世界始終無法消解，法國決不能讓希特勒戰勝蘇聯以後，再來清算巴黎和約的血帳。其他如法、意、德、意、英、法、英、德、英、日、美、英、美等錯綜複雜的矛盾，使帝國主義者萬難作統一的行動。這樣聯合戰線既不能成立，則單獨的某一國或兩國，決不敢冒險向蘇聯挑釁，而讓其他列強坐收漁人之利。

蘇聯還有所恃而不恐的，是牠也一樣有世界的外援。第三國際指導下的共產黨遍佈全世界各國，一旦有事，他們都是擁護蘇聯的急先鋒。且在這種不景氣的情況之下，各國失業者動以數百萬計，他們正在待時而動。還有大多數的勞動者，也都多少具有打破現狀的希望與決心。而戰爭一旦爆發，則社會經濟必遭重大破壞，社會秩序必然混亂，這時難保不發生革命。俄、德、奧、意等國的革命，也正是在上次大戰中或戰後爆發的，各資本主義國家有的親受過，有的眼見過這次教訓，所以決不輕言戰爭，若不得已而戰爭爆發，則由對外戰爭轉變爲國內戰爭，將是勢所難免。

還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運動，也是蘇聯所恃爲另一支有力的援軍。上次世界大戰，各弱小民族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欺騙，戰後曾爆發過不斷的獨立運動。雖說都被壓迫下去，若再有機會到來，沒有人能說他們不揭竿蜂擁而起。何況，第三國際指導下的共黨支部也正處心積慮的準備這一着哩。

最後，蘇聯自視最有把握的是牠自己日益增強的國防力量，軍備力量固然包括在這裏，他如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發展，也是其國防力量的增加。在其他國家，軍事力量可能的逐漸加強，但政治經濟的力量卻必然向相反方向進展。蘇聯則不然，她是沒有內部矛盾的統一體，整個力量向前發展，這是牠駕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優勢。時間愈延長，則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矛盾愈深，愈不敢冒險向蘇聯挑釁，就說敢作這個危險的嘗試，其僥倖成功的成分，也隨時間的延長而愈形微薄。

蘇聯目前的和平政策，一方面固然是牠本身需要和平，牠永遠不要戰爭。但實質上牠是看準了資本主義列強間的矛盾，更進一步利用此矛盾來使反蘇的統一戰線不能成立，使帝國主義者

彼此互相對立着，互相牽制着。她知道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不能並存，但牠運用自己的實力與外交政策，使這一最後大決戰的爆發盡可能的向後推延。牠期待着由帝國主義間的火併，而發展爲社會革命，牠要使自己海陸空軍成爲世界新社會的穩婆。

蘇聯要人們是這樣的希望着，等待着，他們對蘇聯的前途樂觀。究竟世界將來的勝利，是屬於斯大林還是希特勒，我們不必預言，祇有待歷史去證明其演變作用。

参考書

Jean Morquès-Rivière: L' U. R. S. S. Dans le Monde, Payot, Paris, 1935.

Henri Barbusse: Staline, un Monde Nouveau vu à Travers un Homme, Flammarion, Paris, 1935.

Cole: Intelligent Men's Guild through the World Chaos, London, 1935.

De Monzie: Petit Manuel de la Russie Nouvelle, Paris, 1931,

Joseph Dubois U. R. S. S., Paris, 1932.

Palme Dutt: World Politics 1918—1936, Victor Gollancz, London, 1936.

Jugov: Le Plan Quinquennal, Paris 1932.

Herrriot: Orient, Hachette, Paris, 1934.

Jean Lescure: *Les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Russe*, Ténin, Paris, 1928.

Jean Lescure: *La Révolution Russe, le Bolchévisme*, Gauber, Paris, 1929.

Jean Lescure: *Le Bolchévisme de Staline*, (*Le Régime des Plans*), Les Editions Domat-Montchrestien, Paris, 1934.

Littérature de Peuples de l'U.R.S.S., Moscou, 1935.

Savatier: *La Russie Bolcheviste vue à travers ses Lois*, Recueil Sirey, Paris, 1923.

Staline: *Deux Monde*: Bilan Capitaliste, Bilan Socialiste, Bureau d'Edition, Paris, 1934.

Staline: *Le Bilan du Premier Plan Quinquennal*, Bureau d'Edition, Paris, 1933,

Léon Trotsky: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Russe* (4 vol.), Rieder, Paris.

Léon Trotsky: *Ma Vie* (3 vol.), Rieder, Paris.

Sidney Webb: *蘇聯社會主義 (蘇聯漢譯)*

波格洛夫斯基 俄國革命運動史（吳季蘭譯）

李立俠 蘇聯政治組織

烏里雅諾夫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杜畏之譯）

高品齋 蘇俄黨爭之解剖

王季平等 蘇俄黨爭文獻

薩普諾夫 蘇維埃憲法概要（仁譯）

顧樹森 蘇俄新法典

泰寧 蘇俄外交史（陸一遠譯）